

炎黄春秋



在农村工作大论争中
求实直言的邓子恢

毛泽东与开明士绅李鼎铭

1958年那条“总路线”
形成前后的党内争论

陈毅登门向民主人士道歉

三次“金钥匙”奖获得者

李美筠清贫的一生

忠勇直谏

节俭奉公

的晏婴

8
96

《炎黄春秋》创刊五周年

传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李生

一九九六年五月十四日

祝贺

《炎黄春秋》

创刊五周年

说大话
作实事

上讲炎黄
下讲黎民

祝炎黄春秋创刊
五周年

陈永发
九六五

为《炎黄春秋》创刊五周年

以史为鉴
以史育人

耿飚



一九九六年六月九日

顾问(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朝闻 冯文彬 伍修权 杨静仁
赵朴初 胡絮青 费孝通 谢冰心

特邀编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俊义 冯 征 冯其庸 刘颖南
李 庄 李 普 李学勤 吴 象
苏双碧 张 镏 张国琦 凌 云
常 征 温济泽 韩劲草 廖盖隆
穆 青 戴 逸 魏 巍 魏久明

社长(法人代表):杜导正

副社长:方 实 宋文茂(常务)

徐 孔 洪 炉

执行主编:刘家驹 王恂 舒元璋

理 事 长:杜导正

名誉理事(单位):

中国有色金属进出口总公司
河南省炎黄事业发展有限公司

副理事长:简祖扬 李华鹏

理事单位:

深圳市兴亚大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顺地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飞无线电电讯发展公司
深圳市建设基础工程公司

理 事:孙敏伟 宋晓洛

秘 书 长:徐 孔

副秘书长:段向群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社址:北京西城区文津街 7 号

邮编:100802 电话:66170955

排版:北京维科电子技术研究所

印刷:世界知识印刷厂

国内总发行: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订 购 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

公司(北京 399 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127M

出版日期:每月 11 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 0079 号

定 价:4.00 元

春秋笔

- ②在农村工作大论争中求实直言的邓子恢 许人俊
⑭1958 年那条“总路线”形成前后的党内争论 李 锐
⑳为剿匪屡建奇功的“二〇八”情报站 王方业 赵 青

英杰谱

- ㉑毛泽东和开明士绅李鼎铭 李葆定 冯彩章
㉓宋庆龄与鲁迅的友谊 陈廷一
㉕陈毅登门向民主人士道歉 王 荫

殒星篇

- ㉖艾青的风雨人生路 祁 人 沙 平

赤子心

- ㉗美国著名建筑大师贝聿铭的中国心 吴跃农
㉙三次“金钥匙”奖获得者李美筠 田兰富 齐海萍

求实篇

- ㉚没有一个有关香港的《穿鼻草约》 邱远猷

逸闻录

- ㉛张大千重金求名画 李永翘
㉝回忆在中南海的采访生活 徐 熊

文荟苑

- ㉞著名舞蹈家赵青广东寻根记 李健民
㉟访炎帝扮演者孙玉书 苏咏鸿
㊱黄炎培的亲情诗 俞润生
㊲一幅没有题名的舒同墨宝 田 方

时代风

- ㊳陕西农民的苹果梦 辛 平

两岸情

- ㊴台北飞鸿 情系故里 林玉华

古镜台

- ㊵忠勇直谏、节俭奉公的晏婴 张伯芸
㊶“帐中坐叱山川走”的奢香夫人 彭云鹤
㊷从屈原、欧阳修谈到“败官文化” 杨尚聘

信息窗

- ㊸《炎黄春秋》隆重纪念创刊五周年 本刊编辑部

在农村工作大论争中 求实直言的 邓子恢

● 许人俊



国后农村工作的几次大是大非争论中,他始终坚持正确的立场和观点,敢于为亿万农民的利益争鸣,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无私无畏的崇高品格,为后人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奉命组建农村工作部 赤诚献身农业合作化

50年代初,我国大规模农业合作化已经开始,为适应工作需要,党中央决定组建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毛主席选定富有农村工作经验的中南局第二书记邓子恢进京任部长,后又兼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中央农林口工作。中央农村工作部的领导班子力量很强,陈正人、王观澜、廖鲁言、陈伯达等为副部长,处长们均由各大区选调的优秀干部担任,杜润生为秘书长。

邓子恢进京后,被安排住在中南海,与毛主席住处相距很近,两人常有交谈。毛主席交代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基本任务是:在三个五年计划或更长一些时间内,把四亿多农民组织起来互助合作,在国家工业化的帮助下逐步实现农业社会主

邓子恢同志是我党历史上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著名领导人,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过重大贡献,深受人们敬重。尤为可贵的是,在建

义改造,领导农村走集体化的道路,加速发展农村经济。

邓子恢深感责任重大,时不我待,随即匆匆到西郊万寿路附近物色了旧房组建中央农村工作部,迅速部署落实毛主席的指示。于是一向偏僻冷落的万寿路10号,顿时热闹非凡,从全国各个大区选调的农村工作优秀干部,先后云集于此,逐渐形成了指挥我国农业合作化的大本营,电话、电报连接着四面八方。农村工作的一些重大信息不断向那里集中;合作化的许多重要决策和指示,陆续在那里产生和发出。

邓子恢是个只争朝夕的实干家。他常常一早就离开中南海,赶到万寿路办公,很晚才回去休息。为了争取时间多做工作,也为了便于更多、更好地接近部属和联系群众,他后来干脆离开中南海,迁到万寿路农村工作部院内安家落户,从此这位副总理置身于广大干部和家属之中,同大家亲切相处,无话不讲。

邓子恢向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同志传达党中央和毛主席为我国农业合作化制定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一)积极领导,稳步前进;(二)自愿互利,不搞强迫;(三)由低到高,由点到面,分期分批发展(临时互助组——常年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他深深懂得中国的国情,十分熟悉农村的情况,了解农民的特点和心态。考虑问题总是强调:一从实际出发,二着眼发展农业生产。他坚决拥护毛主席作出的关于用15年或更长一点时间完成农业合作化的决定,重视稳中求快。他常常指出:农业合作化是一项重大的经济政策,绝不可用政治运动的方式进行,应按农村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和经济内在的发展规律进行;农业社的初级化过程要长一些,通过初级化阶段,逐步教育、训练农民学会合作生产,促进农村生产力发展,为转到高级社准备好管理经验,打下雄厚的物质基础。

邓子恢重视调查研究,善于发现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中央农村工作部成立后,一度感到有两大问题应加以注意:一、农业合作社的发展有贪多求快倾向;二、农村推广生产技术出现强迫命令。邓子恢立即派人赶赴河北、山西调查,证实确有此事。有的县刚试办几个社,有的甚至并未

试办,数月后全县竟然有40—50%的村宣布实现合作化了,形式主义极为严重,影响很坏。在农民对合作化尚无认识和体验的情况下,引起了思想恐慌,严重干扰了农业生产,也为合作化的正常发展人为地增加了困难和阻力。邓子恢及时将这些情况向党中央、毛主席作了汇报,并主持代中央起草《关于春耕生产给各级党委的指示》和人民日报社论《领导农业生产的关键所在》,指示和社论提醒全党认识:中国农业合作化必须“从小农经济的现状出发”,并在合作化过程中“保护农民的利益”。党中央和毛主席高度赞扬这两个文件,特意把两文和中共中央早先通过的《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决议》合编为小册子。毛主席亲自定名为《当前农村工作指南》,还动手起草通知说“这三个文件,提示了党在当前阶段指导农村工作所必须掌握的理论认识和重要的政策原则,以及群众路线方法。”“希望通过这一次学习,能把各种人员的思想水平在全体规模上提高一步,以保证党在农业战线工作中的不断胜利。”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精神,邓子恢随即协助中央帮助各地对合作社进行了两次整顿,及时克服了冒进倾向。全国巩固了一万多个合作社,也收缩了一些不具备条件的合作社,使互助合作运动继续健康发展。华北地区问题原先比较突出,1954年初,整顿后华北局向中央报告称:“纠正冒进的结果,农民生产情绪已趋安定,部分地出卖土地、卖耕畜、杀猪、宰羊、伐树等混乱现象已停止,抗旱播种任务已顺利完成。干部认识了冒进对工作的危害,开始转变了重(合作)社轻(互助)组的错误认识。曾消沉一时的互助组,又开始活跃起来,并有了发展。”

历史资料表明:从1953年初到1955年春,邓子恢领导中央农村工作部,在忠实执行党中央、毛主席指示方面,做了大量扎实、细致的工作,确保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健康发展。这一期间,尽管党内也有人对中央农村工作部1953年纠正冒进、整顿合作社的做法有异议,甚至颇有微词,但形不成气候。总的评价是肯定的,人们普遍公正地认为:邓老及农村工作部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得力助手与好参谋。

据统计,1953年全国农业合作社为1.4万

个,1954年发展到22万个,1955年1月又达48万个。中央原确定:1955年春耕前全国农业合作社发展到60万个,这个速度是正常的。然而同年3月统计时,全国农业合作社已高达67万个,速度不是慢了,而是在超速发展。超速发展引发了许多问题:不少地方违背自愿原则,又搞强迫入社,农民不满,干群关系再度紧张。如浙江省由3800个社迅猛发展为5.5万个社,加之当时农村开始实行统购统销新政策,宣传不够,农民不理解,怕“共产”,普遍恐慌,又大批出卖牲口,杀猪、宰羊、砍树、闹退社等现象不断出现,农村又呈现人为的紧张局势。毛主席听了邓子恢汇报后极为重视,3月间曾两次找邓子恢交谈,指出:“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否则生产力会起来暴动,当前农民宰羊杀猪,就是生产力起来暴动。”他还明确表态:“农业合作化,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53—1957年)发展到1/3就行了,不一定要50%。”接着,他就提出“停、缩、发”三字方针,并同邓子恢共同安排:华北、东北一般停止发展;浙江、河北两省收缩一些;其他新区可适当发展一些。



邓子恢与陈毅对弈(1958年·香山)

毛主席如此坚定、明确降低农业合作化的发展速度,邓子恢虽然深感意外,但仍然坚决贯彻。他确定农村工作部下半年工作重点转入整顿、巩固、提高,适当发展合作社。鉴于浙江问题突出,必须尽快派人帮助解决,他认为“可以考虑收缩2万个,少了稳定不下来,也没有力量去巩固”。毛主席同意浙江“缩”一部分,并指示:“收缩一定要做充分的思想工作,冒进不好,冒退也不好。要向干部说明,现在退一些,是甩掉一些包袱,为了更好地轻装前进。”据此,中央农村工作部给浙江省委发电函建议收缩,强调“有条件办好的,一定争取办好”。“没有条件办好的,应打通基层骨干和农村积极分子的思想,不伤感情,为将来办好合作社而继续努力。”省委同意这一建议,立即开会部署。经过整顿,收缩1.5万个社,巩固4万个社。河北、山东等地收缩几千个,其他地方收缩不多。据统计,那次整顿,全国共收缩2万个社,巩固65万个社(“文革”中“四人帮”攻击邓子恢砍20万个合作社,纯属无稽之谈)。整顿效果是好的,合作化的冒进局势获得有效控制,稳步发展受到了重视,干部政策水平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恢复了,干群矛盾缓解了,农业合作化重新出现了好的发展势头,这是客观的历史事实。

形势估计意见相左 据实陈言招致“炮轰”

在我党历史上,常常出现这样的怪现象:经济形势一旦好转,生产一旦发展,“左”的思想就往往接踵而至,引起纷争,甚或把历史引入歧途。

在全国农业合作社按中央指示进行整顿期间,毛主席经常离京外出视察。1955年4月下旬,他南下巡视看到铁路沿线地里庄稼长势很好,听了某些地方领导人汇报,看了有些同志提供的材料。特别是听华东局书记柯庆施反映:“干部中有30%的人对合作化不热心,其中有些人是受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影响”等等,印象极深。这时毛主席的思想开始出现新变化,他感到农村形势并不像邓子恢说的那么严重。于是,回京想着手改变一个多月前刚同邓子恢确定的“停、缩、

发”三字方针。5月5日、9日晚,他连续两次约邓子恢面谈,开始警告邓子恢不要重犯1953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错误,否则又要作检讨。他还问邓子恢:“1957年化40%可不可以?”邓答:“上次说化1/3,还是1/3为好。”这引起毛主席的不快。

5月中旬,毛主席召集15省市委书记开会。会上,他开始向人们敲警钟说:“在合作化问题上有种消极情绪,必须加以改变,否则会犯大错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会后中央农村工作部迅即着手调整合作化的发展计划,提出1956年由现有65万个合作社发展到100万个,即翻半番。6月24日,刘少奇同志主持中央政治局开会,周总理、朱老总、邓小平等出席,认真讨论后正式批准这一发展计划。会议还指出:现在一般不要拉中农入社,等农业社的生产收入超过中农水平,他们会主动入社。那就是水到渠成,合乎发展规律了。

1955年的6月,在我国农业合作化历史上是关键岁月。后人以此为界划了一条线,认为在6月底以前,我国农业合作化的发展总体是好的、正常的。那时,毛主席与邓子恢在农业合作化的指导方针、发展速度上,大的方面没有分歧;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基本上是健康的。然而6月底以后,农业合作化的形势,就不正常或基本不正常了。毛主席以一些地方的见闻和某些人提供的情况为依据,改变了原来的指导思想,认为农业合作化不是急躁冒进,而是合作化高潮来临的标志。6月,他未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而是去华东视察。途中曾说:“谁说农业社不好,山东小麦就长得很好嘛!”他还去浙江视察。6月底回京后,立即召邓子恢谈话,认为中央政治局通过的“1956年春耕前合作社翻半番、发展到100万个”的设想,似乎少了一些,提出要“翻一番”,即由65万个发展到130万个。一向实事求是的邓子恢,自有看法,但没有立即表态,而是表示回去商量一下再汇报。

邓老感到事关重大,回到部里慎重地征询了一些同志的意见。为便于大家能说真话,他没有说明“翻一番”是毛主席的意思。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同志十分熟悉农村情况,据实陈言:全国农业

社的现状不容乐观,还是按中央政治局不久前批准的计划办事为好。赞成翻半番,反对翻一番。

“是翻一番,还是翻半番”,已成为当时我国农业合作化的焦点。不久后的一天夜里,10点左右,邓子恢胸有成竹地进中南海。他据实向毛主席坦诚相谈,两人谈得很久、很深,直到第二天早晨7点左右,邓子恢才从中南海回到万寿路家中。那是一次交谈,也是一次工作争论或思想交锋。毛主席坚持加快农业合作化的发展速度,主张在65万个社的基础上翻一番,达到130万个。邓子恢坚持认为中央政治局集体通过的发展计划符合全国实际,不赞成加快农业合作化的速度,主张在65万个的基础上翻半番,达到100万个。他列举许多理由,阐明自己的观点:(一)整个农业合作化的发展速度,应与国家工业化的进度相适应,而我国工业目前尚不能为农业的现代化提供相应的技术和机械设备。(二)现有的65万个农业社,质量并不高,问题很多,巩固任务很重。要打好基础,才能较好地前进。(三)全国各地,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情况不一。群众文化和觉悟水平不同,解放时间有早有晚,互助合作经验千差万别,农业合作化速度不宜太快。(四)干部领导合作化时间短,尚需积累工作经验。(五)农业社的会计数量不足,培养需要有一个过程。(六)苏联和匈牙利农业合作化过急,已有深刻教训,值得我国注意……这些中肯意见,都是实事求是的经验之谈,也是邓子恢的肺腑之言。他出于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忠诚,才反复陈述这些意见。原以为会说服毛主席改变主意,岂料却加深了同毛主席的分歧,引起了不满。

毛主席是一个很有主见的领袖人物,一旦观点形成,主意拿定,他就会排除任何障碍,努力付诸实施,决不妥协、退让。不久,他召中央农村工作部其他领导人进中南海谈话,而且旧事重提,从对浙江农业社的紧急收缩说起,严厉批评中央农村工作部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被“吓破了胆”、“事先不请示,事后不报告”、“很自负”等等。部里同志听到这些情况后,都为邓子恢担心:何必为几十万个合作社去同毛主席争论?然而邓子恢却理直气壮地说:“不是几十万个合作社的问题,要紧的是他认为办社条件都是不必要的,这怎么能

不说清楚呢?!”

毛主席见邓子恢无意转变观点,表示:“邓子恢的思想要用大炮轰了”。

“要用大炮轰”,这是幽默语言,但也决非戏言,它表达了毛主席的决心。双方分歧太大,各有主见,谈不拢,只有诉诸“炮轰”了。

7月31日,是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令人难忘的日子。那一天,毛主席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上作了著名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长篇报告,他开始“炮轰”邓子恢:“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清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他们老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而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他还逐一驳斥了邓子恢关于干部准备不足、合作社质量不高、苏联的经验应予重视等等正确观点,并归结为“是表现了两条路线的分歧”。会场气氛严肃,言词尖锐,大家毫无思想准备,深感突然。

邓子恢挨批评后思想仍然不通,曾找刘少奇同志交谈说:“我不是把农村情况看成一团漆黑,浙江省收缩当时是对的。”他还诚恳提出:“希望中央不要再鼓励发展,减产了怎么办?”

过去,邓子恢常常提醒人们:“中国小农经济是非常脆弱的,它经不起任何损失和打击。”“农民不比我们国家干部,指挥错了,农民受损失,自己照样有饭吃。”心系农民,直言不讳,这是邓子恢光明磊落、品格高尚之所在,也是邓子恢屡遭风霜、多有磨难之所致。

毛主席威望很高,一呼百应。在那种局势下,实际上任何人都帮不了邓子恢的忙。顿时,全国上下都在按主席的讲话精神反右倾,转思想,加速度,掀高潮。各地一批据说是“顶着右倾风暗藏下的硬骨头社”,突然像雨后春笋般涌现,“先进材料”不断上报中央。毛主席很欣赏这些材料,亲自选阅、编印《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后改称《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还执笔写了许多

编者按语。

同年10月,毛主席在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又作了《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的报告,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被升级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于是,农业合作化的高潮果然迅速出现在全国各地,“形势确实喜人”。早先隐蔽的“左”倾情绪,此时也乘机兴起。幸好被敏感的毛主席察觉,他曾建议各地党委“刹车”,但未能如愿刹住。农业合作化一旦在政治运动方式的驱动下,往往会以特有惯性继续向前滑行。

据统计,从1955年下半年到1956年秋,不到一年时间,我国农业合作化,即以万马奔腾之势迅猛发展。不仅完成了初级合作化,而且神奇地达到了合作化的高级阶段。1955年10月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毛主席还重申以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从1953年算起,共15年)基本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如今只用三年就“化”成功了,速度之快堪称奇迹。然而,超速发展带来的问题,也接踵而至。较为普遍的是农民闹退社、散社现象,此起彼伏,各省均有,而且是农民自发形成的。浙江又一次成为闹退社的突出典型,仙居县的农民甚至将县政府和公安局的门窗都砸了。遗憾的是有些地方领导未能把这些现象视为超速发展、违背农民利益所致,而是简单归结为阶级斗争,并决定用大辩论、大批判的方式来击退“阶级敌人和富裕中农的进攻”。

农村的大批判、大辩论,暂时制止了农民退社、散社的浪潮,又一次推动了农业社的“大发展”。农村中原有的问题被掩盖和忽视了。在农业社很不巩固,尚需做大量巩固和完善工作的情况下,我国农村紧接着又快马加鞭,迅速掀起了热火朝天的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生产关系的改革再次登上了“新台阶”。

这些就是我国农业合作化大争论的种种历史背景和史实。

埋头研究公社内部管理 被赞为“农村工作专家”

1955年以后。邓子恢尽管屡遭错误的批判

和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但他还是心系农民、一心为党,矢志不移。农业合作化高速发展和全面实现公社化,在中国大地上先后成为社会现实,人们已无法改变。面对这一社会现实,邓子恢只有把注意力转移到潜心研究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上,他试图以此作突破口,为我国农村经济改革做出贡献。

多年来,邓子恢一直深感长期处于小农经济的中国农民,只有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化的道路,壮大集体经济实力,才能摆脱贫困,走向富裕。因此,他坚定地协助毛主席领导农业合作化运动。但一旦合作社普遍建立起来后,他又不断提醒人们:“不要为下边一片叫好声所迷惑,办社容易巩固难。”为纠正各地只顾建社、不顾巩固的偏向,他及时提出“整顿、巩固合作社”,主张勤俭办社,开展各种经营,增加收入,对社员实行按件付酬、包工包产、超产奖励;牲畜分户饲养,集体使用等等。

我国农业社高级化后,邓子恢强调民主办社、勤俭办社和坚持按劳分配原则。为理顺因高级化“一步登天”造成的经营管理混乱局势,他戴着“小脚女人”、“右倾机会主义”等政治帽子,继续坚持深入农村基层调查,总结研究出一套“产包到队、工包到组、田间零活包到户”,“组分片、户分块,大活集体做、小活自己干”等分工负责制,使产量和劳动质量两个制度统一起来。

对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邓子恢持反对态度。当时,他患病治疗,但病中仍不忘关注农村工作。耳闻共产风、高指标、浮夸风等信息,内心极为不安。病情稍有好转,他就不顾疲倦,赶赴“共产主义试点县”——河北徐水县,先后考察劳动军事化、吃饭食堂化、吃饭不要钱等“新生事物”。回京后,他心情很不平静,明确指出:“徐水是浮夸风、共产风的典型!”

那时,“左”倾思潮兴盛,到处搞“拔白旗、插红旗”,形成“批右一边倒”的局面。有的地方为放“卫星”、捞政治资本,还把几亩稻苗积为一亩,搞“堆产田”。甚至违背自然规律,用电灯照明、鼓风机送风夺高产,而且大肆宣传。邓子恢对这些虚夸、造假现象,极为恼火。当年10月,他在全国政协会上义正词严地作专题发言,阐述合理密植、



周总理向邓老夫人陈兰同志和子女致哀

科学种田的道理,指出:“禾苗生长必须靠光合作用和必要的通风。过分密植,株行距过小,枝叶不通风,不透阳光,不能起光合作用,根系相互干扰,作物反而不能正常生长,结果不能增产反而减产。”邓子恢的发言受到人们的高度赞扬,有的说:“我最爱听邓老讲求实际的发言”。称他是最讲求实际的人。

1960年前后,我国农村因天灾人祸正处于严重困难时期,饿死人的问题不断出现,举国上下都在寻求解决难题的方案。年逾花甲、患有多种疾病的邓子恢,又开始受到中央重视。1960年九十月间,他受中央委托,率工作组先到山西、河北,后又到江苏无锡,深入农村作调查研究。在无锡,他领导工作组创造性地草拟了一个《农村人民公社内务条例》,内容有社员权利和义务;公社三级所有制和个人所有制;管理权限;生产管理、财务管理;按劳分配、民主制度等等,试图通过法规形式加强公社内部经营管理,解决平均主义,限制共产风和瞎指挥。回京后呈送周总理,并作了汇报。周总理喜形于色,十分赞赏邓子恢的创举,迅即转呈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毛主席看后也很高兴。

1961年3月,毛主席在广州主持中央工作会议,专题讨论农村工作,研究《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即“六十条”),邓子恢前往出席。会上,毛主

席情绪很好,大声询问:“邓老来了没有!”致使与会者的目光顿时转向邓子恢。随后,毛主席高度赞扬邓子恢重视调查研究,称邓子恢是“农村工作专家”,说“他在山西、河北、江苏的调查是对的,他的一些观点和主张是正确的。我过去同邓老有点小冲突,现在统一了,他是正确的。我同他的争论从此结束”。“这几年(农村)犯的错误(指共产风、浮夸风),没有他的份。”“搞农村工作找谁呀!还是要找邓老。你们不要瞧不起邓老,他搞了一个《人民公社内务条例》,办了一件好事!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工作,还是要靠邓老。《人民公社条例》首先是邓老倡议的,然后是总理的支持……”

这是1955年毛主席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严厉批评邓子恢为“小脚女人”后,首次高度赞扬邓子恢,承认邓子恢是正确的,宣布争论结束。这又一次出人意外,在党内产生巨大影响。邓子恢名声大振,再度受到人们的普遍尊敬。

广州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邓子恢未立即回北京,他直接带工作组在广东、福建农村作进一步调查研究。他作为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亲自召集社队干部开座谈会,鼓励人们说真话,畅所欲言,还到田头、食堂、农户访问、查看,历时45天。他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后,连续两次向中央写报告,如实反映民意,大胆建议:停办食堂,基本口粮分到户;取消供给制,贯彻按劳分配;耕畜农具归生产队所有,使用权与所有权合一;实行“三包一奖”制度;社队规模应划小,不宜过大;自留地允许超过5%。他还要求把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独立经营,自负盈亏,以利解放生产力。中央很重视邓子恢的意见,将他的两个报告批转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阅研。

同年10月3日,毛主席委托邓子恢在中南海召开座谈会,讨论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6日,毛主席听了邓子恢的汇报,赞成其意见,7日亲自起草《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明确三级所有、队为基础。随后,邓子恢又率调查组南下,到河南、江西、福建了解中央指示落实情况,并及时向中央写了报告,深受毛主席赞赏。11月23日,中央在批转邓子恢报告的同时,特别指示各省、市第一书记仿效邓子恢的

办法,率工作组下乡作十天左右的调查研究。当时,邓老已成为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榜样。

支持推行包产到户 为民代言再遭批判

这一期间,我国农村经济形势依然十分严峻,解决温饱问题成了头等大事。许多农民对人民公社的“大呼隆”、“平均主义”不满,有的自发实行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有的推行责任田,有的干脆分田单干。这些做法,当时虽然很难被一些领导人所接受,但确实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推动了生产的发展,解决了温饱问题,深受农民欢迎。长期心系农民的邓子恢,得悉这一情况后,精神为之振奋,立即派人到安徽淮南调查。他赞赏那里“五统一”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曾当面支持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说:“你们的办法好,我赞成!”

农村经济形势究竟如何?怎样看待包产到户责任制?当时人们众说纷纭,分歧很大,成了中央机关和各地干部普遍关注的焦点。既然毛主席赞扬邓子恢是“农村工作专家”、“农村工作要靠邓老”,于是中央党校、总后勤部、中央团校等党政军机关,都相继邀邓子恢作报告。他客观地分析了农村的形势和问题,明确支持安徽的包产到户责任制,认为它能够解决农村遇到的暂时困难。

1962年6月下旬,中央书记处开会听取华东区汇报安徽包产到户责任制,邓子恢同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一道支持推行包产到户。邓小平说过:“白猫黑猫,能抓耗子就是好猫。”邓子恢表示:“包产到户是集体经济管理的一种好形式,能够调动集体和个人两个积极性,有利于克服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是搞好集体经济经营管理的好路子。”接着,邓子恢又到中南海见毛主席,详细汇报中央农村工作部到安徽调查的情况。毛主席不赞成包产到户。邓子恢没有灰心,又再次派人到安徽淮北调查。淮南、淮北两次调查的大量数据均表明:实行包产到户比上年增产增收,群众普遍满意。

事也凑巧,这一期间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

第二书记王任重到广西龙胜县调查,研究那里的包产到户问题,并向中央写了报告。他们认为在集中统一经营形式下的包产到户,还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毛主席审阅了这份报告,亲自写批语指出:陶、王“所作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后所提出的意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短短数语,用了两个“马克思主义”,邓子恢感到包产到户似乎露出了希望之光,于是决定趁热打铁。7月份的一天夜里,他同副部长陈正人、廖鲁言等人驱车前往中南海,再次向毛主席陈述支持包产到户的种种观点,这是一次艰巨的谈话,又是谈了一通宵。第二天早晨,他们才返回万寿路大院。

鉴于当时党内高层领导对包产到户看法有分歧,支持者人数不少,反对者也不乏其人。因此,当有人看到邓子恢等刚从中南海回来时,理所当然打听毛主席的态度。邓子恢满面笑容,兴奋地说:“主席同意试一试。”

党中央最高领导人毛主席同意包产到户可以试一试,这确实是一个好消息。邓子恢立即布置有关人员准备安徽包产到户的材料,以便出席8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时推荐。有的同志心有余悸,劝邓子恢:待中央明确表态后再提。而他却毫不含糊地说:“怕什么,不能为了保乌纱帽,不顾农民死活。为个人得失而不顾群众利益,那还算是共产党员!?”

8月份,北戴河天气晴朗、凉爽,中央工作会议如期召开,重点研究举国上下普遍关心的农村问题。会上,人们对广东、安徽的包产到户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决定推举广东领导人牵头,组织一个小组,起草有关包产到户的文件。在这事关亿万农民切身利益的关键时刻,邓子恢无疑表现得十分积极、活跃,他大力倡导包产到户,为实现“试一试”鸣锣开道。然而,像自然界有不测风云一样,中央工作会议的政治风云也正孕育着急剧的变化,随时都可能突变。一天,邓子恢手持包产到户的材料,满怀希望去见毛主席。他滔滔不绝地陈述支持推行包产到户的种种论点和论据。殊不知,毛主席此时已经有了新念头,原先在中南海还答应允许试一试包产到户,如今听了某几个人的进言,又不同意试一试了。邓子恢不理解,也不相信毛主席会变得那么快。他以为是自己的话

没有说透,因此继续对毛主席做工作,试图说服毛主席对包产到户维持允许试一试的态度。而毛主席似乎已拿定主意,态度坚定,毫不松动。两人辩来辩去,话不投机,闹得不欢而散,毛主席很不满意。

8月6日,毛主席在大会上公开表态:“已经包产到户的,不要强迫纠正,要做工作。”随之严厉指出:“现在就有闹单干之风,越到上层越大。”他批评邓子恢“很自负,谈了半天,就是听不进意见,还在要求试一试。试什么!中国农民不是试了几千年了嘛”!这句反问语,威力很大,说服力很强。是啊,中国农民一家一户生产,确有几千年了,结果不好,还试什么!原先赞成包产到户的同志,现在心悦诚服改变态度,称赞毛主席高瞻远瞩,看得深,确实伟大。

8月9日,毛主席召集中心组成员开会,一开始就问:“为什么不请邓子恢同志来!他不来,我们的对台戏唱不成。建议中心组再增加邓子恢同志”。邓子恢确实倔强,依然不跟“风”。他在中心组发言说:“工业可以搞责任制,为什么农民田间管理就不可以搞责任制。”“责任田根本不涉及所有制问题,土地仍然是集体所有,只是超产部分归社员个人,不存在反对集体经济的问题。”

围绕包产到户问题,分歧在扩大,矛盾在加深,北戴河的政治风云也在变。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带头批判“安徽的责任田是单干,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对集体经济”。从而加剧了党内斗争的发展,形成批邓子恢一边倒的局面。

同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又进一步从阶级斗争的高度继续批判邓子恢,说他“一贯反对合作化”、“一贯主张单干”、“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者,是民主主义者”。邓子恢领导的中央农村工作部,也被错批为“十年一贯制”、“没有办一件好事”而撤销了。问题严重到如此地步,全是包产到户引发的,因此人们长期视“包产到户”为洪水猛兽,谈“户”色变。包产到户成了“单干”、“资本主义”的同义语或代名词,人们讳之莫深。

追求真理秘密搞试点 历史公正终于有定论

然而,包产到户作为一种经营形式,却以它

特有的生命力潜隐在农村，伺机顽强表现自己，以求东山再起。邓子恢这位顽强的革命老人，虽然遭受严厉批判，失去了农村工作部部长和副总理的职务，但他仍心系农民，坚信包产到户是农村改革和发展生产的希望之光。1964年他身患严重的糖尿病，却化名为李建中，先后到广西玉林和桂林蹲点两年搞四清。这期间，他用保密的方式瞒着区党委领导，在农村基层暗地里搞包工到组、包产到户的试验。四个试点区的试验效果都很好，统计表明：那一年的田间管理，是合作化以来管理最及时、质量最好的一年；粮食产量，也是合作化以来增产幅度最大的一年（增长37.5%）。然而不幸的是1966年5月“文革”骤起，邓子恢被迫终止包产到户的试验，奉召回京参加运动，接受无休止的批判，但他始终认为“包产到户没有错”。

历史是无情的，但又是公正的。经过数十年风霜雨雪的实践和艰苦探索，我国农村工作中的一些大是大非，终于真相大白，有了公论。过去给

邓子恢戴的“小脚女人”、“刮单干风”、“右倾机会主义”等帽子，已被实践证明是历史的误会。邓子恢在农村工作的几场大争论中，始终坚持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无私无畏，敢于从实际出发，长期为亿万群众利益争鸣、呐喊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格，再度为人们传诵，而且载入史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正式为邓子恢平反，《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邓子恢等同志提出了农业中要实行生产责任制的观点……在当时和以后都有重大的意义。”这是对邓子恢公正和崇高的历史评价。邓子恢离开人世已经23年了，今年8月是邓子恢诞辰100周年纪念，缅怀邓老的丰功伟绩，回顾他走过的坎坷曲折道路，重温他经受的风霜雨雪，我们深感他不愧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卓越的农民运动和农村问题专家，他的崇高品德和伟大形象将永远耸立在亿万人民心中。

（责任编辑 方 晋）

● 名人逸事二则 ●

杜甫吟诗退礼

终生不得志的唐代大诗人杜甫，公元764年，经友人推荐，在四川成都任剑南节度使署中的参谋和检校工部员外郎，过了半年的幕府生活。

有一日，太子舍人张某送他一条高级锦褥，褥面是一串栩栩如生的水族形象图案。张舍人在送这份厚礼时曾说到，把这东西置于室中，鬼怪见了都会惊走，因此特送上供作床褥，在上面可以睡得神清体爽。杜甫听罢，吟诗曰：“领客尊重意，顾我非公卿。留之惧不祥，施之混柴荆。”意思是说，你的感情我能领会，不过我并非贵人，只怕反倒会为我招来不祥，何况他和这简陋的住处也不相称。于是，“锦鲸卷还客，始觉心和平”，杜甫把这件贵重礼品退还给送礼人了。

杜甫在诗中还说：“叹息当路子，干戈尚纵横。掌握有权柄，衣马自轻肥”，“皆闻黄金多，坐客悔吝生”。他有权不谋私、贫困不受礼的高风亮节为世人所称道。

张伯行撰文拒贿

据史载，有“天下第一清官”（清朝康熙皇帝语）之称的张伯行，廉洁奉公，政绩斐然，升任福建巡抚，总揽全省军事、吏治、刑狱，位高权重。僚属门生多有携礼拜谒请托者，他或婉言谢绝，或严词拒贿。虽然如此，来者仍不乏其人。于是，张伯行便写了言简意赅的《禁止馈送檄》：“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膏脂。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谁云交际之常，廉耻实伤；倘非不义之财，此物何来？”以此作为座右铭。

翌日，张伯行将《禁止馈送檄》张贴在巡抚衙署和住所的门外，送礼者观之，或良心发现，或自惭形秽，皆悄然离去。于是，这篇檄文便不胫而走，广为传颂，被人们誉为从政清廉的“金绳铁矩”。

（李春碧）

艾青 的风雨 人生路

● 祁 人 沙 平



艾青和夫人高瑛

这是一个令人悲痛的日子。

1996年5月5日，我国著名诗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诗歌学会会长艾青，因病医治无效，于凌晨4时30分在京逝世。

一代诗坛大师的去世，使中国文坛沉浸在无限的哀悼与思念之中。我走进熟悉的东四十三条胡同，走进熟悉的97号院，我难以相信他已离开人世，但在这四合院里再也看不到这位慈祥老人的身影了。然而，大地不会忘记这位歌者，祖国不会忘记这位儿子，世界不会忘记这位和平的战士，历史将永远铭记他闪光的足迹。

—

艾青，原名蒋正涵，字养源，号海澄，1910年3月27日出生于浙江金华县一个地主家庭。他小时被寄养在本村贫穷农妇大叶荷（即大堰河）家里，从小就感受到了劳动人民的苦难。读书后开始接受“民主”和“科学”的启蒙教育，向往进步和光明。1928年夏考入杭州国立西湖

艺术院绘画系，1929年到法国学习绘画。在巴黎时期，读比利时诗人凡尔哈仑的诗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他开始学习写诗，他的处女作《会合——东方支部的会合》写的就是他在法国留学时参加世界反帝大同盟东方支部成立大会的情景。这首诗写于“九·一八”事变之后，显现了诗人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

1932年1月，艾青回到上海，不久便参加了“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1932年7月被捕入狱，在狱中写下了《大堰河——我的保姆》，以伤感和怨愤的调子歌颂了用乳汁养育自己成长的贫穷农妇大叶荷，向不公道的世界发出了咒语。这首诗震动了诗坛，成为诗人的成名作，从此“艾青”这个名字载入现代诗史。1935年10月艾青出狱。抗战爆发前夕，艾青离开上海投身于大后方抗日救亡运动。1941年来到延安，1949年2月进入北京任中央美术学院军代表。

艾青献给新中国的第一首歌是《国旗》，五星红旗是“美丽的旗”、“庄严的旗”、“革命的旗”、“团结的

旗”、“我们爱五星红旗就像爱自己的心”。1950年7月，艾青赴苏访问，以《宝石的红星》等十几首诗，抒写和歌颂了中苏人民的友谊。之后，艾青又写下了许多国际题材的诗作，如《献给亚非会议》等，尤其是他访问智利后写下的几十首抒情诗，如《年轻的母亲》、《给巴勃罗·聂鲁达》、《在世界的这一边》、《写在彩色纸条上的诗》等诗作，以情深意浓的鲜明形象歌唱母爱、和平和友谊，也控诉了人世间的苦难与不平。在《维也纳》诗中，诗人对当时还被苏、英、法、美四国分割占领的奥地利首都及其人民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我的阿非利加》这首献给苦难中的非洲黑人兄弟的歌，寄寓了他们终将站起来的期待。这些诗作表达了诗人对整个个人类命运的关注，在国际上赢得了声誉，艾青也成为一位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诗人。

1952年，艾青辞去《人民文学》副主编职务，有了较多的时间从事创作实践和艺术上的探索。1953年回到家乡，写下了《藏枪记》和《双尖山》，1954年创作了长诗《黑鳗》，到

1957 年先后出版了《欢呼集》、《宝石的红星》、《春天》、《海岬上》等诗集。然而,正值旺盛的“歌唱期”的艾青,被 1957 年一场严重扩大化的“反右派”斗争扼住了喉咙,使他在诗坛上消失了 21 年。

二

艾青被打成“右派”后,先是发配到北大荒的一个农场。由于艾青在延安时就与王震将军结下深厚友情,当时的新疆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政委张仲瀚都是原三五九旅王震部下,且当年在延安时与艾青就相熟,所以,艾青得以在时任农垦部长的王震的关照下,由北大荒调到新疆石河子定居。艾青初到石河子,享受师级工资待遇,吃小灶,而且经常受邀与兵团各首长、农八师师长罗汝正、政委鱼振东出席各种大型会议或某些高级社交场合。艾青在这里受到礼遇,——在当时中国的“右派”中,恐怕是极少极少的了。

艾青的到来,在石河子犹如巨石投水,激起了层层波浪。由于文学的感召,由于艾青的平易近人,当地一大批文学青年纷纷慕名而来,登门拜访,或谈诗论文,或请求指点习作。在这一大批来访者中,便有后来成名的诗人杨牧、石河、柏桦等。艾青崇高的人品,在同文学青年的日常接触中,自然地流露了出来。

后来成名的讽刺诗人石河,原名李绪源,那时刚从山东流浪到新疆,在石河子纺织厂工作。接近 20 岁,既爱读书又好动好玩。有一天,他用弹弓在林带中打下了一只鸟,恰遇散步到此的艾青。艾青告诉他:被他打下的这只鸟就是夜莺——诗人的宠物,她不但是益鸟,而且能以其特有的美妙歌喉美化人类的生活,因此,他珍惜和保护都来不及……一席话令石河悔恨交加,铭记终生。

那时,诗坛上流行的是“豪言诗”,报刊上正在大批“人性论”,但艾青却不管当时的“政治大气候”,在文学青年中仍是以其诗人的真诚侃侃而谈,发表他精辟的见解。他说:“什么是好诗?我看最具有真情的诗就是好诗。旧社会时,回故乡探亲,正碰到有户人家办丧事。那时的乡俗兴‘哭歌’,即用唱歌一般的腔调来哭亡人。一个年轻妇人抚着亡夫的棺木哭道‘夫呢——/宁隔千重山哎/莫隔一层板哎……’我看她哭出的这两句话就堪称好诗……”

在“反右”之后,“右派作家”或“右派诗人”被剥夺了创作和发表作品权利的情况下,艾青在新疆 17 年,无论生活中发生了怎样令人痛心的事,他都没有放下过手中的笔。在乌鲁木齐他接受了采写兵团模范汽车驾驶员苏长福的任务。他曾多次深入天山腹地采访,花了几个月时间写出了长篇报告文学《苏长福的故事》,后由新疆青年出版社出版,但署名并不是艾青,而是换成了“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机运处集体创作”。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大型纪录片《中国的沙漠》,解说词原是由导演邀请艾青写成的,然而正式公演时,艾青写的却被抽走,另换了别人的作品……

艾青默默地吞下这一颗颗苦果,一笑置之,永远不愿再提起。然而他绝不辍笔。他曾花了五年时间深入莫索湾军区的所有军垦农场,记录下了一个个军垦战士的艰苦创业和勇斗沙漠的故事,终于写下了一部史诗性的长篇小说(此稿在粉碎“四人帮”后,定名《绿洲笔记》,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三

“文革”开始,中国的作家、诗人无不遭遇厄运——艾青更是在劫难逃。

1967 年 4 月的一天。艾青家闯

进一批号称“八一野战军”的“造反派”,不由分说把艾青家的行李、家具全都扔到汽车上,把艾青一家押送到了艾青儿子所在的师直农场一营八连,它位于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边缘,人称“小西伯利亚”。

艾青在这里先被分配去管理林带,后又被罚去打扫厕所。尽管如此,艾青一年四季依然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他的质朴和勤劳,得到广大农场职工的一致好评。老年人尊称他为“老艾青”,青年人尊称他为“艾青伯伯”,孩子们尊称他为“艾青老爷爷”。这些最普通劳动者,以其朴素的是非善恶观念,认准了艾青是个“大好人”,他们才不管什么右派不右派。

艾青的工资已经停发,每月只有 45 元的生活费维持一家五口人的生活,艾青买不起烟,吃不起肉,连队的职工纷纷伸出友谊的手,送去了自家省下的白面,送去了新疆特产莫合烟,即使是回内地探亲带回的珍贵的肉食,也要给艾青家悄悄送去一点。

艾青一家先住在两间旧土坯房里,随着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又被赶到一间连腰也直不起来的地窝子内。老职工们知道后都来帮忙,向地下深挖 50 公分后,身高一米八的艾青进屋后才可以直起腰来。

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艾青接受完农场专门组织的巡回批斗后,正艰难地深一脚浅一脚只身朝所住的连队走。一位老军垦的后代开着拖拉机飞驰而来,毕恭毕敬地把他请上驾驶室,冒着风险送他回家。

大家对艾青是如此厚爱,艾青对大家也充满了挚情。

艾青负责打扫厕所时,备有一件旧风衣和一双胶筒鞋,收工后就把它放在门前的棚内,不料一天竟不翼而飞了。连队领导知道后大怒:这小偷也太“那个”,什么人的不好偷偷要去偷大“右派”的,岂不是等于给阶级弟兄脸上抹黑吗?于是

扬言彻底追查,查出来好好整一顿。而艾青却童心不泯,居然找到连队领导真诚表示:如果追查出来,请勿多加责难。诗人认为,来偷这并不值几个钱的东西的人,其困苦程度亦可想而知矣,“不为困穷宁有此,祈缘恐惧转须亲”啊……

连队上有个上海知青叫郭建雄,成了艾青一家的朋友。艾青夫妇像关心儿女一样关心着小郭。1970年,小郭结识了四川姑娘小杨。艾青夫妇为他们穿针引线,架起鹊桥,操办婚事……小杨生孩子时正碰上连队卫生员外出,送医院太远又来不及了,艾青建议妻子高瑛担此重任。于是,在条件十分简陋的环境下,大漠上一个小生命呱呱堕地了——听到孩子的哭声,艾青紧悬着的心才落了下来,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四

国内尽管怎么折腾,艾青在国外的影响却没有因他从中国文坛上消失而随之消失。

70年代初期,有几个外国文学代表团来华访问,他们一踏上中国首都的土地,就纷纷询问艾青的近况。其中,有几位法国朋友还到过石河子访问。由于艾青早年曾留学法国,他们对艾青自然更为关注。他们一到石河子,就指名道姓开门见山地向当局提出:艾青就在此地,我们希望能会见一次诗人。

这倒使当局遭了难,难道把诗人从厕所工地召来相见?一时尴尬,只能支吾其语。

于是,后来就有了一辆北京牌小车开到艾青家的地窝子边,传达国务院及周总理对艾青一家的询问;于是,就有了1972年的结束“劳动改造”,将艾青重新接回石河子。

1975年,斯诺率美国新闻工作者代表团来华访问。在老朋友毛泽东的书房里,斯诺先生颇为伤感:这

次访问中国,很少见到延安时代那些文化界的老朋友了。接着,斯诺先生拜会了周总理,进行了十分友好的谈话。谈到延安文艺界的老朋友时,斯诺先生第一个提到的就是艾青。他说,西方国家对艾青诗作的研究经久不衰,艾青的诗集仍在出版……并询问了艾青的近况和表示了“我这一次很想见到艾青先生”的心情……当时新华社出版《参考消息》,以外电报道的形式,披露了斯诺先生与周恩来总理关于诗人艾青的谈话——熟悉当时“政治行情”的中国人知道,它实际上就是预示着诗人艾青快出来了。

1976年丙辰清明,赴京医治眼疾的艾青,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和人民群众一道,含泪悼念周总理,他饱蘸一腔沸腾的热血写下了长诗《清明时节雨纷纷》。

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不久,艾青得到彻底平反。1977年,艾青离开生活了17年的新疆,回到了首都北京。

1978年4月30日,《文汇报》第三版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刊出了艾青的诗作《红旗》:“火是红的/血是红的/山丹丹是红的/石榴花是红的/初升的太阳是红的……最美的是/在前进中迎风飘扬的红旗……”这是20多年来全国读者第一次在报刊上读到“艾青”这个熟悉的名字,不由惊喜万分,奔走相告。从此,艾青的诗歌创作一发而不可收:《在浪尖上》、《光的赞歌》、《古罗马的大斗技场》等力作迭出,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或许不会忘记,当年北京体育场朗诵《在浪尖上》时,“十万听众海潮般地咆哮起来”那是诗歌史上闻所未闻的壮观场面。

五

归来之后的艾青,在古稀之年

重新焕发出了艺术的青春,出现了超越自己过去所达高度的惊人飞跃,这在文学史上可以称之为奇迹。这奇迹的产生,我们可以从艾青曲折丰富的人生经历中,从诗人与人民群众生生死死的血肉联系中,从诗人高尚的品格中,寻找到正确答案的。

中国是诗歌王国,对于如何发扬中国诗歌这门优秀的艺术和发挥诗人在社会进步中的积极作用,是艾青一生的追求。重返诗坛的艾青,一方面以饱满的情感为人类幸福和世界和平歌唱,一方面对于中国诗歌事业的发展,也寄予了极大的期望和关注:数千年来,中国诗人还没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组织。在艺术领域中,有舞蹈家协会、音乐家协会,有美术家协会、书法家协会等等,而文学领域的作家协会几乎成了小说家协会,诗人所占比例极少,何况还有诸如散文学会、戏剧家协会、报告文学学会等等文学门类的组织。艾青常说:中国诗人为什么不能成立一个自己的组织呢?艾青多少年来有这样一个夙愿:有朝一日能看到中国诗人自己组织的诞生。艾老摔伤之后,即便是在家休养和病重住院期间,他对于“中国诗人自己的组织”仍是念念不忘。值得欣慰的是,在艾老的倡导鼓舞下,由著名诗歌评论家张同吾、诗人李小雨、桑恒昌等诗歌同仁共同发起的“中国诗歌学会”,在中宣部、民政部、中国作协等有关领导的关怀支持下,终于在近期获准成立。病榻中的艾青获知喜讯露出了微笑,他终于了却了一大心愿。然而,身为中国诗歌学会会长的艾青,却未能真正等到成立大会召开的那一天……

一代诗坛大师就这样离开了我们。然青山常在,绿水常流,诗人高洁的灵魂永驻人间。

(责任编辑 舒 蓝)

1958 年那条“总路线” 形成前后的党内争论

● 李 锐

1958 年在中国，先后出现了三面红旗。这就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虽然分开来说是“三面红旗”，其实三位一体。当年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高估产、全民动员、昼夜苦战，用“高潮”一类字眼已经不能显示出它的规模和气势，只能叫做“大跃进”。而总路线，既是这一场“大跃进”的动员口号，又是它的指导方针。人民公社这种将每一个人从生产到生活都管起来的准军事组织，就是贯彻总路线、实现“大跃进”的组织形式。三者缺一不可，缺一即无法构成当年这一“壮观无比”的历史图景了。

这里只来探讨一下当年这条总路线形成的经过。总路线的形成是从批判反冒进开始的，因此先要谈冒进与反冒进的问题。1955 年夏，党内围绕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的问题，发生了争论。毛泽东指责持稳步前进意见的邓子恢，“像一个小脚女人”，从而在党内发起批判“右倾保守”的斗争。这个斗争推动了农业合作化运动迅猛发展。几个月之内，有五千几百万农户加入了合作社，预定要 18 年完成的农业合作化，竟然提前 11 年完成了。这件以批判开路，被人为加速了的事情，使毛泽东极为兴奋。他由此及彼，以为

农业的改造可以这样，那么手工业的改造，其他各项工作也无不可以这样了。这年 12 月 27 日，他写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其中说道：

“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

“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

从 1955 年底开始，毛泽东认为在各方面都要开展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的斗争。结果，1956 年各方面的工作都出现了冒进的偏向。对已经出现的冒进偏向，中央其他领导人开始警觉，并试图加以纠正。于是在国务院和党中央，也就不断出现了反冒进的声音。

1956 年 1 月，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虽然也讲到右倾保守思想的严重性，但同时提醒说，不要搞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要“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

的计划，而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7 月份，周恩来在国务院第 24 次全体会议发言时，又强调“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要小心谨慎。要多和快，还要好和省，要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从这时开始，周恩来在经济方面抓了反冒进的措施，如基本建设投资规模的控制，压缩原定的 1956 年计划指标等。

1956 年 5 月，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会议，确定经济发展要实行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

6 月 15 日，财政部部长李先念向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作决算和预算报告，其中说：

“生产的发展和其他一切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在过去几个月中，在许多部门和许多地区，都已经发生了。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帮助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只能招致损失。”

6 月 20 日，《人民日报》根据 5 月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发表题为

《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其中说：

“急躁情绪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是存在在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一出来，各个系统都不愿别人说自己右倾保守，都争先恐后地用过高的标准向下布置工作，条条下达，而且都要求得很急，各部门都希望自己的工作很快做出成绩来。中央几十个部，每个部一条，层层下达，甚至层层加重，下面就必然受不了。现在中央已经采取一系列的步骤，纠正这种不分轻重缓急，不顾具体情况的急躁情绪。各个部门和各个地方的工作中的冒进倾向，有些已经纠正，有些还未纠正，或纠正得不彻底，但作为一种思想倾向，则不是一下子所能彻底克服的，需要我们在今后经常注意。”

这篇社论这样分析发生盲目冒进偏向的原因：

“这主要是由于我们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造成的。由于没有运用辩证的方法，没有从事物的复杂的矛盾和联系中去全面地观察问题，只从一个方面、一个角度去看问题，就把许多问题看得太死、太绝对化。又由于缺少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对实际情况了解得不够，心中无数，有盲目性。在这种情况下，处理事情当然就容易偏于一面，发生片面性。在反保守主义之后，特别是中央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和发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之后，在许多同志的头脑中就产生了一种片面性，他们以为既然要反对保守主义，既然方针是‘又多、又快、又好、又省’，既然要执行四十条，于是一切工作，不分缓急轻重，也不问客观条件是否可能，一律求多求快，百废俱兴，齐头并进，企图在一个早晨即把一切事情办好。这样由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当然

免不了要犯错误。”

反冒进基本遏制了急躁冒进的势头，在中央、地方和各部门，稳步前进已成为大家的共识。党的八大也改变了原来将反右倾保守作为中心议题的设想，大会提出的经济工作指导方针为：既反右倾保守，又反急躁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这一方针反映在大会通过的政治报告决议和关于“二五”计划的建议中。这一改变，可以说是对前一段反冒进工作的肯定；所确定的上述经济工作方针，已经不是针对某一时期的工作偏差的权宜之计，而是关于经济建设整个过程具有长期指导意义的方针了。

八大之后，反冒进仍然继续进行了一段时间，主要围绕制定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和预算的制定。

11月10日，周恩来在八届二中全会作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基调也是反冒进。他说：

“过去设想的远景计划，发展速度是不是可以放慢一点？经过八大前后的研究，我们觉得可以放慢一点。比如，原来设想钢产量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要达到年产三千万吨，肯定地说，照现在这个速度

是不可能实现的。……现在不能定到三千万吨。因为定到三千万吨，其他就都要跟上去。那就会像我们常说的，把两腿悬空了，底下都乱了，不好布局，农业、轻工业也会受影响，结果还得退回来。”

在这个报告中，周恩来还谈到毛泽东欣赏的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

“关于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这也是一个建议，是一个草案。……并不是不可以修改的。比如扩大耕地面积，要求12年内开垦一亿四千万亩显然是有困难的。如果每年开垦一千万亩，就要投资五亿元。这五亿元的投资，明年度无论如何也挤不出来，今后也不是每年都可以挤出来的。”

对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估计，周恩来在这个报告中说：“经过国务院会议多次讨论，大家认为，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上是正确的，成绩很大，但是错误不少。”谈到错误，他用了一个“冒”字：“1953年小冒了一下，今年就大冒了一下。”陈云对1956年的估计也是如此。这年11月，他在商业部的一次会议上说：“经济建设，1953年是小冒，今年又



1958年3月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视察农村时与农民交谈

是小冒,比1953年冒的还大一点。暴露的问题也就更明显一些。”他还指出:“文章上写既要反对‘左’倾,又要反对右倾,这是容易的,但做起来就很不容易。”

所有这些意见,毛泽东都是不同意的。事实上,对于反冒进,当时他虽然没有明确表示反对,但内心一直持保留看法。1956年6月那篇后来引起轩然大波的《人民日报》社论,草稿送他审阅时,他批注三个字:“不看了”。大家当时没有意识到这三个字的严重性。后来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过,他之所以不看这篇社论,是因为那篇反冒进的社论是反对他的。

11月15日,就在周恩来作报告后的第五天,毛泽东在二中全会上讲话,终于表明了对反冒进的不满。

他批评了李先念的预算报告。他说:“1956年国家预算报告中说过‘稳妥可靠’这个话,我建议以后改为‘充分可靠’。”为什么呢?他说:“稳妥和可靠,意思是重复的用稳妥形容可靠,没有增加什么,也没有限制什么。形容词一面是修饰词,一面是限制词。说充分可靠,这就在程度上限制了它,不是普通可靠,是充分可靠。”这不是语文教员给小学生讲授文章作法,他是忌讳这一个同急躁冒进相对立的“稳”字。

对于几天前周恩来在会上报告中的一些论点,毛也作了反驳。关于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估计,他说:“从前四年的情况可以看得清楚,第一个五年计划根本正确。至于错误,确实有,这也是难免的,因为我们缺少经验。……总的说来,现在看不出第一个五年计划有什么大错,有什么根本性质的错误。”

他用“要保护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这样的话,表示了对反冒进的不满。

几个月之后的整风运动中,无党派人士张奚若批评了“好大喜功,

急功近利”的作风。一些民主党派人士也提出了保守和冒进何者的危险更大,这样尖锐的问题,对1956年经济建设中的急躁冒进倾向,以及造成的偏差,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在整风运动转向反右派斗争的过程中,毛泽东把党内的反冒进同右派进攻联系了起来。1958年3月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在《一批按语》中说明了这种联系:“我们没有预料到1956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样大的风浪,也没有预料到1956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

1957年9月到10月举行的八届三中全会,一方面是总结反右派斗争,一方面是反反冒进的正式开始。10月9日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就来算1956年反冒进这笔账了。他说:“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好、省我看没有哪个人反对;就是一个多、一个快,人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去年下半年一股风,把这个口号扫掉了,我还想恢复。……还扫掉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这个‘四十条’去年以来不吃香了,现在又‘复辟’了。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去年那股风扫掉的促进委员会,现在可不可以恢复?从这次会议看,大家都是想要促进,没有一篇演说是讲要促退的。要促退我们的,是那个右派章罗同盟。”他把反冒进同右派进攻联系起来。

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对反冒进的不满已经有所表示。到了三中全会上,反对反冒进便成了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到了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反反冒进就更成了会议的主题了。

1958年1月11日至22日的南宁会议,有两大内容:一是毛泽东对过去经济工作的批评,主要是批评1956年的反冒进;二是讨论和制

定《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毛泽东在11日、12日、13日、16日先后作了四次讲话,并在听取汇报时,插了许多话。他在这些讲话和插话中,对反冒进作了严厉的批评:

——“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好不好?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不得了。十个指头问题要搞清楚,伸出手看看,究竟有几个指头生了疮?不过一个指头有毛病,不过多用了一些钱,多用了一些人,就‘库空如洗’呀,‘市场紧张’呀。只讲一个指头长了疮,就不会形成一股风,吹掉了三个东西: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些都是属于政治问题,而不属于业务。一个指头有毛病,治一下就好了,原来‘库空如洗’、‘市场紧张’,过了半年不就变了吗?钱花多了,计划大了,要批评,我也批评过,如广东、河北通县专区产量定得过高。我是‘抱着石头泡汨汨’(泡汨汨,湖南方言,游泳),做事历来是稳当的。”

——“十个指头是关系六亿人的问题。对于我们共产党,对于我们的事业来讲,总是九个指头是好的,不过一个指头有毛病。那就是究竟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搞泄气,使整个工作受到很大损失的问题。这一点被右派抓住了,来了一个全面‘反冒进’。陈铭枢批评我‘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喜怒无常,不爱古董’。张奚若(未划右派)批评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陈叔通也讲过:‘我看方针是冒进为主,保守为副’。过去北方亩产一百多斤,南方二三百斤;蒋委员长积20年之经验,只给我们留下四万吨钢(年产)。”“好大喜功”,看什么大,什么功,是反革命的好大喜功,还是革命的好大喜功。不好大,难道好小?中国这样大的革命,这样大的合作社,这样大的整风,都是大,都是功。不喜功,难道喜过?‘急功近利’,不要功,难

道要过？不要对人民有利，难道要有害？‘轻视过去’，轻视小脚，轻视辫子，难道不好？北京、开封的房子，我看了就不舒服，青岛、长春的房子就好。我们不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还有什么希望？‘偏听偏信’，不偏听不可能，是偏听资产阶级，还是偏听无产阶级的问题。有些同志偏得不够，还是要偏。我们不能偏听梁漱溟、陈铭枢的。



1958年5月5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

‘喜怒无常’，常有，也并不好，不能对资产阶级右派老是喜欢。‘不爱古董’，这是比先进，还是比后进的问题，古董总落后一些嘛。我们除四害，把苍蝇、蚊子消灭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总是后来居上，不是‘今不如古’。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

——“1956年‘冒进’，1957年反‘冒进’，1958年恢复‘冒进’。看是‘冒进’好，还是‘反冒进’好。河北兴修水利，1956年1700万亩，1957年200万亩，1958年（准备搞）2700万亩。治淮河，七八年共花了12亿元，只做了12亿土方；安徽去冬今春八亿土方已超额完成，决定再做八亿土方，一共不过用几千万元。双轮双铧犁，浙江发动全省讨论，浙江、安徽、两湖都能用，要为双轮双铧犁恢复名誉，重新启用。扫盲，路上挂识字牌，还要坚持。”——“我乃罪魁祸首。1955年12月写了《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书序言，反了右倾保守，对全国发生了很大影响。是个人崇拜也好，偶像崇拜也好，不管是什么原因，各地大小报纸刊物都登了。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后来又心血来潮，找了34个部长谈话，大家劲都很足，谈十大关系，就头脑发胀了，‘冒进’了，我就

不敢接近部长了。三中全会，我讲去年吹掉了三个东西，没有人反对，我得彩了，又复辟了，就又有勇气找部长谈话了。这三年有个曲折，右派一攻，把我们一些同志抛到离右派只有50米远了。右派来了个全面反‘冒进’，什么‘今不如昔’，‘冒进比保守损失大’，研究一下，究竟哪个大？”

毛泽东严厉批评了《人民日报》那篇《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使得会议空气极为紧张。他说：

“这是一篇反‘冒进’的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不是一个指头有了病。这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骂我的，为什么要看？那么恐慌，那么动摇。只有一个指头有病，是九与一之比。这篇东西没有弄清这个比例关系，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像陈叔通、黄炎培、陈铭枢的方法。社论针对谁？是针对我的‘序言’提出批评。又引用了我在‘序言’中讲的一段话（按：社论引了这一段：‘人们的思想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当然，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

情’。）文章把我撇开，又要利用我。一不麻烦我，二可利用我打别人。”

为了追究这篇社论的责任，从北京取来了原稿。在中央宣传部起草的稿子上，除胡乔木、陆定一的修改之处，还有刘少奇的几处修改，这些修改加重了原来的语气。这样，刘少奇也就同反冒进有牵连，也成了个有过错的人，从此更不便在毛泽东跟前说话。于是也就开始进一步形成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独一无二的地位。

南宁会议上辞严色厉地反反冒进，实际上揭开了“大跃进”的序幕，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提出，做好了思想准备。有了这个前提，总路线也就呼之欲出了。

1958年3月8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举行工作会议，有部分中央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几次讲话，并在一些人发言时插了许多话。3月9日，毛泽东提出25个问题，要大家讨论。第十三个问题是：

“两种方法的比较，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南宁会议批判了‘反冒进’的错误。究竟采取哪一种？我看应采取‘冒进’。很多问题都可

以这样提。如除四害，一种是老办法，不除（苏联不除）；一种是要除掉。如何除？也有两条路线，有快有慢。一说快除，就能除掉，越慢越除不掉。如执行计划，一种方法是十年计划二十年搞完，一种是二三年搞完。又如肥料，1957年比1956年多一倍，1958年要超过1957年一倍。湖北今年积160亿担（1957年70亿担），平均每亩6600斤。肥料多好，还是少好？去年搞‘马克思主义’，生产不起劲，今年搞‘冒进’，还要超过1956年。哪种办法好？1957年的‘马克思主义’好，还是1958年的‘冒进’好？办任何事情都有两种方法比较。苦战三年，改变面貌，但‘一天消灭四害’，‘苦战三天’，当然不行。这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了。”

第十六个问题提出“跃进”的口号：

“要跃进，但不要空喊。指标很高，实现不了。通县原来亩产150斤，1956年提出要一年内就产800斤，没有实现，是主观主义。这也无大害，屁股不要打那样重。现在都跃进，有无虚报、空喊？不切实际的毛病？没有具体措施，工农商都可能有此情况。现在不要去泼冷水，而是

提倡实报、实喊；要有具体措施，保证口号的实现。”

这样的一种说法：对虚报、空喊，也不要泼冷水。高指标实现不了，屁股也不要打重了。这就实际上为不久之后遍及全国的高指标和高产卫星的出现，开辟了道路。

第二十五个问题，宣布了反“反冒进”目的不是整人。他说：

“过去八年的经验，应加总结。南宁会议提出，反冒进是个方针性质问题，有许多同志紧张。现在好了，谈清楚的目的在大家有共同语言，绝不要使哪一个同志不好混之意，而是为了做好工作，好混，绝非不好混。目的是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到冒进上来。有了冒进的共同语言，就好混，绝非不好混。”

没有参加南宁会议的陈云，在成都会议上不能不作有关反冒进的检讨。

在1958年3月10日的讲话中，毛泽东还提出了要区分两种不同的个人崇拜和两种不同的反个人崇拜，他说：

“赫鲁晓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也是一种压力。中国党内绝大多数人是不同意的，有一些人屈服于这

种压力，随声附和，要打倒个人崇拜（有的是过去压力残余，心理状态复杂），还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我们不是崇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吗，斯大林正确的东西也还要崇拜。对于他们，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现在既有个人崇拜，也有反个人崇拜。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不外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崇拜自己则很舒服。”

1958年3月18日陈伯达作了长篇发言，说是经过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中国出现了大跃进的形势，“一天等于二十年”，毛泽东在陈伯达发言时赞许地插了许多话，举出修水利，渤海区一个合作社的一些数字，印证陈伯达的话。在插话中，毛泽东还说了这样的意见：

“‘反冒进’那个时候，同志们倒不是不赞成搞生产建设。156项，800多项，都是要搞的。只是当前遇到困难怎么办？相当限制一些是可以的。但是当作理论性的问题提出，市场和基建，搞几个平衡，恐怕就不妥当。”

“两个速度分歧：一个是改造速度，同邓子恢；一个是建设速度，冒进派与反冒进派。我是‘罪魁祸首’，就是写了这篇序言，又提出几个口号，一个农业四十条，一个促进委员会，一个多快好省。不促进岂不变国民党？这是1956年1月党的知识分子大会上，到了一千多人，我在会上放了一炮，说共产党是促进委员会，国民党是促退委员会。多快好省，这四个字形成有个过程，开头只有多快好，‘省’字是富春同志加的，那是1955年。四十条是一个积极的农业纲领。农业发展了，工业就有了市



周恩来在中南海和科学家交谈。左起：周恩来、孟昭英、梁思成、马大猷

场,有了积累,寄很大希望于农业。这四十条也是大家谈出来的,开始只有十五条、十七条。大家都很积极,包括我们总理和陈云同志。1956年预算,基建费搞大了,市场问题一来,有些东西就压缩了一下,是应该压的,基建那时不压缩一下也不行。问题在连带把这三个东西都吹掉了。三中全会开会前,在休息室时,我同我们几个常委谈了,把多快好省、促进会、四十条吹掉了。全会讲话时,我就插出来了。会场那么多人,都不敢讲,不敢提多快好省,可见那时候的空气。我还讲到,只记得郭沫若在哪次讲演中还提到多快好省,我说只剩下这一个知己。我讲完了,会场还是鼓了掌的。鼓掌不是反对,而是赞成嘛。后来也没有一个人写信给我,对我讲的表示反对。所以,我说这三个东西复辟了。复辟了,我就有劲了,有三中全会的合法根据。在杭州、南宁会议上,我就发难,就大讲了一口气。”

陈伯达在这次讲话中谈到,现在是在跟帝国主义争时间争速度的问题,毛泽东插话说:“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可以这么看,同帝国主义争时间,争速度。假如帝国主义都搞掉了,也是两种办法:一种是干劲十足,群众路线,在轰轰烈烈热潮中前进;另一种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也可以是这样一条路线,‘凄凄惨惨,冷冷清清’,那并不见得好。这是宋朝女诗人李清照的一首词。她是个寡妇。这首词可能是金兵打杭州,把宋高宗追到海里头那个时候写的。是以一个寡妇面孔、寡妇心情来建设社会主义,还是以另外一种心态建设社会主义?”

我参加了成都会议,当时对于这样解释这首词颇不以为然。外敌入侵,国破家亡,诗人把个人生活中的不幸和国家的受难交织在一起,吟成这首千古绝唱,把它看作寡妇心情的代表作是很不恰当的。我曾

把这意思同田家英谈过。

由于毛泽东一再强调建设的高速度,成都会议一边倒的局面,反复重申速度问题,也就形成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基本思想。毛泽东在3月20日的讲话中,第一次把总路线完整地提了出来。他说:

“只要路线正确——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这几句话更通俗)。那么后一年、二年、三年至五年完成四十条,那也不能算没有面子,不能算不荣誉,也许还更好一些。……建设的速度,是个客观存在的东西,凡是主观、客观能办到的,就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总路线下,波浪式的前进,这是缓与急的对立的统一,劳与逸的对立的统一。”会上,陈伯达受命对这条总路线的基本思想,作了文字表述。

回顾这段历史,真是令人感慨不已,就在这一篇讲话中,毛泽东还流露出了点犹豫的心情。他说:“路线由于群众斗争和我们思想反映已开始形成,但尚待完备,尚待证实,不可说已经最后完成了。错误还是要犯的,不可能不犯。犯错误正是形成正确路线的必要条件,二者的对立统一。”

在1958年3月22日的讲话中,毛泽东还希望人们讲真话。他说:

“我很高兴,最近出现的大字报表现了群众的首创精神,很有气魄,批评得尖锐、生动,把暮气、庸俗空气一扫而空。而我们呢?老是穿着粉底朝靴,四平八稳踱方步,‘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不讲真心话,不敢暴露自己的缺点,不敢批评别人的看法,就是说,也是吞吞吐吐,毫不尖锐。恩来在1956年二中全会的报告敢说心里话,这一点可取,虽然是错的。”

1958年5月5日至23日在北京举行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宣告了“大跃进”的开始。会议第一天刘

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会议作了工作报告。这篇报告经过毛泽东两次修改补充,它实际上是毛在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上说过的那些意见有条理的综合。会议正式宣布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毛泽东在会上讲了四次话。在会议闭幕那天他这样讲到总路线:

“过去几年,特别是去年一年,有些人对多、快、好、省的方针还不清楚,到底对不对,有怀疑的,反对的不少。这个情况是不可避免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是客观存在的,有些人看到了,有些人看不到,经过一些时候,经过反复看,才看到了。总路线的形成是曲折的,道路是曲折的。以后是不是没有曲折了呢?不会的,还会有曲折的。这次大会制定的总路线,还要在客观实践中去证明;虽然经过去年冬天今年春天的大跃进,已经有所证明了。过去三年是个马鞍形,两头高,中间低;前年高,去年低,今年又高了。有了这个变化,我们这次会就开好了。”

又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个提法很好,是新鲜的提法,反映了人民的干劲。干劲用‘鼓足’二字比较好,比‘鼓起’好,真理有量的问题。因为干劲早就鼓起来了,问题是足不足,至少要有六七分,最好八九分,十分才足了。‘鼓足干劲’是个新话。‘力争上游’从前也有,不是新话,但是现在有新意。”

他举了一些实例说明什么叫力争上游,例如原来规定要十二年实现的《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可能在五年之内实现,有的省甚至说一年即可实现,在对外宣传时说二年实现,留有余地。从国外来说,就是争取七年超过英国,十五年超过美国,如此等等。

总路线提法上有“多、快、好、省”四个方面,但实际上,不仅后来的实践,即在最初理解上也只是一



陈云(中)、
李先念(右)、
陶铸(左)
合影

个“快”字，突出一个“快”字。八大二次会议之后，《人民日报》社论《力争高速度》就说得很清楚：“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它像一根红线，贯穿在总路线的各个方面。如果不要高速度，当然没有多快好省的问题；那样，也就不需要鼓足干劲，也就无所谓力争上游了。”社论反复强调“快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这个思想。而当时人们也主要是从“快”的方面来理解和掌握总路线的，这也是总路线的首倡者的本意和真谛。所以，讲了“多、快、好、省”四个方面的总路线，是只讲“快”（或者还包括“多”）而不顾“好”与“省”（或忽视“好”与“省”）的总路线。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不只一次讲了要破除迷信，讲了青年人胜过老年人，讲了学问少的超过学问多的，并提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样的一个“公式”，认为“科学、技术发明大都出于被压迫阶级，即是说，出于那些社会地位较低、学问较少、条件较差，在开始时总是被人看不起，甚至受打击、受折磨、受刑戮的那些人”。他让编印发明家的传记集来证明这一点，以此来“鼓舞很多小知识分子，很多工人和农民，很多新老干部丢掉自卑

感，欲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对于我国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赶上美国的任务，必然会有重大的帮助。”

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地鼓吹这一点，是为总路线的贯彻和大跃进的开展作舆论和宣传的准备，实际上所谓破除迷信，就是破除对科学知识的迷信，破除对工程技术人员的迷信。“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一方面是进一步贬抑知识分子，一方面是为科学知识不多的人壮胆。敢想敢说敢做。这些号召，就为大跃进中那些千奇百怪的“新生事物”开辟了道路。像大大超过常识的农作物产量之类，如果不破除迷信，不敢想敢说敢做，是绝对无从出现的。

毛泽东说了，目的不是整人。可是，不整人则无以立威。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严厉处分了一些高级干部。只说毛在讲话中点了名的，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的，就有作家协会副主席丁玲，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李世农，浙江省委常委、省长沙文汉，广西省委常委、副省长孙作宾。此外受到处分的，还有山东惠民地委第一书记李峰，广东省委

书记处书记古大存，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赛甫拉也夫。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更是在这次大会上受到批斗，被撤销了职务，罪名是右倾机会主义。处分了这样一批高干（古大存、潘复生是八届候补中委），你怕不怕？这种政治上的压力，促使到会代表思想统一到总路线、大跃进上来，显然起了重要作用。

这条总路线提出到今天已近40年，它在历史上起了怎样的作用呢？回想1980年中共中央组织四千人讨论中共第二个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草案的时候，多数人对造成一场巨大灾难的“大跃进”，对于破坏人民群众正常生产和生活的人民公社，都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对于“总路线”，一些人却认为应该与前两者有所区别，不应完全否定。我的看法是：

第一，不能因为它反映了人民群众要求改变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愿望，就认为它包含有正确的成分。任何一种认识、政策、方针，都是对客观的反映。问题是反映有正确和错误两种，正确的反映是对客观现实的合理认识，错误的反映是对客观现实的片面认识甚至曲解。总路线虽然反映了改变落后面貌的愿望和要求，但是没有反映现有国力难以迅速实现这些愿望和要求的客观现实，因而有严重的缺陷，导致实际执行中的灾难性后果。毛泽东在《学习与时局》一文中对几次错误路线的分析，对我们是极有启发意义的。他指出，那些犯路线错误的人，他们“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和我们之间是没有争论的”。良好的愿望并不是路线正确与否的决定因素。

第二，诚然，这总路线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是很好的话。但是我们判断一种政策，一个方针，不能只看它用怎样的字句来表述，而要看它的实际内容，看它在实践中所起的作用。前面已说过，总路线是在

反反冒进的形势下形成的,以突出“快”字为中心,带有极大的片面性和缺陷,在实践中主要起的是负面作用。

第三,正如本文开头所说的,“三面红旗”是相互关联,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总路线”是第一面旗帜,是“大跃进”运动的指导方针;而

“大跃进”运动则是总路线实施的产物,也是总路线在实践中的必然产物。“大跃进”所造成的灾难,也就是总路线所造成的灾难。

编者附记

李锐同志的这篇文章,是以事实为根据,展开说明了1958年那条总路线的形成的过程以及它的性质是一种全局性的错误。这对于从过去的错误中学习,使失败变为成功之母是必要的。

邓小平同志在1980年4月1日谈话中曾说过:“总起来说,1957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1980年8月下旬,邓小平同志和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谈话时又说,“他(毛泽东)在一生的后期,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错误的。”法拉奇于是就问邓小平:“过去还有其他错误,大跃进难道不是错误?照搬苏联的模式难道不是错误?对过去这段错误要追溯至何时?”邓小平回答说:“错误是从50年代后期开始的。比如说,大跃进是不正确的。”“主观愿望违背客观规律,肯定要受损失。”邓小平同志在1988年6月22日的谈话中又说:“‘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国吃了苦头。中国吃苦头不只这十年,这以前,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邓小平在这里说的,都是全局性的错误,而不是个别的、局部性的错误。邓小平又多次说过,从1957年下半年起,中国党犯了二十年的“左”倾错误,最“左”的是十年“文化大革命”,耽误了二十年经济建设的时间(按:所谓二十年是算整数而言的,其实算到毛泽东逝世是19年多,算到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是21年多)。邓小平在1987年4月30日的谈话中还说:“1957年开始,我们犯了‘左’的错误,政治上的‘左’导致1958年经济上搞‘大跃进’,使生产遭到很大破坏,人民生活很困难。1959、1960、1961年三年非常困难,人民饭都吃不饱,更不要说别的了。”所以把三年“大跃进”及其导致的三年严重饥荒,说成不是全局性错误,这是很困难的。

至于照搬苏联模式的问题,1980年8月邓小平没有直接回答法拉奇的提问,但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同南共联盟科罗舍茨谈话时,却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邓小

平在1988年5月18日的谈话中又说:“坦率地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

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谈到了1958年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决议说:1958年,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前后,“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开来。”《决议》说:“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过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决议》所列举的这些事实,都说明在全国长达几年地推行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反右倾”等使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的错误,不能说是个别的、局部的、短时间的、不太严重的错误,而是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在党的历史上不多见的严重“左”倾错误。为什么说它是“长时间的”呢?因为1925年到1927年大革命后期的右倾错误延续时间仅有半年,盲动主义错误只有五六个月,立三路线错误只有三个月,只有王明“左”倾错误是延续了四年之久的,抗战初期的王明右倾路线也只有大约十个月。而1958年起造成三年饥荒的“左”倾错误算到1961年也有四年之久,而且1958年的那条急于求成的总路线以及整个三面红旗,1962年以后也不承认是错误的,在五年调整期间及其以后仍然是“高举三面红旗”,实际上这种全局性的“左”倾错误是延续了二十多年,到了1978年12月才真正纠正的。

(责任编辑 杜晋)

解放初期为剿匪屡建奇功的

『二〇八』情报站斗争纪实

● 王方业 撰稿 赵青 改编



“二〇八”情报站部分人员

从左至右：站长李守福、钟天麟、米玉丰、萧光华

本世纪50年代初期，伟大的解放战争已然胜利结束，但在新解放区的农村尤其是山区，土匪活动十分猖獗。当时的土匪，数以百万计，大部分是国民党残余武装转化的政治土匪，有的已经和逃窜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重新取得联系和空中补给。为此，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部署下，开展了大规模的剿匪斗争。各级公安机关和公安武装紧密配合人民解放军，积极投入了这场斗争。这里，我们将要介绍的是川西剿匪中的一支出生入死、屡立奇功的公安侦察队伍——“二〇八”情报站的战斗历程。

“利沅商号”： 神秘的总部

1951年夏，在川西理县杂谷脑有一家“利沅商号”开张了，为这穷山僻壤的居民提供了诸多便利；虽是小买卖，却也生意兴隆，还在马尔康、阿坝设了分号。“利沅商号”可谓远近闻名，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家商号正是我“二〇八”情报站站部。

“二〇八”站成立于1951年7

月，由川西公安厅政治保卫处侦察员李守福任站长，受川西公安厅和茂县专区公安处领导。为了接近匪特，深入敌内，该站从成都市公安局挑选了15名已经向人民政府自新的原国民党警特人员，由李守福带领进入茂县地区，以“利沅商号”为掩护，开展侦察工作。

茂县地区是藏族聚居的地方，当地的统治者是土司或头人。“二〇八”站的主要任务就是：配合军事清剿，为部队提供准确情报；了解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政治动向，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做好争取团结工作，以孤立、瓦解匪特分子；对重要匪首周迅予、何本初、傅秉勋等，则伺机予以诱捕或处决。

随着对敌斗争的全面展开，一路路侦察组直插匪巢，历经困苦，机智勇敢地获取了许多重要情报，同时也付出了重大的牺牲。

“大陆台湾”： 蒋介石致信嘉勉

成都解放前夕，特务头子毛人凤受蒋介石指令窜到成都，与在四

川的国民党军警宪特头子紧急策划,组织了以特务分子为骨干的“反共游击”武装“西南反共救国军”,任命成都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军统少将特务周迅予为“第三纵队”司令,活动在松潘、理县、茂县等少数民族地区。不料,1949年底,这支刚刚建立的“第三纵队”,在新津就被我军打垮。

1950年3月,周迅予率残兵携电台逃到川西北地区,与国民党七十二军师长傅秉勋(后被蒋介石委为七十二军副军长)、四川省第十六行政督察区专员何本初汇合,建立“川康人民救国军”,周迅予任总指挥,傅秉勋、何本初任副总指挥。

他们按照台湾特务机关的指令,建立武装,依靠土司,扩大地盘,将军队扩编为“川康甘青边区人民反共突击军”,下设7个纵队,委任当地一些反动势力头子为司令,发展匪特3000多人。

台湾特务机关为了加强对这些匪特的领导,先后在黑水、草地等匪特控制的地区空投了20多名特务、武器教官以及10余部电台和大量军需物品。

匪特反动气焰甚是嚣张,疯狂叫嚣:“大陆台湾已建成,反攻之举指日可待。”

1952年3月,蒋介石亲自写信给傅秉勋:

“两年余来,同志与永和(苏永和,黑水藏族头人)等执行反共抗俄任务,艰苦奋斗,深为嘉慰,仍希和协永和同志及各级干部人员,严密组织,整顿纪律,一面防止共匪渗透,确保基地之安全;一面团结一切反共力量,奋斗到底,以乘应将来国军之反攻,予以有力支持也。”同时,蒋介石、毛人凤和另一特务头目叶翔之,还专门致信藏族头人苏永和、华尔功成烈、索观瀛,要他们同周迅予、傅秉勋等“精诚团结,共同反共”。

“黑水战役”:

“二〇八”初试身手

为彻底肃清盘踞在川西北地区的匪特,1952年6月,我人民解放军发起“黑水战役”,对黑水地区形成包围之势。

为配合剿匪部队的军事行动,“二〇八”情报站派出的九路侦察组跋山涉水,悄悄摸近匪特的巢穴。他们将不惜一切代价,在“黑水战役”打响前,完成党交予的特殊任务。

1951年12月,情报员刘建雄化装成少数民族雇脚,前往黑水木苏,执行捕杀匪首张定华的任务。16日,刘建雄随同由马尔康给黑水喇嘛送食品的驮队,进入黑水张定华的控制区。一个星期过去,刘建雄始终没有找到下手机会,正当他焦急地准备孤注一掷的时候,不料被张定华察觉了。在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黑水六台寨内松火通明,被捆绑在木桩上的刘建雄,面对周围凶神恶煞似的匪徒,他大义凛然,至死也没有低下高昂的头……

就在刘建雄牺牲的这一天,“二〇八”站派出另一情报员康伯桃,前往黑水地区执行侦察匪情的任务。此时,黑水地区匪特封锁严密,要顺利进入黑水地区异常困难。为了完成任务,康伯桃与一名小寨主扎西拉上关系,二人喝血酒,结兄弟,安全潜入黑水,落脚扎西家中。此后,康伯桃又先后与石板因的几位藏胞结为伙伴,共同深入匪特驻地,全面了解匪特兵力及部署。由于康伯桃在黑水时间较长,引起匪特怀疑。1952年4月初,黑水匪特的一个支队长率匪闯入扎西家,抓走康伯桃,用烧红的火箭夹手烙背,肆意毒打,严刑拷问。但遍体鳞伤的康伯桃一口咬定自己原是国民党特务大队长身份,到黑水是来作生意的,始终没有暴露真实身份。匪特万般无奈,只

好将他关押起来。后来,康伯桃的一个朋友,在4月下旬的一个深夜,用酒将看守灌醉,从牢中救出康伯桃,双双逃离匪巢。

事隔多年,康伯桃老人在回忆那段经历时,依然感慨万千:“说实话,当时真不知哪儿来的那么大勇气,承受住了特务的严刑拷打。要感谢李先生(即李守福)平日对我们的教育帮助,他总是组织我们学习《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马特洛索夫的英雄事迹。”老人身上至今还留有被匪特烙伤的疤痕。

“二〇八”站的情报员就是这样不畏艰险、出生入死地去执行任务,将黑水地区的地理位置、敌兵力部署、武器装备甚至匪首的姓名、简历等一份份情报,准确、细致而又及时地送到茂县专区公安处和我剿匪部队的指挥员手中。

1952年9月,历时3个月的“黑水战役”胜利结束,我军取得了歼灭匪特3000余名,击毙傅秉勋、张定华等匪首的辉煌战果,彻底解放了黑水地区。

西南军区、川西军区首长高度评价了“二〇八”站所做的工作,称其为“插入匪特心脏的一把尖刀”。

“草地战役”:

鲜血绘出进军图

1953年3、4月间的“草地战役”,是川西北地区清剿武装匪特的又一个大的战役。

我国西北地区解放后,漏网的匪首马良、马元祥和边仙桥(胡宗南部军政处处长)等残匪逃到阿坝草地,得到阿坝土官华尔功成烈等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暗中资助,草地成为马家匪的天下。1952年初,马家匪与黑水傅秉勋取得联络后,傅派空投特务携电台到草地,直接与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联系。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得到马良、马元祥

的报告后,有意在草地开辟“反共第二基地”,于1952年4月通过电台委任马良为“中华人民反共救国军第102路司令”,马元祥为“103路司令”,令其速建武装。为进一步给他们打气,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还向草地空投特务、电台、轻重武器、弹药及在台湾伪造的大量人民币和反动宣传品。

“二〇八”站站长李守福根据川西公安厅的指示,于1952年10月中旬,把站部迁到阿坝的塔洼,开设了一个私人诊所,以行医为名,广泛接触当地群众,收集情报,掩护站部工作。

同时,李守福从阿坝向草地的唐昆、索格藏寺、辖漫等地,派出6个小组和单线人员10多人,深入匪特控制地区侦察情报。为给我剿匪部队提供一条最佳的进军路线,“二〇八”站的情报员们,尤其是几位少数民族同志做出了突出贡献。

情报员米玉丰,回族,通藏话。1952年10月,他受命前往唐昆地区,利用自己叔父与唐昆土官扎西洽洼的朋友关系,住进扎西洽洼家中。扎西洽洼三兄弟在当地被称为“三只虎”,有很大势力。米玉丰依靠扎西洽洼提供的帮助,以做生意为名,往返于索格藏寺、下曼寺和乔柯部落,侦察匪特动向及兵力部署。通过深入观察和与匪补给处长洽宗仁的接触,侦悉到马良匪部盘踞在郎木寺山后“木”部落冬房山内,刘华初匪部则控制了唐昆部落冬房山后。为进一步了解匪特人数、装备等情况,米玉丰深入匪特腹地,实地进行观察,终于获得了比较准确的情报,并以回阿坝购买商品为名,及时返回站部报告情况。

1953年1月,米玉丰与另一侦察员再度深入马良匪特盘踞地区,以贩卖鸦片为掩护,同时请扎西洽洼派人随行。其间,匪特数次引诱米玉丰等人入伙并强行扣押,处境艰难,幸而得到扎西洽洼的帮助,每每

脱险。他们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中,顶风冒雪,风餐露宿,横跨马良匪巢“木”部落,一路观察草地上的流窜匪特,摸清了敌兵力虚实,为我军提供了避实就虚的进攻方案。

情报员索郎,原是藏族乞丐,在李守福同志的关怀和教育下,参加了革命工作。1952年10月,“二〇八”站派索郎以行乞为掩护,前往马良总部若尔盖墨溪地区。他白天穿梭于匪巢驻地,靠乞讨为生,仔细留心匪特人员、武器装备;晚上则住在匪特的屋檐下,暗地侦察敌人的部署及防御工事,并牢牢默记于心。索郎就这样不知疲倦地在匪特驻地侦察了近两个月,安全返回阿坝,向上级汇报了自己掌握的情况,并自告奋勇愿为我剿匪部队当向导。

1951年1月,索郎不避危险,毅然领命重返草地,执行刺杀匪首马良的任务。临行前,索郎说:“不完成任务,就不回来见李先生。”由于匪特防范严密,索郎在行动时不慎被捕。经敌人数次严刑拷问,他坚贞不屈,始终没有吐露自己的真实身份。气极败坏的匪特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于1953年2月的一个夜晚,将英雄的索郎活埋了。据后来我军抓获的匪特讲,当时索郎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奋然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索郎虽然没有实现当军前向导的心愿,然而他与“二〇八”站的同伴们所提供的重要情报,为我剿匪部队指出了一条最佳进军路线。“草地战役”中,我军出其不意地攻陷了匪特总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全歼敌人,一举解放了草地地区共40多个部落。

土司官寨:

“二〇八”巧安“钉子”

为了解匪特与当地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关系,并进而通过上层人

士了解匪特动向,“二〇八”情报站经过对川西北地区几个知名土司头人的考察分析,决定选择索观瀛为争取对象。

索观瀛是卓克基、党坝的土司。曾被国民党委为“保安司令”、“游击指挥”、“少将参军”、“中将守备司令”等职,1948年被“圈定”为“国大代表”。他在川西北地区名声大噪,是一个较为开明的土司头人。

1949年底,我人民解放军解放西南后,索观瀛派代表到兰州晋见我“一野”首长,接着又派人到川西行署和茂县专署联系,表示支持人民政府。然而,考虑到川西地区匪特的威胁,他不得不两头讨好,以保全自己的势力。

“二〇八”站根据情报发现,索观瀛一方面多次拒绝与匪特见面,另一方面却又暗中派管家给周迅予、何本初送去粮食、银元。由此可见,索观瀛对周迅予、何本初的动向是了解的;同时,索观瀛的儿子索国坤是黑水头人苏永和的女婿,当时,傅秉勋正在黑水地区勾结苏永和暴乱,作为儿女亲家,索观瀛通过苏永和也有可能了解傅秉勋的情况。

为此,必须在索观瀛身边安插一个可靠的“钉子”。这是一项异常困难的工作,谁是最佳人选呢?通过对索观瀛周围关系的详细分析和研究,“二〇八”站选择了具有各种有利条件的索国蓉。

索国蓉是索观瀛的侄女,曾到灌县(今都江堰市)读书,接受过进步思想,老家汶川解放后的大好形势对她也有一定影响,加之索观瀛没有女儿,对索国蓉颇有骨肉之情。当“二〇八”站站长李守福和川西公安厅政保处刘传弗找到她,并说明来意时,她欣然允诺,表示愿意接受这一光荣任务。

索国蓉的到来,令索观瀛高兴而又诧异。但很快,侄女一派天真烂漫的神情使他打消了顾虑。

经过几天观察,索国蓉决定从

伯娘珂宝身上作文章。便投其所好，一面向她介绍外界的新鲜事物，一面鼓动她向索观瀛吹“枕边风”。索国蓉渐渐地赢得了珂宝的信任，掌握了索观瀛的一举一动，并时常以看她父亲为名，走出官寨向李守福汇报情况，为后来争取索观瀛，孤立匪特打下了基础。

1952年初，川西行政公署组织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到北京等地参观。索观瀛起初不愿参加，索国蓉便向珂宝讲述内地的新鲜事物和大好河山，鼓励珂宝到内地去看看。于是，珂宝向索观瀛提出一起去内地参观，并说：“你不去我去！”索观瀛无奈，只得听从。索观瀛到内地参观后，大开眼界，对党和人民政府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思想有了明显转变，他曾对珂宝深有感慨地说：“得人心者得天下，共产党肯定能让我们过上太平日子。”

回到川西地区后，索观瀛逐渐靠拢人民政府，多次拒绝参加苏永和的暴乱活动，协助剿匪部队在川西北地区清剿匪特。1952年6月，索观瀛前往黑水参加平叛，次年随剿匪部队入草地争取土司、头人，为川西北地区的解放起到了作用。

1954年以后，索观瀛先后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省政协副主席。他后来回忆起那段往事时说：“我要感谢党对我的教育和帮助，使我迷途知返，当然也要感谢我的侄女国蓉。”

阿坝合围：

“最后的晚餐”

川西剿匪战斗已进尾声，而周迅予、何本初等匪首总是在其死党掩护下屡次逃脱。“二〇八”站站长李守福始终没有忘记上级交付的这一重要任务：“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

“草地战役”结束后，“二〇八”

站便集中力量搜捕周迅予、何本初等匪特。根据已掌握的情报，周迅予、何本初和毛兆兴（毛人凤侄儿，负责与毛人凤直接联络）等潜伏在阿坝。为证实此消息，并寻找匪首准确的潜伏地，“二〇八”站向墨洼、查理寺、子尔卡、上阿坝等地派出武装侦察小组；为防止周迅予、何本初潜逃外地，又于1953年2月中旬，派人前往青海、甘肃侦察。

1953年3月下旬，各路武装侦察小组陆续返回“二〇八”站部，情报综合表明：周迅予、毛兆兴与何本初在阿坝康申山林会合后，一直为藏族头人华尔功成烈所庇护，隐藏在格底寺、曲该寺、康申山和自己的官寨。周迅予则多次利用电台与台湾联系，向蒋介石为华尔功成烈请功。而台湾方面显然是已对川西局面失去信心，非但无任何实际支援，连几句勉励之类的套话都显得毫无生气。

4月初，“二〇八”站在李守福亲自指挥下，一面迅速将各路侦察人员调往华尔功成烈官寨周围，形成秘密合围态势，防止周、何等匪特脱逃；一面派人向公安厅和解放军剿匪部队报告。

公安厅获悉此情，即指示“二〇八”站“严密封锁，防止潜逃”，同时与有关单位联系，着手做争取华尔功成烈的工作，促使他交出周、何等匪特。

1953年4月上旬，转战川西的人民解放军浩浩荡荡进驻阿坝，逼近华尔功成烈官寨。受公安厅委托，原藏族自治区主席天宝秘密会见华尔功成烈，陈述利害关系，规劝其认清形势，悬崖勒马。面对此情此景，华尔功成烈深知大势已去，当即表示弃暗投明。

1953年4月20日夜，华尔功成烈宴请周迅予、何本初、王旭夫（原国民党中央军校少将教育长、“游击干部培训班”主任）等匪首，以转移为名给他们饯行。几人推杯换

盏，酒过三巡，周迅予等人已微带醉意，口称他日渡过难关，东山再起，定拥戴华公为游击司令。华尔功成烈只是微笑不语，此时他已令手下将周迅予的亲信毛兆兴、陈一鼎、刘维俭等三名特务秘密处死，以断其左右臂膀。

饭后，华尔功成烈将周、何、王三人送出官寨，没走多远，四面便响起了“交枪不杀”的呐喊声，三名匪首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被早已埋伏在此的“二〇八”站侦察员和剿匪部队捕获。

至些，川西剿匪战斗胜利结束，宣告了蒋介石“大陆台湾”美梦的彻底破灭！

在川西剿匪战斗中，“二〇八”情报站有七名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历史将永远记住他们！“二〇八”站作为一个战斗集体，为配合我剿匪部队的军事行动，为川西北地区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责任编辑 丁 末）

作者更正

贵刊今年第7期刊登的拙作《碧血丹心的郭化若将军》一文中误将化若同志老伴史翔云写作“夏宁欣”，特请更正，并向化若同志家人及广大读者致歉。

周而复

贵刊第7期我写的《说真话，办实事：陆定一立德立身立言》一文，第5页末尾把包之静错写成了“包静之”，请予更正。

徐庆全

毛泽东和

开明士绅李鼎铭

● 李葆定 冯彩章

52年前，毛泽东在著名的短文《为人民服务》中，提到三个人的名字：张思德、司马迁、李鼎铭。李鼎铭是陕北的开明士绅，曾被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副主席。毛泽东与他有些什么交往呢？

—

1941年初冬的一个夜晚。

寒风在陕北高原肆虐横行，窑洞里酣睡的人们似乎对此并不加以理会。尽管土窑洞设施简陋，人们衣衫不整，营养不良。但是，自从他们的祖先发明这种因地制宜的穴居方式以来，即便是灾荒年，这种冬暖夏凉的窑洞年复一年地给人们带来慰藉。

延安城外杨家岭毛泽东的窑洞里的灯光一直亮着，夜间工作是他多年来的习惯。

桌上摊放着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的提案，其中李鼎铭等11人关于“政府应贯彻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现象”案，引起毛泽东的极大兴趣。他摸出一支香烟点上，用力地吮吸着，发出“滋滋”的响声，然后拿起一支红铅笔，将这份提案又从头读下去：

“理由：军事政治之建立，必须

以经济力量为基础。在今日人民困苦，资源薄弱之状况下，欲求不因经济枯竭而限制军政发展，亦不因军政发展而伤害经济命脉，惟有政府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量入为出，制定预算，以求得相依相助，平衡发展之效果。”

“办法：一、政府应根据客观物质条件及主观经济需要而提出计划经济，以求全面提高生产力，改善经济条件，加强经济基础。

二、在现有经济基础上，政府应有量入为出的统一经济计划。

三、在财政经济力量范围内和不妨碍抗战力量条件下，对于军事应实行精兵主义，加强战斗力，以兵皆能战，战必能胜为原则，避免老弱残废等现象。对于政府应实行简政主义，充实政府机构，以人少事精，胜任职责为原则，避免机关庞大，冗员充塞，浪费人力、财力等现象。

四、规定供给条例，避免不必要的供给与消耗。

五、提倡节约、廉洁作风，避免不应有的浪费现象。”

毛泽东一字一句地默诵着，一边把重要的段落用红笔圈起来，并且摘录在自己的本子上。随即，他又在提案的旁边加上一段批语：

“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进我们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

对症药。”

毛泽东站起身，伸伸腰臂，在窑洞内踱着步，陷入沉思……

李鼎铭的提案为什么会引起毛泽东如此深切的重视和沉思？这话说来就长啦。

1939年12月和1940年10月，国民党顽固派先后发动两次反共高潮，并且从1940年10月起，停止了向八路军、新四军的拨款。与此同时，日本侵略者加紧推行包括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所谓“总力战”，对我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更加频繁、更加残酷的“蚕食”、“扫荡”。长期战争的消耗，外援的断绝，根据地被封锁并一天天在缩小，自然灾害，各种困难纷至沓来，犹如雪上加霜，把本来就很薄弱的根据地经济逼上了绝境。

经济困难一个突出表现是根据地人民群众负担的急剧增加。当时，人民群众的负担主要是公粮，以陕甘宁边区为例，1940年人均负担是1937年的7倍，而1941年比1940年则又翻了一番还多。在大幅度增加人民负担的同时，边区财政仍感入不敷出。1940年边区财政出现358.7万余元（边币）的赤字，1941年财政赤字数目比上年又增加了将近60%。造成边区财政困难、人民负担加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脱离生

产的党政军工作人员增加过猛。1937年的“公家人”仅14000余人，1939年猛增至49686人，1940年突破了6万人，1941年则高达73117人。仅7万多人和8千多匹马的供给，就使边区的财政不堪重负。为了保障供给，同时减轻人民的负担，中共中央曾规定每个根据地的党政军脱产人员不得超过人口总数的3%，而边区的这个比重已达5.37%，大大超过了中共中央的规定。

就在这一年的6月，边区曾发生这样一件事情：6月3日下午，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边区政府小礼堂主持召开县长联席会议。突然间电闪雷鸣，小礼堂的一根柱子被雷电击断，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触电殒命。此时，一位来延安赶集的农民借故发泄对负担过重的不满，逢人便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事情发生后，公安机关要抓捕这位农民。当毛泽东得知那农民讲此话时周围群众的情绪后，反对抓捕，而主张接近群众，了解原因。于是，指示中央机关干部组成一支秧歌队下乡，由赵毅敏任队长，胡乔木任指导员。他们初到安塞时，基层干部不但不接待组织演出，反而躲避。秧歌队只好不管来几个人都给演，并积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主张。消息传开后，许多老乡都来看秧歌，这样便同群众有了广泛的接触，演出后又同群众座谈，征求群众对政府工作的意见。群众不满地说：“救国公粮任务太重，群众要饿肚子。”“共产党的经是好经，让歪嘴和尚给念歪了。”这才弄清那位农民说怪话的原因。毛泽东得知真情后，很风趣地笑着说：“这是赵匡胤下乡，同农民扭秧歌，从‘雷公打死毛泽东’，到天下太平。”

问题更为严重的是，党内不少同志对当时已经十分严峻的经济形势认识不足。还在李鼎铭就此提案征集签名时，有人就奉劝李先生不

要提这样的提案。认为参议会不一定能通过，即使参议会通过了共产党也不一定接受。但李鼎铭目睹边区当前的严重困难，想到毛泽东在参议会开幕式的演说，要求参议员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提出意见，从而增强了勇气和信心，毅然同姬伯雄等11位参议员提出了提案。

提案提出后，果然引起强烈反应。有些议员认为，正值抗战救国紧急关头，敌人以大量兵力向我们进攻，我们实行精兵简政，不就等于束手被擒吗？许多人觉得不可理解。更有个别人从这个提案联想到国民党的“限共”方针，进而怀疑提出这个提案的人动机不良。

二

这一天，参议会正在召开讨论各位议员提案的大会。毛泽东默默来到会上，倾听各位议员的意见。

只见一位中等身材，面容清瘦的老人走上讲台，扶了扶玳瑁框老

花镜，就精兵简政提案之要义，侃侃而谈。李鼎铭说：我来自民间，以无党无派的立场，将在民间所见所闻略为陈述。他认为边区民众负担过重，水小鱼大，有害边区政权之巩固；头大脚小的行政机构，应迅速调整，否则不能建立亲民政治。他指出：“一切工作要深入民间，不然一切都是空的。”关于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的原则，他认为一为“开源”，二为“节流”，而“精兵简政”尤为实行“节流”的有力办法。但“精兵简政”要在不妨害抗战建国的原则下求得实行，并非消极的减兵减政，而是要求在纷繁的政治机构上，质量胜过数量，积极提高工作效率。

话音刚落，毛泽东立即站起来，带头鼓掌，并边鼓掌边到台前，接着李鼎铭发言，谈了自己对“精兵简政”的看法。他指出：在抗战初期，采取精兵主义自然是不对的，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全面抗战已经四五年了，人民经济有很大困难，而我们的大机关和不精干的部队，又不适合今天的战争环境。教条主义就是



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和副主席李鼎铭

不管环境变了,总是死啃不合时宜的条文。接着,毛泽东高度肯定了“精兵简政”意见的正确性,对李鼎铭先生爱国爱民的热诚和远见卓识表示赞扬。同时,对一些同志对李先生提案的责难提出批评。毛泽东最后严肃提出:我们的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论谁提出的意见,只要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办。怀疑李先生提案动机的同志,是一种宗派主义情绪在作怪。

经毛泽东提议,在11月15日参议会选举会议上,李鼎铭被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由于在此之前,他已当选为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的副议长,由他提出“依法不克兼任”,大会决定又补选了副议长。

由于毛泽东的推动,李鼎铭关于精兵简政的提案不仅获得通过,而且作为第二届参议会最重要的决议,交政府速办。

之后,毛泽东还亲自访问了李鼎铭,进一步征求他的意见,并告诉他,中共中央对“精兵简政”要进行研究,作为共产党的一项政策,在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随后,中共中央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并在1941年12月17日发出的《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中,明确指出:“为进行长期的斗争,准备将来反攻,必须普遍地实行‘精兵简政’。”“‘精兵简政’,节省民力,是目前迫切的重要任务。”此后,精兵简政作为共产党的一项重要政策,不仅在边区实行,而且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普遍实行,为渡过抗日战争中最艰苦的岁月,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

1942年1月12日,李鼎铭随边区政府考察团赴绥德、米脂考察,随后回家携眷返任。在考察和回乡搬家期间,李鼎铭满面春风,不仅出席了各种形式的欢迎会,而且广泛接触社会各阶层人士,热情宣传边区政府的施政纲领和党的各项政

策。谈话中,他多次引用毛泽东在参议会上的讲话和他在延安的眼见耳闻,亲身感受。他现身说法,谆谆善诱:“我在政府里几个月来,没有看到党员和非党员的差别,相反,他们非常尊敬无党无派的人士,因此我也不再以‘外人’自居,而是站在‘主人’地位了。”

2月下旬,李鼎铭携眷返回延安后不久,毛泽东就派汽车把他接到杨家岭,亲热地把他迎进自己的窑洞里。毛泽东详细询问了他搬家的情况。李鼎铭告诉毛泽东,家产全部献给了国家。毛泽东说,留一点吧。李鼎铭说:一点也不留。毛泽东哈哈大笑说:“你真是个开明人士。”

从此以后,毛泽东和李鼎铭之间经常来往。李鼎铭每次来杨家岭,毛泽东工作再忙也要接见。毛泽东也经常到边区政府去看望李鼎铭,恭敬地称他为“李老先生”。

应该说,李鼎铭先生所以能够向中国共产党提出精兵简政这一有重大意义的意见,反映了他政治思想上的重要转变。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本倾右,觉得共产党的社会主义不对。转会又想我们常常笑人盲从,我说社会主义不对,究竟从何说起?于是找到几种社会主义的书,加以研究,才知道社会主义是天公地道的主义,在现在的世界,无论何国,非实行社会主义不可。”

李鼎铭先生思想的重要转变发生于1939年。在这以前,由于耳闻目睹的事实,他对我党已经产生一定好感。他敬佩八路军是天下少有的军队,是抗日最坚决的军队,认为共产党做事得人心,称赞我党的领导人是“有治国本领的人”,国民党比之差得很远。1939年,他的次子李力果(时任山西新军四纵队副司令员)返延安途中回家探亲。父子二人先后谈了七天,对李先生的思想转变起了促进作用。在次子的启发下,李先生开始阅读马列和毛泽东的著作。他读过《资本论》、《列宁选集》以

及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和《新民主主义论》,到延安任职后,研究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的兴趣更为浓厚。尤其难能可贵的是,1943年,他利用在南泥湾疗养的机会,把自己几年来思考的问题整理成《中国哲学思想体系与民族传统概论》一文。该文用唯物、辩证、群众的观点,发掘了我国古代的优秀文化传统,表达了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热爱和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文章引经据典,分析了中国古代优秀的文化传统即从物质出发的自由平等的和群众观点的体系,坚定地认为“中国古代的这种唯物哲学体系与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是一脉相通和血肉相关的”。“掘发整理并发扬中国古代真正哲学与民族传统的责任,应当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唯物论家和社会主义者的责任,即中国共产党的责任。”他进一步指出:“我以为首先使马列主义中国化。”主张“使马列主义通过中国民族形式而得到真正实现”。文章预言:“中国能接受这种主义(指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者注),并且能使这种主义与中国真正的历史传统结合起来,自然会经济发展,民族繁荣,这不仅是民族存亡的一个关键问题,而且将使我们的民族成为全世界全人类中数一数二的新型强大国家。”李鼎铭先生还在文章中大声疾呼:“中国之所以腐败,都同科学不发达有关。所以今天我们要接受外国的东西,必须把外国数百年来科学的结晶接受过来,中国才有前途。”上述言论,虽已过去了半个世纪,今天读来仍感其熠熠生辉。

三

李鼎铭先生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民国以后,他当过两次区长,还任过榆林道尹公署顾问、民政科长等职,时间都不太长。他有自己坚定

的操守,即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他不贪求官位给自己带来的好处,他做官是为了做事,做自己认为应做的事。当自己的主张得不到实现,他宁可辞职回乡。

他到延安任边区政府副主席以后,有一段时间,由于党内一些同志还不习惯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往往把李先生当客人待,形式上客客气气,事实上对他的职权并不尊重。对此,李鼎铭先生明白地披露了自己的不满态度:在政务会议上,不再像从前那样积极发表意见,林伯渠主席问他有什么意见,他则回答:“俺没有意见。”有时政府行文,他不划行。平时接触中,他与共产党负责人和与党外人士之间,也表现出亲疏不同。

这种情况引起林伯渠和当时任秘书长的李维汉的注意,于是决定好好同李先生谈谈心。一天晚上,李维汉专门会见了李鼎铭,开诚布公地说:“鼎老,我这个秘书长不能当了,我要辞职了。”李先生问:“为什么?”李维汉说:“好多事情,副主席不吭气,我这个秘书长怎么当!”李鼎铭见李维汉如此诚恳,便把积蓄心里的话一齐抖了出来。李鼎铭率直地说:“我原本不愿出来做事的,是受到毛主席在参议会上的演说和感动才出来的,在党外人士有职有权的鼓励下出来的。任职后,政府开会要我主持时,只临时给我一个条子,什么都不给我谈,我怎么办?政府下达命令、指示,要我划行,有的内容事先我一点也不知道,怎么办?现在同级把我当客人,下级把我当傀儡。党上有包办,政府不能决定政策。我这个副主席也不想干了。”

边区政府党组织听了李鼎铭的意见,认为李先生讲了心里话,党组织应该充分尊重党外人士的职权。于是商定了四条改进措施,以确实保证党内外人士民主相处,确实保证党外人士有职有权。这样做,李先生很高兴,态度重新积极起来,不讲

“你们党上”,而讲“我们团体”了。

毛泽东听了这一情况汇报后,对边区政府党组织主动作好党内外团结共事的做法极表赞成。他说:“议论和批评对我们总是有帮助的。说党包办,总是有原因的,我们要研究解决。凡是对的意見,我们都要研究解决。”

1944年6月,中外记者参观团访问延安。英国记者斯坦因要求同李鼎铭谈话。政府只派了一个翻译在场。谈话中,李鼎铭在回答斯坦因“你是不是有职有权”的问话时爽朗地说:“我有职有权。”李先生进一步谈到:“我对于新民主主义的信仰,在我服务政府的四年中,证明是正确的了。我以为毛泽东是天才。他对于每一个问题都看得非常具体,毫无成见。毛泽东的思想不只是他个人的意见,正是群众的意见。他做的事情正是老百姓想做能做的事情。现在想起来,国民党的造谣,说毛泽东和朱德是土匪,真是荒谬极了。”“我将继续在政府尽力工作,一生中我从来没有这样快乐过。因为自从辛亥革命以前我对社会改革发生兴趣以来,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真实的进步。”

对于李鼎铭先生这一鲜明的“边区立场”,毛泽东十分高兴,称赞延安的“三三制”搞得很好。这年9月28日,是李鼎铭先生的63岁诞辰,毛泽东专门到李鼎铭家来拜访。李先生特意做了饭菜招待。他们一边吃饭,一边谈笑风生,历时两个多小时。临走时,毛泽东同李先生一家以及身边工作人员一一握手告别。

在同中国共产党真诚共事、长期合作中,李鼎铭进一步认识了共产党。他把为人民着想,为政府着想,为共产党着想完全统一起来了。例如谈到边区负担问题,李鼎铭有一句很深刻的话:“负担问题,不能说不重,但在抗战时期,也不能算重,看到边区干部粗食褴衣,更不忍说重。”

中国共产党为加强解放区的政权建设,原计划在1945年内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根据毛泽东主席在中共七大时的建议,由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及边区政府委员会发起组织筹备,得到华北、华中及华南各解放区的响应。1945年7月13日,在延安召开了筹备委员会,选举了周恩来、林伯渠、续范亭、李鼎铭、谢觉哉、刘少白、杨秀峰等25人为常务委员,并选举李鼎铭任副主任。后来由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没有举行。尽管如此,李鼎铭作为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声望,已经超出了陕甘宁边区的范围,在全国各解放区也产生了影响。

1946年4月,在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上,李鼎铭先生被连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这次会议,还选他出席国民大会正式代表。后来由于国民党挑起的全面内战爆发,我方代表拒绝出席片面召开的国民大会。李鼎铭在参议会闭幕式上讲话表示:陕甘宁边区由于获得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直接领导,才得以成为首席解放区,边区人民能够安居乐业,还是依靠各解放区作为长城,因此边区人民向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及其他解放区致谢。

1947年初,在国民党发动重点进攻陕甘宁解放区的情况下,李鼎铭随部分机关疏散转移到离延安90里的真武洞。3月,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主动撤出延安,开始转战陕北。李鼎铭虽年迈体弱,仍与群众同甘共苦,随边区政府跋山涉水,辗转迁移。10月10日,中共中央批准公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标志着我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入彻底完成土地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的阶段。李鼎铭先生对此极表赞同,他说:“共产党发动群众彻底平分土地,审查干部和党员,这两项政策伟大极了,有了这两项政策,将保证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必然胜利成功。”

不久,李鼎铭先生突发脑溢血症,于12月11日上午6时,不幸与世长辞。李老先生的这番话,成为他在生命垂危之际留下的最后遗言。毛泽东在戎马倥偬,转战陕北中写了长长的挽词,赞扬李鼎铭“为人民民主事业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四

“乐山乐水清如此,名相名医道自尊。”

这是谢觉哉在1945年11月写的《赴李鼎铭生日宴》一诗中的两句。这两句诗集中道出了李鼎铭仁者、智者的崇高风貌和从政从医、造福人民的杰出贡献。

李鼎铭是位名医。早年从政任区长时,政绩斐然,1926年民众送给他一块“造福桑梓”的金字匾;后来辞官行医,在米脂城开“常春医馆”,坐堂行医,又有人送他“济世神医”的匾额。1945年,八路军留守兵团直属政治部送给李鼎铭先生“民主典范”光荣匾。

在延安时期,李鼎铭在忙碌操劳边区政府各项公务之余,从未放弃他早年擅长的本草方剂之术。他经常给中央和边区的一些领导同志及其他群众看病,被人称为医药巨擘。

毛泽东在长征途中患过关节疼痛之症。有一段时间,他的这种病复发,胳膊抬不起来,吃了不少西药仍未见效。李鼎铭得知后,来到杨家岭给毛泽东看病诊脉,当即开了四服中药。他很有把握地对毛泽东说:“吃了第一服药,叫你胳膊抬得起来,第二服药叫你胳膊能转动,第三服药胳膊就自由了,第四服药就能让你爬单杠了。”当时卫生处有的同志不大相信中医,不同意给毛泽东用中药。毛泽东说:“还是试试看吧!”

服完四服中药,毛泽东的胳膊果然疼痛消失,活动自如了。自此以

后,毛泽东有病就请李鼎铭给他开中药方。李鼎铭还用按摩的方法,结合药物治疗毛泽东的关节疼痛和胃病。李鼎铭说:“在阳光下按摩效果最好。”毛泽东欣然同意在他的院落阳光下按摩。

在给毛泽东看病过程中,李鼎铭同毛泽东谈论了中国医学的发展道路问题。当时,延安的几个医院都是西医为主,形成一种鄙弃中医的风气;有人让中医看过病,西医就不再给看病开处方,中医看病用药,不给报销药费。人们对中西医孰是孰非,很有争议。一种意见认为中医不科学,落后保守,主张废中医,立西医;另一种则认为西医止于皮毛,只有中医才是世代相传的治本之术。因而鄙视西医,独尊中医。毛泽东就把这个问题给李鼎铭提出来征求意见:李先生从容说道:“中西医各有长处,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求得进步。”毛泽东对李先生的回答很满意。他说:“你这个想法好,以后中西医一定要结合起来。”

毛泽东不仅自己十分相信中医,还把李鼎铭介绍给周恩来、朱德、林伯渠以及谢觉哉、王稼祥等中央领导同志看病。在一些会议上,毛泽东常常谈到中医中药的好处,称赞李鼎铭医术高明,要求人们尊重中医,支持中医,号召西医向中医学习,实行中西医结合。有一次,毛泽东还特意将别人送给他的人参,派人送到李鼎铭处,并附有一封信,说明这服人参供他配药使用,表达了他对李鼎铭从事的中医事业的极大关怀和支持。李鼎铭不负毛泽东的重望,先后给不少人治好了病,前方送来的一些痼疾病人,经李先生用中药治疗痊愈的也有不少。

在毛泽东的支持和号召下,陕甘宁边区成立了中医研究会、中西医协会、中医保健社等中医群众组织,并且提出“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的口号。李鼎铭担心自己的中医技术后继无人,左思右想,希望能



毛泽东1948年2月1日

为李鼎铭写的挽词

把自己的长子接到身边,培养成为一个中医工作者。他的长子李振三早年随他学过中医,后离家十多年,改行在国民党统治区铜川做机械技术工作。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表示同意,并指示边区政府派人带着李鼎铭的亲笔信到铜川。经过一番周折,终于把他的长子及其家属接到了延安。

针对中医保守的一面,李鼎铭在边区文教大会上号召中医公开秘方,由政府汇集付印,分发各地使用,使祖传秘方为广大群众服务。李鼎铭关于中西医团结起来共同发展的主张,经过毛泽东的支持和推动,促进了边区中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也为新中国卫生工作中中西医结合方针的确立,做出了可贵的探索。

在李鼎铭与毛泽东的交往中,还有一件事需要提及,即由于《永昌

演义》引起的故事。

与李鼎铭同为米脂人的李健侯,由于对故乡人李自成的敬重,饱含激情,六易其稿,历十余年时间,写成历史章回小说《永昌演义》。这部书情节曲折,故事生动,虽是小说,却有史料价值。1944年前后,李鼎铭将《永昌演义》的修改稿推荐给毛泽东评阅。毛泽东阅读后,于1944年4月29日,给李鼎铭写了一封信:

鼎铭先生左右:

《永昌演义》前数年为多人所借阅;近日鄙人阅读一遍,获益良多。并已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作者李健侯先生经营此书,费了大力,请先生代我向作者致深切之敬意。此

书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但贬抑其整个运动。实则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二千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极著名的一次。这个运动起自陕北,实为陕人的光荣,尤为先生及作者李健侯先生的光荣。此书现在如按上述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未知能获作者同意否?又健侯先生近来健康如何,能来延安一游否?统祈转致健侯先生为禱!

敬颂

大安!

毛泽东

四月廿九日

李鼎铭收到毛泽东的信后,即转达给在米脂的李健侯。不久,李健侯十分兴奋地应邀来到延安。毛泽东热情地接待了他,奖励他200元边币。全国解放后,由毛泽东建议,安排李健侯任陕西省文史馆研究员,同时修改《永昌演义》。可惜此书尚未修改完成,作者即于1950年不幸逝世。毛泽东致李鼎铭的这封信,也成为他们之间深厚友谊的历史见证。

(责任编辑 舒元璋)

○ 广 告 ○

钢笔书法高效速成法 面向全国招生

钢笔书法高效速成法是本校最新研究成果。您想拥有一手潇洒的书法吗?不管年龄大小,或经过多次练字失败,本校保证您很短时间练好四种实用书体。庞中华、路放等硬笔书法家执教,每天练一小时,每月批改作业,全国近100万学员已成功。

长期函授招生。速成类教材,楷书学50天,行书30天,仿宋、隶书各15天,学杂费共50元;系统类学6个月,68元,学各种书体。可任选一类学习即可。收款后寄发全套教材和校徽等,学完发钢印证书。早一天学习,早一天成功!
邮编:610072

电话:(028)7745535

联系老师:罗兰 张平

汇款请寄:成都市一环路西三段7号 西南硬笔书法学校发行处

本刊邮购启事

敬告各地读者,如当地邮局不能订阅《炎黄春秋》,可直接向本刊发行部函购。每月一期,单价4.00元,补购任何一期或补订一个季度、半年、全年均可,免收邮费。

本刊1995年合订本(总34—45期)已装订完毕。全部精装,每部47.00元,一律免费挂号邮寄。

请您汇款时务必将姓名、地址、邮编,书写清楚,以免误递。

本社地址:北京西城区文津街7号

邮政编码:100802

电 话:66170955

联系人:杜 习

宋庆龄与鲁迅的友谊

● 陈廷一



宋庆龄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委员胡愈之(右三)、鲁迅(右
四)及黎沛华(右二)合影

鲁迅一贯“横眉冷对千夫指”，因而获得毛泽东“硬骨头”的赞誉。他对凶狠残暴的当权者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不怕死亡的威胁，在斗争的关键时刻决不后退一步。在特务暗杀杨杏佛以后，有的同事害怕了，不敢出席杨杏佛的葬礼，鲁迅不但去了，而且出门时连钥匙都没带，以示不准活着回家的决心。他以他的笔作武器，写了很多文章，痛斥日本侵略者和德意法西斯；抨击蒋介石政府对内镇压人民、对外卖国求荣；揭露某些无行文人官僚政客们的丑恶嘴脸，显露了他作为伟大思想家的精神锋芒。他同情民众，关心青年，与中国共产党心心相印。他积极营救革命者，帮助党做了大量工作。在红军以武力打破蒋介石的军事“围剿”时，他则在文化战线上担当着反对国民党文化“围剿”的主将。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他激动不已，当即给党中央拍去了“你们的事业是伟大的事业。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中国与人类的希望”的贺电。

对鲁迅的这些优秀品质，宋庆龄是十分清楚的。多年来，他们并肩战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鲁迅一直十分敬重宋庆龄，宋庆龄也非常关心鲁迅。

长期的拼命工作和并不优越的生活条件，鲁迅的健康很不好。他的面容衰老得很厉害，每当有人问起他的年龄时，他总是多说一二十岁，因为这样看上去才相称，以免人家疑心他少报，假装年轻。实际上，他的身体内部情况也不好，1935年就查出他患有较重重病。在一次有

何香凝、茅盾、史沫特莱等共同出席的酒会上，宋庆龄就劝他赶快出国治疗，鲁迅却说：“局势瞬息万变，我怎能独自远行？”

1936年5月，宋庆龄因阑尾炎住院了。在医院里，宋庆龄听说鲁迅的肺结核很厉害了，非常着急。因为不能亲自去看望并当面劝说，她抱病给鲁迅写了一封态度极为诚恳的信。她在信中称鲁迅“周同志”，这是宋庆龄很少用、很亲切的称呼。信中说：

“方才得到你病得很厉害的消息，十二分地担心你的病状！我恨不能立刻来看看你，但我割治盲肠的伤口，至今尚未复原，仍不能够起床行走，迫得写这封信给你！”

宋庆龄恳求鲁迅立即住院治疗。她说：“你的生命并不是你个人的，而是属于中国和中国革命的!!! 为着中国和革命的前途，你有保存、珍重你身体的必要，因为中国需要你，革命需要你!!!”

宋庆龄在末尾特别强调：“我希望你不要漠视爱你的朋友们的忧虑而拒绝我们的恳求!!!”

宋庆龄在信中多处一连用三个感叹号，足见她对鲁迅的关心之至、友情之深。接着，宋庆龄安排苏联大使馆出面邀请鲁迅出国治疗，但鲁迅惦记着国内的斗争，仍不肯前往。宋庆龄又请美国大夫马海德为鲁迅寻找新的特效药，制定治疗方案。后来宋庆龄又安排鲁迅到江湾的叶家花园去休养。鲁迅因为不愿意离开自己的战斗岗

位,仍然没有去。

10月19日,为中国的民主富强英勇战斗了一生的伟大鲁迅溘然长逝。文坛巨星陨落,日月无光,天地悲泣!宋庆龄听到消息,更是哀痛不已。她立即赶到鲁迅家里,面对先生的遗体,沉痛致哀。

宋庆龄同鲁迅的夫人许广平、胞弟周建人,上海地下党代表冯雪峰,以及文坛宿将巴金、曹禹等,一起商量如何办好鲁迅的葬礼。鉴于宋庆龄的崇高威望和同鲁迅的深厚情谊,大家公推以宋庆龄为首,组成鲁迅治丧委员会。

大家简要回顾了鲁迅奋斗的一生:始而学医,后以为治疗国民精神上的痼疾比单纯医治肉体上的疾病更紧迫,转而从事文学事业;他的作品特别是杂文笔锋犀利,在中国思想界起到了激浊扬清、除旧布新的作用;他欢迎辛亥革命,也认真总结过这次革命的经验教训;他在同一切恶势力斗争中无私无畏,坚持原则,从不妥协;他病体虽弱,精神上却有最强大的力量;他无情撕去旧中国“吃人的社会”种种封建伪善的假面具,热情地欢呼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奋斗带来的黎明;他关心青年,最受青年的热爱和敬重——他已经成为生命不息、敢于斗争、挚爱和平、民主和进步的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因此,宋庆龄特别提议两点:第一,要做一面绣有“民族魂”的大旗覆盖在鲁迅的棺材上,作为对这位民族英雄一生伟大人格、伟大精神的总结和概括;第二,要把鲁迅的葬礼办成一个发动群众、救亡图存的群众运动。

在治丧委员会其他同志前后忙碌的时候,宋庆龄忍着悲痛,亲自和许广平一起到万国殡仪馆为鲁迅选购棺木。许广平考虑鲁迅一生俭朴的习惯,本来要选购一副一般的棺材。但宋庆龄考虑鲁迅已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心中的一面战斗旗帜,要让群众最后瞻仰好鲁迅的遗容,她自己出钱,花几千元选购了一副上面有玻璃罩的上等棺木。

接着,宋庆龄又到万国公墓,亲自为鲁迅选定墓地,并交付费用。

鲁迅的遗体安放在万国殡仪馆,宋庆龄亲自为鲁迅守灵。各界成千上万的群众天天来瞻仰遗容,祭奠鲁迅。当他们看到宋庆龄和许多名人都在为鲁迅守灵时,更加激起了对鲁迅伟大一生的敬仰。人们纷纷用文字、用语言表达对鲁迅的爱戴,对鲁迅战斗精神的敬佩,对鲁迅革命遗志继承的决心。各种各样的挽联、挽幛、花圈堆满了灵堂,上面写满了发自人民内心的哀婉凄绝、慷慨激昂的语句。

按照宋庆龄的提议,把鲁迅葬礼办成一个发动群众救亡图存、向各国反动派示威的群众运动,出殡之前,治丧委员会特地选择了一条经过公共租界和中国地界的路线。

出殡的时刻到了!只见在宋庆龄的精心安排下,各国友人和中国一些著名人士亲自为鲁迅扛抬棺木。鲁迅的棺材前,树起了那面巨大的白旗,上面是由沈钧儒亲笔书写、黑丝绒绣成的三个大字“民族魂”。大旗迎风招展,哗哗作响,象征着鲁迅不朽精神对民众的召唤。各界进步团体、名人巨子、人民群众送来的挽联挽幛,组成了浩大的仪仗队,长的短的、横的竖的,真是旗帜如林,绵延十里,遮天蔽日。宋庆龄素衣素袍,臂带黑纱,徒步跟在棺材后面。在她的身后,是浩浩荡荡十万人的送葬队伍。开路的鞭炮,哀婉的唢呐,更有齐声高唱的悼歌。悼歌用的是《打回老家去》的曲子,临时新填了悼念鲁迅的歌词。如此规模盛大的葬礼,在上海滩上还是第一次。这一方面可以看出鲁迅在群众中的威望,一方面也显出了宋庆龄卓越的组织才能。

很明显,这么声势浩大的送葬队伍,声震天地的讨伐日本侵略者曲子的悼歌,在为鲁迅送葬的同时,也是向中外反动派的大示威!既是向帝国主义的示威,也是向政府不抵抗主义的强烈抗议。

队伍走到一个大路口时,军警们在那里布下防线,他们以“防止扰乱社会秩序”为由,不许按治丧委员会事先选定的路线前进。宋庆龄什么也不说,她一直赶到最前面,直向军警们的防线走去。在她的身后左右,是黑压压的送葬人群,人们的悲痛和愤怒只用坚定的脚步和激昂的悼歌来表达。军警们不敢强行阻拦孙夫人,也不敢同潮水般的群众队伍发生对抗,只好悄悄后退、后退,最后眼睁睁看着队伍按原定路线前进了。

进入公共租界时,租界巡警头子出来说:“这儿是租界!租界的法律不准游行示威。如果不听劝阻,警察开枪造成流血责任不在我们!”走在前面的宋庆龄只回了他一句话:“没看见吗?今天这是送葬!”是啊,送葬不是游行,不是示威,葬礼在西方也被视为神圣的。警察头子无言可辩,不敢寻衅,只好为送葬的队伍行注目礼。

日本鬼子进犯上海,蒋介石政府随意抓人杀人,长期以来压抑在人们心中的愤懑,通过为鲁迅送葬、呼口号、唱挽歌,在人们心中来了一次大宣泄。沉闷的上海又显出了它勇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光荣传统。

到达墓地后,宋庆龄和蔡元培、沈钧儒、邹韬奋等先后发表演说。宋庆龄说:

“现在鲁迅先生死了,可是鲁迅先生之革命工作尚未完成,我们应当继续努力。追悼鲁迅先生,须效法先生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汉奸的精神,为民族求解放。”

鲁迅的棺木缓缓沉入基底,可是宋庆龄和鲁迅先生之间崇高伟大的友谊却感染激励了千千万万的后人。宋庆龄在鲁迅葬礼中的所作所为,映照出了她伟大的人格和关心同志、诚信待人的高尚情操。

(责任编辑 舒元璋)

陈毅登门向民主人士道歉

● 王 萌

1940年10月,“黄桥决战”胜利后,在刘少奇、陈毅同志的亲切关怀和直接领导下,为了团结各阶层人士共同对敌,扩大和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夺取抗日战争的更大胜利,于同年11月15日,在江苏海安县召开了为时一周的“苏北临时参政会”,出席会议的有江都、高邮、泰县、扬中、丹阳、泰兴、靖江、如皋、南通、海门、崇明、东台、盐城、兴化等14个县推荐的代表共380人,其中爱国党派民主人士占多数,中共党员仅72人。刘少奇、陈毅等领导同

志在会上作了重要演说。会议通过了《施政纲要》,成立了参议会和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

这次会议充分发扬民主,在讨论时畅所欲言,各抒意见,使会议达到预期的效果,代表们都很满意。

东台县代表施文舫先生,是东台施陈乡(今三仓乡)人,施在青年时代就读于南京师范附中,毕业后考入国立大学文史地系学习,后在上海商务印书馆担任过编辑。抗战爆发,日寇进攻上海,他便回乡生活。后曾出任东台县第三区(今富安

镇)区长,但因国民党政府贪污腐化成风,加之地方恶势力的排挤,他不愿苟同,因此只干了几个月便卸职回乡,过起了庄园生活。

新四军东进的胜利消息给施文舫先生很大鼓舞,他寄抗日救亡希望于中国共产党。在他的表兄黄逸峰的影响下,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新四军抗日救国的主张,成为东台地区有影响的爱国民主人士,因而被东台县委推荐为“苏北临时参政会”代表,还被聘为“参议员”。

会后,施文舫先生去司令部拜访陈毅将军,施在谈话中反映:东台一干部作风不好,有贪污腐化行为,还瞒上压下,在群众中造成很坏的影响。施为人真诚坦率,提意见时亦很激动,他对陈毅同志说:“你是新四军的将军,是苏北东进抗日的指挥官,是保护人民利益的,对这样的坏干部,怎么不管?”陈毅同志朝施望了一眼说:“怎么!你来责备我?”陈毅同志说话时本来声音洪亮,加之他当时说话的声音高,语气又硬,且带有反问的口气。施先生因接受不了而愣住了,心内想:原以为陈毅虚怀若谷,现时看来并非如此,于是不再多言,便掉转身子拂袖而去,闷闷不乐地回到代表住地。

当晚,陈毅同志记日记时,想起了施文舫先生和他的谈话,反躬自省,觉得自己当时说话的态度有问题。而施先生是位爱国民主人士,能



陈毅与抗日民主人士合影

不计个人得失,敢于批评和反映干部中的问题,这是对我党的信任与爱护。施先生是一位千金难买的诤友,我们的事业要兴旺发达,就需要这样的诤友,可我今天怎么鬼迷心窍?……陈毅同志想到这里,心中感到内疚,便放下手中钢笔,收起日记本,独自一人外出,准备去向施先生赔礼道歉。

陈毅同志摸到施文舫代表的住地,不见施先生,便问其他代表,方知施先生心中不快地当晚坐船回家去了。陈毅同志告别几位代表,随即来到大会秘书处,了解到施先生的家庭住址。

次日,天刚亮,陈毅同志早饭未吃,带了两名警卫员心急如火地跑了30多里路,来找施先生。

施文舫先生在家听管家告知说陈毅司令员同两名挂有盒子枪的新四军找上门来了,心中暗自吃惊,认为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他妻子陈玉麟责怪他去海安开会时,不该多管闲事,惹祸上门。施说:“我反映的问题是事实,又不是诬陷。陈毅来怕什么,看他对我奈何?”他说罢便硬着头皮到客厅去见陈毅了。

陈毅同志看到施先生从后厅来了,便主动上前抱拳打招呼说:“施先生,打扰了,昨天我陈毅对不起你噢,今天给你道歉来了。”接着,他两只有力的大手紧紧地握着施先生的双手。此时,施文舫又愣住了,顿时觉得一股暖流涌上他的心头,意想不到的陈毅将军会亲自找上门来道歉。他激动得只是说:“不敢当,不敢当。”他把陈毅同志请进客厅上座,献茶说:“陈将军,我昨天不告而别,乃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惭愧呀,惭愧呀。”

“不!你提的意见很好,这是对我党的爱护嘛。当时我讲话的态度不好,引起了你对我有意见。这对我来说,也是个教训呀。”

中午,施文舫先生设宴款待陈毅一行三人。他们边吃边谈,愈谈愈



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指挥陈毅和副指挥粟裕

感到亲切,陈毅同志再次阐明了我党的干部政策。表明对这个干部的问题一定查办,并希望人民群众对我党干部严加监督,因为共产党的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而不是做官当老爷,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陈毅同志的谈话,使施先生心花怒放。特别是陈毅同志在临走时,紧握着施先生的双手说:“今天我为交到你这位诤友而高兴。如果我们根据地的爱国民主人士都能像你这样,为了人民利益敢说真话,使我们的队伍更加纯洁,我们一定能够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我党和我们的国家一定会兴旺发达。”

嗣后,陈毅同志亲自交待东台县县委,对这个干部的问题须严加查处。不久,这个干部受到撤销区委委员的处分,降职到川岸乡当指导员。

后来,陈毅同志与施文舫先生常有书信往来。1941年冬,施文舫先生的父亲施作舟病故,陈毅同志知道后亲笔挥写“元良丧失,邦家之痛”的挽词,派专人送去,表示悼念。

1964年8月,陈毅同志63岁生日时,写下了《六十三岁生日述怀》一诗。诗中说:

六十三岁满,
六四即启程。
五次大革命,
一个跟队人。
一喜得锻炼,
一喜工作勤。
一喜有错误,
痛改便光明。
一喜得帮助,
周围是友情。
难得是诤友,
当面敢批评。
有时难忍耐,
猝然发雷霆。
继思不大妥,
道歉亲上门。
……

这里表现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胸怀。我每每默诵这些诗句,便想到了他与施文舫先生交往的故事。

(责任编辑 舒元璋)

美国著名建筑大师

贝聿铭的中国心

● 吴跃农

建筑,人类艺术的天堂。

1989年3月,法国卢浮宫扩建修整工程竣工。广场上,清波潋潋的水池,映衬着一座戛戛独创的玻璃金字塔,璀璨夺目,酣畅凌厉,宣告蒙尘已久的卢浮宫重现骄人的风采。此时,法国总统密特朗为自己的独具慧眼而庆幸,主持这项工程建筑设计的是贝聿铭,正是他从众多世界级名家中选中的。

贝聿铭,自小生活于苏州,1935年负笈美国波士顿,年仅19岁,先后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攻读建筑学,1954年入美国籍,1982年,因其卓越的建筑艺术设计,获美国普利茨克(Pritzker)大奖,奠定了他世界建筑界大师的确凿地位。1978年,他率美国建筑师代表团访问中国,这是他出国40多年后第一次回到母亲的怀抱。他站在景山之顶,凭栏远望,灿烂的阳光之下,故宫建筑群沿着主次轴线平面铺展,错落有致,金黄的屋顶,赭红的城墙,被湛蓝明澈的天际线勾勒得华美雄浑,显示出纵横一气,万物谐和的辉煌和安详。蓦然回首,贝聿铭微笑着对他的美国同行说:“我是中国人!”

1996年,78岁高龄的贝聿铭正式宣布退休。“由北京到波士顿:建造一个摩登的时代”,这是美国作家麦可·堪耐尔对他辉煌的建筑生涯的概括,也揭示了这位享誉世界的建筑大师无穷智慧的源泉:中国,长城和故宫的中国。

育,特别是他的导师格罗庇乌斯(Walter Gropius),是“国际风格”的积极实践者和倡导者。

但事实上,贝聿铭很快就对试图包罗万象于一体的“国际风格”提出了怀疑,并超出了他导师给定的建筑设计轨道,因为这时,创造了惊世之作“流水山庄”的大师赖特,给了他极大震撼。赖特宣称,他的全部设计思想,恰恰孕育胎动于中国2500多年前老子的智慧,老子说: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这里,“无”就是空间,老子的“无”道出了建筑艺术的全部奥秘:建筑是“空间的存在”,因此,建筑手段之“有”,是服务于建筑目的之“无”的。老子的智慧,从此照亮了贝聿铭,也成为一种基本旋律,奏响在他建筑设计的华采乐章之中。

华盛顿美术馆东馆,是贝聿铭把建筑空间艺术性阐释得美仑美奂的例证。贝聿铭接手此项设计,遇到的是前所未有的挑战,从外部空间来讲,制约甚酷,新建的东馆必须与约翰·波普40年前设计建造的老馆隔街呼应,形成一气呵成之势,而致命的危机在于新馆的地面是一个不规则的梯形,几乎很难与老馆“唱和”,更不用说必须与周边的国会山、林肯纪念堂、华盛顿纪念碑等保持总体精神的一致。贝聿铭苦苦寻思,最后终于解析出两者之间潜含着的三角形空间对应关系,以此为契机构思出他的设计。而东馆的内部空间造形,更是令人叹为观止,充分显示出他把握时空脉语的精到,美国建筑界一致公认,贝聿铭的这项设计,“成为这个国家超级展览橱窗”。

中国古代用砖石木为基本建筑材料,以此形成了各种拱券,来结构空间的跨度:平弧拱、弦拱、半圆拱、四分之一拱、拱形桥、拱形洞等。贝聿铭得之于心,运用现代的空间网架、辅以玻璃幕墙,使中国古代的空间跨度结构焕发出新的时代光芒。纽约会议中心是他的倾力之

不容置疑,贝聿铭接受的是全套美国式的建筑教

作,他尽量去除墙、柱等承重结构,达成宽敞、连续、完整的内部空间,他精心设计的空间网架气势恢宏,覆盖了曼哈顿岛整整五个街区的跨度,而玻璃幕墙则以磅礴的气势,辉映着纽约市中心的壮观景色。

三

中国古典建筑是复合的平面空间艺术,如唐代著名寺院“章敬寺”,为我国历史上最大寺院,共48院,殿堂屋舍总数达4130间,波澜壮阔,而又情韵悠长;通过亭台楼阁榭轩廊斋馆等园林建筑手法,造成一步一景,又通过山水石花土草藤等自然景物映衬,形成丰满层次,传达出“天人合一、亲近自然”的中国文化精神。贝聿铭向为中国古典建筑艺术所迷醉。早在学生时代,他就以“上海博物馆”为题完成设计作业,作出了完全不同于西方建筑的艺术处理。之后,他一直意欲以中国古典建筑的神韵为基调、以西方的现代建筑技术为辅助,在中国大地上留下他的作品,表达他对中国文化的眷恋和厚爱。因此,1978年,他欣然接受了北京市政府的邀请,主持香山饭店的设计工作,一遂宿愿。香山饭店,在他的创作历程中不是一个大项目,但意义是极大的,他说:“虽然现在是具体设计一座旅馆,但我的真意是在寻求中国现代建筑民族化的道路。”他十分清楚,以前人们往往用大屋顶、飞檐等来强调民族化,结果造成了一批俗艳的假古董。他要拿出时代感和民族性俱佳的作品。为此,他进行了精细严密的准备工作,先后六次往返于北京和纽约之间,并多次到苏州、扬州和杭州等地考察古典园林建筑,以此廓清思路。特别是苏州园林,给他很大的创作启发,他发现,苏州园林无论是“经缘池转、廊引人随”,还是“曲径通幽、庭深院小”,或是“以小胜大、以少胜多”等等,都是在“动”与“静”的视点变换把握中获得充分的空间想象,给人以变幻之美。

因此,贝聿铭先是用空间网架革新传统的主体承重构造,配以玻璃顶棚,使香山饭店获得纯净、明快和敞亮的时代精神。之后,他主要按照中国古典园林精神行事:用变化腾挪的中轴线,串联十多个庭院,运用影壁等间隔手段,造成厅与厅、院与院之间欲断又续、若即若离、既有“社交性”又含“私密性”的宾馆流动空间状态,特别是他充分考虑到与香山四时之景的和谐一致,将楼高限在四层,依据地势将建筑水平展开,大片白墙和菱形图案以及窗饰形成有机整体,被协调于香山的静谧清远之中。

四

半个多世纪的辛勤劳作,贝聿铭的作品遍及世界各

大城市:蒙特利尔玛丽广场办公楼、达拉斯市政厅、纽约大学生公寓、波士顿汉考克大楼、肯尼迪图书馆、巴尔的摩世界贸易中心、新加坡华侨银行大厦、香港中国银行大厦等数百个。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香港中国银行大厦,在贝聿铭一岁之时,他的父亲亲手创立了中国银行的香港分行,而在贝聿铭70岁之时,设计了这幢亚洲最高建筑。

自然,贝聿铭在西方的建筑,绝大多数是摩天大楼,是那种向上铺展、垂直叠加的空间结构,充分体现出当代社会昂扬的时代精神状态,拔地而起的豪情壮志和主宰自然的信念和洒脱。但这并不是与中国文化为基调的东方的建筑空间对立的,两者是可以相容的,贝聿铭正是在他的作品中,运用东方的艺术手法来处理、加强他的建筑美学效果。留出空白,现代高层建筑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以线条简洁的几何形体,透射勃勃生机。在贝聿铭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各种基本的几何图形,还可以看到几种几何图形的拼接组合。这里,他常常运用中国书画“计白当黑”的写意布局,在他的几何图形上做“减法”,留出空白,使建筑整体栩栩如生、灵气飘逸,有雕塑感,这是贝聿铭作品的一大特色。他的前辈早就使用混凝土来加强建筑的粗犷雕塑感,贝聿铭也使用混凝土,但他更多的是吸纳以苏州为代表的江南建筑粉墙黑瓦体现的细腻特性,追求淡雅素净的风韵,因此,他的混凝土经过精细化处理,使他的建筑晶莹光润,于精致流畅中加强雕塑感。借景生情,这是中国古典建筑的常规手法,贝聿铭常常运用玻璃幕墙,通过建筑各侧面与周围环境的角度调整,广涵市景,使建筑熠熠生辉。内饰艺术,贝聿铭的建筑不是一个空壳,对于建筑的内部装饰,他是与整个建筑通盘考虑的,他往往通过浓郁的中国写意情调之中渗透出的气氛,来激活建筑空间,北京香山饭店休息大厅中赵无极的水墨山水,即是范例。

五

建筑是人类精神的注解,建筑又体现了当代社会人们共同的家园意识。

为了准确表达时代精神,贝聿铭呕心沥血、执著追寻,他说:“对我来说,设计是一个缓慢的乃至痛苦的过程。”

而中国的智慧,他的中国心,常使他化险为夷、柳暗花明,他曾十分肯定地说过,中国的艺术,使他豁然开朗。

在美国闯天下成功的华人并不少,但象贝聿铭这样成就辉煌,举世瞩目的,屈指可数。

(责任编辑 黄 梅)

三次『金钥匙』奖获得者李美筠清贫的一生

● 田兰富 齐海萍



李美筠教授近影

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李美筠从一个弃儿到名震异邦，先后攻取美国三所大学的三个博士学位。她精通五国语言，以品学兼优荣摘两所著名学府的三枚“金钥匙”。美国《纽约时报》、《鲁彻斯特日报》等传媒曾以显著位置对她进行报道，曾是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座上客；她放弃国外优厚待遇毅然回国，倾其所有创办营养站，自己清贫一生，资助贫困学生。

1995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对南京师范大学举行第二届“李美筠教育奖学金”颁奖仪式作过报道，奖学金的设立者是南师大的一位退休教授李美筠。

一月的江南，寒意浓浓，古城南京早早散发出新年的气息。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手持一束鲜花慕名叩响了这位世纪老人的房门。

从这位亲自为我们开门、童颜鹤发、谈吐自如、思路清晰的老人身上，丝毫找不到百岁老人的影子。环顾李老的居室，令我们惊讶不已，值钱的家当只有一台12英寸黑白电视机，一张木板单人床，一只老式衣柜和一只当年从美国带回的漆色剥落的木箱，室内既无豪华的地毯，更无“空调”，一只蜂窝煤炉是唯一的烧水取暖的工具。老人坐在一张缠了又绑的破藤椅上，扶正老花镜，以

一种平静的心情,启开了那封尘已久的往事

深爱她的父亲不忍心看她被活活饿死,违心地将她丢弃在上海一所教会医院门口。一位好心的中国医生捡回了这个幼小的生命

1902年冬,上海。

低沉的天空洒洒扬扬的大雪,犹如翻飞的蝴蝶扑打着行色匆匆的人们,这是一场多年不遇的大雪。远处外滩鼓楼上传来沉闷嘶哑的钟声,已是到了傍晚之时,昏暗的路灯也次第亮了起来,把厚厚的积雪覆盖的房屋映射成浅黄色。路上行人渐稀,偶有几个缩头缩脑的人们早已竖起高高的衣领急匆匆往家赶路,一切都显得冷冷清清。在一座红房医院的雪地上却传来一阵凄厉焦虑的童稚的喊叫声:“爸爸……爸爸……”渐渐地喊声变成了哭声,一个小女孩绝望地在雪地上踩着麻木的双脚,两只冻得紫萝卜似的小手一边擦着泪水,一边作喇叭状哭喊着,望着逐渐暗下来的夜色,小小的脸上充满了绝望。

这个被遗弃的女孩子就是李美筠。她1896年降生在一个破落的家庭。新的生命没有给这个已有四个孩子的家庭带来任何喜气,只是使这个家庭又添上了一个沉重的砝码,小美筠一生下来就身体孱弱,不久又染上肺结核,爸爸变卖着家中仅有的家当为小美筠抓药治病,本来就一贫如洗的家,有了这么一个小“药篓子”,无疑是雪上加霜。两年后,妈妈又生下一个妹妹,家境更加艰难了。小美筠5岁那年冬天,衣衫单薄的美筠得了伤寒,整日不停地咳嗽,肺结核更重了。家中再也拿不出钱来给她买药治病,妈妈含着眼泪劝爸爸干脆把小美筠扔掉算了。小美筠似乎从父母的脸上读出

了什么,扑通一下子跪到爸妈面前,哭着求道:“爸爸妈妈别扔掉我,美筠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吃药了……”爸妈抱着她哭作一团。

为了不让孩子饿死,爸爸只好抱着小美筠到上海投奔她舅舅。舅舅是上海一个颇有名气的富商,由于家境悬殊,两家已断绝往来。爸爸抱着她在寒风中叩响了舅舅的家门时,舅舅看着衣衫褴褛的父女,竟拒不相认,“嘭”地关上了厚厚的大门。饥寒交迫的父女蹒跚着漫无目的地游荡在暮色渐浓的上海街头,雪下得愈来愈大了。把小美筠抱回去无疑是等死,当他们走到上海红房子教会医院时,爸爸让她在医院门口等着,说去买点吃的,天色变得越来越暗,可小美筠左等右等仍不见爸爸回来,寒风冻得她瑟瑟发抖,不停地咳嗽,天空全黑了。下来,小美筠害怕了,终于,忍不住大哭了起来。

小美筠的哭喊声惊动了上下班的医护人员,人们围观了一会儿哭哑了嗓子的小美筠,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叹口气走开了,小美筠从大人们的小声议论中朦朦胧胧明白了一切:爸爸不要她了。她变得非常恐惧,哭得更伤心了。一位刚刚下班的姓黄的中国医生路过这里,从围观人群中得知小美筠的情况,黄医生双眼潮湿了,他与小美筠有着相同的经历。黄医生拨开人群挤进去,毫不犹豫地小美筠抱在怀里,带回了家。

在黄医生的精心调理下,小美筠的肺结核病居然很快痊愈了,原来面黄肌瘦的模样不见了,一张白白胖胖的小脸渐渐挂上红晕。黄医生白天上班,无暇照应小美筠,便把她带到科室,乖巧的小美筠既懂事又有礼貌,长着一张甜甜的嘴巴,整天“叔叔、阿姨”叫个不停,很快深得医护人员的喜爱,谁有空谁就逗她玩耍,护士小姐走到哪儿,她跟到哪儿,穿梭于各病房科室之间,医生护士们抽空教她识起字来。医生们疼

爱,病号们喜欢,小美筠成了大家共同的孩子。小美筠的聪明可爱,招致了许多人来找黄医生协商抱养她的事宜,每当这时候,她便躲在病床下哭叫着不出来。1902年12月15日,小美筠迎来了她7岁的生日,黄医生把她被遗弃的日子定为生日。这天晚上,科室的叔叔阿姨们来到黄医生家给小美筠过生日,黄医生亲切问她:“你喜欢什么样的礼物?”小美筠闪动着机灵的大眼睛稚声稚气地叫道:“我什么也不要,我要读书。”叔叔阿姨们互相惊讶地对望着,欣慰地笑了。

一心要读书的小美筠,不辜负收养人黄医生的期望,从小学到大学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在黄医生和同事们的资助下,小美筠背着书包一蹦一跳地走进了圣玛利亚小学,学习成绩名列全年级第一名。小学毕业后,小美筠以优异成绩考取了江苏镇江重实女中。这所中学是江南颇有名气的女子寄宿中学,在此就读的大多是达官贵族子女,但学校有明文规定,凡学习成绩在前三名的都可以免去全部学杂费。离开上海到镇江读书,虽然黄医生还不时给她寄零用钱,但此时的美筠已颇懂事理,她要凭自己的努力免去学费,减轻黄医生的负担。每到周末,同学们都被父母接回去过礼拜,空荡荡的宿舍里只剩下她一个人,她便把自己关在寝室里埋头读书,几年下来,小美筠一直是全校的学习冠军,不但免去了全部学费,每年还得到60美元的奖学金。女中毕业后,学校把这位“优生”留校,16岁的李美筠终于有了一个安定的归宿,她为自己终于有了一份理想的职业而欢欣和满足,忘我地投入到教书育人的工作中。独特的生活经历使她有一颗广博的爱

心,所教的班级样样走在全校前列,加上她又拥有很好的人缘,两年后她被校方推荐为校长。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李美筠既有女孩儿的温柔善良,又有男人的大胆泼辣,上任后很快把学校管理得有声有色,镇江重实女中以严谨的教风、端正的学风和扎实的校风,深得社会各界的赞誉。

正当李美筠在校长的位置上干得如鱼得水之时,上级教育督导部门下达命令,凡任中学校长的必须有大学文凭,美筠只好离开了校长位置。教师位置早已满员,她便要求做名勤杂工,哪怕是扫地洒水,她都肯干。同事们劝她另谋出路,也有一些颇有门面的家庭前来说媒,李美筠都婉言谢绝了。她实在太钟爱教师这一职业了,她不愿离开校园,不愿离开学生们,她要重返教师行列。于是她每天在繁杂琐事忙完之后,更加勤奋地啃起了书本。苍天不负有心人,翌年,她以优异成绩考入金陵女子大学。春去秋来,寒窗四载,李美筠终于顺利获取了教育学和卫生学两所大学文凭。毕业之际,沈阳大学急需一名精通英文、法文的教师,经学校推荐,她便打点行李踏上北上的火车,到沈阳大学就职。

1924年,在沈阳执教的李美筠从一同学的来信中得知,安徽合肥三育中学一位洋人校长常常刁难中国教师,污蔑中国学生,中方私下四处寻求合适人选,准备替换洋人校长。读罢来信,李美筠义愤填膺,晚上躺在床上辗转难眠,替换洋人校长的念头在脑海中萌生。她披衣下床修书一封,寄往合肥,收到回函后立刻向沈阳大学呈交了辞职报告,风尘仆仆赶到了合肥,顶替了洋人校长,成为当时轰动一时的新闻。在合肥,她把三育中学办得红红火火,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李美筠对穷人有着一种难以割舍的感情,她一面教书育人,一面用自己的薪水接济贫困人家的孩子读书。1928年,

已过而立之年的李美筠,又以优异成绩考入燕京大学,三年之后,她又获取了教育学、数学两个硕士研究生学位,又回到了她的母校金陵女子大学任教。

作为金陵女子大学的教学、学术骨干,李美筠先后应邀到全国许多城市讲学,参加学术研讨。她渊博的知识,独到的见解和严谨务实的学风,得到许多学者、专家的赞赏,为此,她获得了由美国华盛顿大学在中国设立的奖学金,成为第一位荣获此荣誉的中国女教师。同时,华盛顿大学决定邀她免费入学深造。她把得到的奖金全部献给母校,以资助那些家庭贫寒的学生读书,然后辞别了同事、朋友,远涉重洋,步入了异邦的校园。

异邦求学生涯,坎坷艰辛,面对洋人的轻蔑,她挺胸昂首,攻取三个博士学位,三度获取美国两所著名学府的“金钥匙”奖,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头的炮火打开中国的大门,日本法西斯的铁蹄肆意践踏华夏大地,中国人民处于一片血雨腥风之中,祖国大地上的隆隆炮火同样震荡炙烤着海外学子的心胸,全国人民正投身抗日驱侮的战斗之中。国土沦丧,同胞受辱的消息传到大洋彼岸的美国校园。曾担任过校长的李美筠显示出非凡的组织能力和感召力,由她牵头,留美中国学生很快组成同学会,声援国内的抗日战争,开展各种形式的集会、演讲,寻求探讨救国计策。他们唱中国歌,演中国戏,卖中国货,她还带领同学求助于鲁彻斯特的一个中国饭馆的老板,临时停止生意腾出餐厅供留学生们集会,为中国抗日捐款。主席台上李美筠慷慨陈词:“我们虽人在异邦,但都

心系祖国。国土在沦丧,同胞在惨遭屠戮,我们这些炎黄儿女绝不能袖手旁观,那里是生育养育我们的故乡。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人越聚越多,几千人到场,他们便走出店堂到广场上进行演讲:“凡是热爱中国,去过中国的各国朋友,在美国的中国人,我们的国家正处于危难关头,让我们都伸出援助之手……”广场上回荡着激昂的歌声:“大道行呀,天下为公……”老人至今还能清晰地哼唱出这首歌。经过四处游说,很快募集到6万美元,李美筠带领同学赶往中国驻纽约大使馆,由大使把钱转交到中国抗日前线。祖国的荣辱牵动着每一位海外游子的神经。有一天,李美筠抱着书本走在去教室的路上,一个美国学生用挑衅的口气嘲讽她“亡国奴”,李美筠一听顿时火冒三丈,昔日温文尔雅的淑女风度顷刻间荡然无存,俨然一只发怒的雄狮,声嘶力竭地痛斥那个洋小子,开始用英语,后来干脆讲起汉语,那个洋小子被她的声色俱厉吓得目瞪口呆,最后老老实实、羞愧交加地说道:“Sorry, I'm very sorry…”(对不起,非常对不起!)

战火在继续燃烧,李美筠十分关注国内的战况,常常写信询问消息。当她得知许多学校被迫停课,这使她寝食不安。上课之余,她便常到书报社帮助翻译资料,到医院作护工,把打工赚的钱寄回自己的母校金陵女子大学和合肥三育中学资助办学。那次被辱为“亡国奴”的事件在李美筠的心灵中留下了永远抹不掉的印象,她发誓在学业上要助长中国人的志气,在同学会上神色悲壮地呼吁:“我们的祖国在蒙受耻辱,外国人歧视我们,我们决不能无动于衷。作为学生,我们现在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发愤读书,学成后报效祖国。”一个学年下来,她以门门功课全优的成绩荣摘华盛顿大学的“金钥匙”奖,该奖是授予全校各学科最优秀最有发展前途的学生。李

美筠成为留学生中第一个荣获此荣誉的中华女学人。消息传开,教授、导师、各个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手持鲜花纷纷前来祝贺,给她带来了她爱吃的巧克力糖,大家沉浸在一片欢庆之中。美国《纽约时报》、《鲁彻斯特日报》等传媒在显著位置报道了她获“金钥匙”奖的消息。第二年她又攻取教育学博士学位。也许是童年的遭遇或是在医院耳濡目染的缘故,李美筠心中最向往的职业一是当教师,二是作医生。于是,在获得教育学博士学位后,她又报考了康奈尔大学的卫生学和营养学的博士研究生。学习之余,她经常到附近一家慈善机构开办的医院里做护士,一边实习所学专业,一边打工赚钱寄回中国资助办学。两年后她顺利获得这两个专业的博士学位,同时又摘取了康奈尔大学、密西根大学的两枚“金钥匙”奖,毕业后被留校任教。李美筠的聪明才智和敬业精神颇得校方的赏识和学生的称道,加上她开朗、爽快、热情的性格,许多美国朋友都以能为她做点什么而高兴。当时,奶油在美国是一种极紧缺的食品,能吃上奶油是一件令人羡慕的事情,当人们得知她买不到奶油时,都把自家仅有的奶油送到她的宿舍,美国朋友用这种朴素的方式表达对这位中国女学人的敬爱。一位女同事很想为她做点什么,便征求她的意见,李美筠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我想见总统!”无巧不成书,她这同事的一位亲戚正巧在白宫罗斯福总统办公室任要职,同事爽快地答应下来,她们与总统夫人取得了联系,总统夫人热情地邀请她们到白宫做客,罗斯福总统专门抽出时间接待了她。她渊博的知识,端庄高雅的谈吐以及她的学有所成,令总统大加赞赏。当总统得知她来自中国南京时,饶有兴趣地询问南京的情况,原来,罗斯福总统的一位舅舅当时在南京经商,每次回国都会给他带来一些瓷器及珍宝,

总统热情地领她参观了他的收藏室。当她看到祖国的许多国粹琳琅满目地出现异邦的室内时,欣喜中颇有几分感慨,心情更为沉重。总统还为她亲笔签发了自由出入白宫的通行证,李美筠成了总统府的常客。

尽管有媒妁之言,但她目睹姐妹们的遭遇,使她对婚姻有一种莫名的惧怕;她选择了独身,终生未婚。但她并不失爱心,她把全部的爱无私地献给了孩子、学生和穷困人

看到至今耳聪目明的李老,让人很难相信这是一位百岁老人。至今从她的气质上还不难想象她当年是何等风姿绰约。少年时代的李美筠,从镇江重实女中毕业时已出落得亭亭玉立,加上江南女子的水灵俊秀,成为众多同龄人倾慕的偶像,也成为许多显达家庭谋娶的最佳人选。中学快毕业时,一位国文教师专门把她叫到办公室说有事相告,坐下后方知,这位国文教师的一位正在读大学的侄子,一表人材,且家境优裕,对李美筠爱慕已久,特托姑姑替他说媒,闻罢,李美筠神经质地吓白了脸,带着哭腔叫道:“老师,饶了我吧,我不嫁人。”窘得老师手足无措。从此,再也不敢提及此事。升入金陵女子大学后,对众多的说媒者和求婚者她都婉言谢绝了。

十几年后她留学美国,西方开放观念同样不能改变她的初衷,同样让众多的迷恋者碰了软钉子,包括许多教授、同学及社会名流。几十年以后李老谈及此事,依然没有半点儿遗憾,旧社会妇女地位和三纲五常的束缚,对她形成一种条件反射似的恐惧。无嗣并没有让她失去天伦之乐,她全部的爱无私地倾注到了她钟爱的教育事业和热爱的学生身上。

1945年8月15日,长达八年

的抗日战争终于以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而结束,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难以计数的损失和创伤,战争留给人们的是满目疮痍,一切百废待兴。1946年南京大学郑校长偕教务长一行数人前往美国诚招人才回国执教,以振兴中国教育事业。

李美筠接到邀请后,迅速作出回国执教的决定,立刻着手准备回国事宜,并成为南京大学的游说员,在她的带动和影响下,许多学有所成的莘莘学子,毅然放弃优裕的待遇和条件,踏上回国执教的归途。1991年去世的西北联大著名教授蓝天鹤、仍健在的南京大学著名教授郑论等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学术界权威都是在李美筠的带动下回国的。当李美筠向学校递交辞呈时,却遇到了很大阻力,康奈尔大学多方设置软卡子阻止她回国,读博士时带她的导师及在美国的朋友都试图说服她,但都无济于事,她最终与同伴踏上回国的远洋客轮。望着波涛汹涌的太平洋,凭栏回望渐渐远去美国都市,李美筠心中感慨万千;转身遥望阔别多年的祖国,她心潮澎湃,热泪盈眶:“祖国,我回来了,终于回到了您的怀抱之中,我的一切都将属于您。”

清贫一生,倾己所有为他人。捐过多少款,资助过多少人,她从来不记。节衣缩食开办营养站,她这位营养学家自己竟营养不良

临回国前,当别人正忙于购买回国的物品时,李美筠正为一件事忙得不可开交。从南京大学校长口中得知,由于连年战争,通货膨胀,国内物资已极度紧缺,许多儿童患有营养不良症,上学更无从谈起,这深深触动她的心,童年的经历又浮现在眼前。她把自己在美国几年积蓄的一点钱买来一箱箱的食品,她

又得知美国一些慈善机构无偿供应救济妇女儿童“的万能餐”罐头，立刻跑去与慈善机构进行交涉，争取到一大批食品，托运回国，并与许多美国朋友达成协议，让他们定期领取救济食品托运给她。

回国时，李美筠的行李最多，食品就有十多箱，可真正为自己所有的只有书籍、资料和几套换洗的衣物。

来到南京大学，她出任南京大学女生院院长，她一边上课，一边在校外开办儿童营养站，方圆十几里的儿童都得到过她的周济。为了办好营养站，她拿出自己的积蓄四处购买食物调配营养餐，而这位营养学专家自己却出现了营养不良症，为了孩子的健康她早已把自己忘了。虽然在时过十几年后的“文革”中，她曾因此被扣上“对劳动人民行施小恩小惠，散发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帽子，并被没收了那三枚她尤为珍视的纯金钥匙。

一场浩劫过去，李美筠四处打探那三枚金钥匙时，早已石沉大海。提到此事，李美筠平静地说：“丢了就丢了吧，只是当初办营养站缺少资金时，没派上用场是个遗憾。”

自从李美筠回国执教后，她几乎是每月只花一点伙食费，把其余的储存，都用来资助那些贫困的学生。她说：“渴望读书，却没有机会读书，是世界上最可惜的事情，我愿尽我微薄之力，倾我所有，尽量帮助那些贫困的孩子获得读书的机会。”70多个春秋，她不知捐助过多少钱，资助过多少人，她自己也不记，也根本不去记。多少年后，有许多当年受到过资助的学生，纷纷从国内外赶回来“涌泉相报”时，面对充满着感激的学生，她总是念叨：“记不得了，记不得了。”对于报恩者的回报，她都会再如数地寄回，至于对那些地址不详的，她也就作罢，但都把它们一份份积攒起来，转手又资助了另一些生活贫困的学生。

一位当年在李美筠的资助下读完大学的女学生李茜定居美国后，仍然念念不忘老师的恩情，每年春节都要从美国寄上一份精美贺卡和礼物。1995年2月，李茜的儿子李中国应邀到中国讲学，特托儿子专程到南京重谢李教授，当李中国几经辗转在南师大找到她时，欣喜若狂：“找到了，终于找到了，你是我妈妈的大恩人，我代妈谢恩来了。”李老被这老“外”的举止弄得莫名其妙，李中国赶紧拿出李茜当年与李教授的合影，李老望着合影淡淡地说道：“记不得了，记不得了。”是啊，李老资助过的人太多了。教育系贺凤兰主任说：“李教授一生桃李遍五洲，她的许多学生分布在国内外著名学府执教，已成为知名教授，也有担任了政界商界的重要职务。”在李老的家中有两个纸箱特别显眼，里面装了来自各地学生的贺卡书信，一张寄自美国的贺卡上写道：“李老，您的桃李遍天下，我是其中之一，接受过您的资助，领受过您的训戒，这是我无尚的光荣，您俭朴、博爱的精神，是伟大的，我永远向您学习，并铭记您的教育。您的学生：修文”。这是一位现在美国一所大学担任教授的学生的肺腑之言。一位现在国务院担任领导职务的老同志，也曾得到李老的资助和教育，这位老同志每年总要专程到南京看望李老。

李老资助过的学生何止这些！1977年，她给唐山大地震灾区的学校寄去800元；1987年，她用自己《儿童营养学》等专著的稿费资助了4名安徽贫困山区的大学生读完大学；1994年12月，她又把自己多年省吃俭用积蓄的20000元捐给南京师范大学作教育奖学金；85岁离开讲坛后，她又把自己多年来珍藏的数千册书和资料全部献给了学校图书馆，并坚持从自己的退休金中拿出一部分资助在校的贫困生。每到学校开学时，她就到学校财务处，询

问哪些学生家境困难，交不起学费，她便悄悄替学生们垫上，并叮嘱财务处的同志不准对学生讲，财会人员也就只好信守诺言，他们对她的垫钱早已习以为常了。

1994年华盛顿大学得知李美筠仍健在，美国7所大学先后向她发出邀请，邀请她到美国去观光讲学，有的大学并寄来费用，这对南师大来说自然也是殊荣，南师大的领导也拨出专款为她办理出国事宜，并安排了专人护送。但她得知此行要费国家一大笔费用后，立即取消了计划，致信以身体不适为借口，婉言谢绝邀请单位。与李老相处多年的安徽无为籍保姆刘秀珍深有感触地说：“李老帮助他人特别大方，对自己却极为苛刻，生活简朴，粗茶淡饭，常常只吃一个菜，有时一碗面条或水饺就应付一顿。”告别讲坛，离开了学生们，李老又担任起宿舍区的义务保姆，年轻的教师有时夫妇两人忙不开时，常常把孩子往李老面前一放，尽管去忙自己的事情。这也是李老最喜欢干的事，对孩子疼爱倍加，孩子们一放学便往李老屋里钻，她家便成了孩子们的乐园。

这是怎样的一个女性？这是一个伟大的女性！李美筠的一生是清贫简朴的一生，同时又是富有充实的一生。她没有留下巨大的物质财富，甚至没有自己的孩子，但她桃李满天下，又有哪个百万富翁、亿万富翁敢和她比？整整一个世纪，李美筠走得绚丽。

面对她，仿佛面对一湾宁静的湖泊，一片幽深的茂林，浮躁的灵魂即刻变得安定，心胸也被感染得净亮坦荡起来。“不必为个人的一切作过多的注脚，与其用喋喋不休的解说去换取他人怜悯或赞誉，不如用默默无闻的劳作为社会撑一片绿荫，献上一份爱心。”这就是一个百岁老人的心声，这位世纪老人仍在延续着她那圣洁高尚的不了情！

（责任编辑 舒元璋）

没有一个 有关香港的 《穿鼻草约》

邱远猷

贵刊于1996年第一期发表的徐庆全同志所著《1841—1997年：香港156年的风雨历程》专稿，立意正确，论述清楚，可读性强，很有积极现实意义，读后收益匪浅。

但是，文章谈到这样一段历史：“当1841年1月20日义律提出四项正式要求时，25日，琦善便在穿鼻洋的海面上，全部接受了这些条件。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穿鼻草约》。条约的内容为：(1)割让香港予英国；(2)赔款600万银元；(3)两国官吏平等相待；(4)恢复广州通商。”“尽管这个条约还仅仅是个草约，但义律为了造成既成事实，1月21日即迫不及待地公布了。”我认为这是沿用了中外近代历史学界多年流传的《穿鼻草约》的旧说，忽略了近年来有关香港历史研究的新成果，不符合历史实际。

中英谈判中琦善始终 未向义律答应割让香港

历史事实是这样的。1840年6月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8月15日，英国政府正全权代表、侵华军总司令乔治·懿律和英国政府副全权代表查理·义律在天津将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子爵致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交由直隶总督琦善代表白含章转递清廷。其中，即提出了赔款及割一岛或数岛的无理要求。8月30日，琦善与义

律在白河口岸举行会谈。9月28日，清廷决定将林则徐、邓廷桢交部严加议处，令林则徐即行来京听候部议，以琦善为钦差大臣署两广总督。

11月29日，琦善到达广州。懿律到广州不久，即因病回国。由义律继任全权代表。12月4日，义律照会琦善，提出赔款、开埠、割地等14条侵略要求。几天之后，琦善复照义律，答应赔款五百万两，对其他条款也表示“善为调停”。但对割地一事，琦善则予拒绝。他说：“只有请给地方一款，实因格于事理。”“若贵公使大臣，必将此一款，始终坚执，势必致诸事不能仰邀大皇帝允准”，请“详细思之”。

12月12日，义律照会琦善，明确表示不再要求割地，说：“请给地方一节，据来文称云，已奉大皇帝谕旨，不愿如此办理。即英国原亦不求取地方。”但条件是：除要求赔款700万两外，要求开放三个港口：广州、厦门、定海，并提出英军将“在外洋红坎山（即香港）暂屯，俟各事善定全完之后，撤回本国”。

12月15日，琦善照会义律，重申割地是“天朝从来未有之事，其势断不能行”。至于通商口岸这个条件琦善答应了，表示可“代为奏恳圣恩”，广州之外“另给贸易码头一处”；但是只准“乘舟载货前往，即在舟中与行户互市，仍遵定例，不得上岸居住，与居民私自交换”。

琦善与义律谈判的这些基本准则，是遵循了道光帝的原则的。在琦善最初给道光帝的奏折中，流露出英国侵略者对香港等地的垂涎，对此道光帝曾有过明确的朱

批：“愤恨之外，无可再谕！”后来琦善在奏折中，报告他答应赔偿烟价和增开通商口岸一处，道光帝又朱批道：“恰与朕意吻合”，“好”。当时，道光帝的态度是十分清楚的，其他条件可以让步，但对割地一事，绝不妥协。

侵略成性、贪婪无厌、狡猾奸诈的义律在了解到广州防务虚弛的现状之后，居然出尔反尔，于12月29日，向琦善重提割地问题，要求“予给外洋寄居一所，俾得英人竖旗自治，如西洋人（按：即葡萄牙）在澳门竖旗自治无异”。琦善对义律提出的仿照葡萄牙人在澳门之例，不敢贸然答应，并于1841年1月2日照会义律：“查天朝准令外国之人前来贸易，已属大皇帝格外恩施，断无再给地方之理，亦经本大臣爵阁部堂备文照会（指1840年12月17日琦善给义律的照会）。并据贵公使大臣来文内，声明不再求地，今何以又有予给寄居一所之语？”

义律看见琦善态度强硬，十分恼怒，于1月5日照会琦善，声称以“照兵法办行”，进行恫吓。1月7日，英军攻陷大角、沙角炮台——虎门海防的第一重门户。

1月8日，义律和英国海军统帅伯麦照会广东水师提督、据守虎门炮台的关天培，提出了五条要求，其中第一条就是：“应将现归英国占据之沙角地方，仍留英国官员据守，给为贸易寄居之所。”并限琦善三日内答复。1月10日，义律在照会中重申：“所有开载款节，稍毫未能更改。”如果琦善“仍执前见，不允所请，必仍行动兵交争”。

1月11日，琦善万般无奈，复照会给义律，答应代奏“给口外外洋寄居一所”。

1月14日，义律又照会琦善，把原来要求“外洋寄居一所”改为“尖沙咀、香港等处”；把原来要求“寄居地”“竖旗自治”改为“让英国主治”。义律的侵略要求在升级，妄图迫使清廷割让香港给英国，而不仅是作为英人寄居贸易之所了。

1月15日，琦善复照会义律，尖沙咀与香港两处，只同意“择一处地方寄寓泊船”。

1月16日，义律复照会琦善，提出“以香港一岛接收，为英国寄居贸易之所”。此前，1月14日义律照会中提到的“外洋寄居一所”的“香港”，当时还不是“香港全岛”的总称，而是专指香港全岛上的西南一隅；当时香港岛的西北部称裙带路，东北部叫红香炉，中部是大潭，东面是赤柱。正因为如此，义律当时的照会提到“寄居”的“境界”，可另行详定。琦善在1月15日复义律的照会中同意择一地“寄寓泊船”时提到的香港，自然也是指香港岛上的一隅。他为了准备将来与英军“酌定限制”香港一隅，还在1840年12月28日向道光帝的奏折中报告：“至于香港地方，奴才先已派员前往勘丈，俟奉旨准行”。这里所说的“香港地方”，也是指的香港一隅。1841年1月16日义律的照会，显然是得寸进尺，故意把香港一隅变成了香港全岛，侵略扩张的野心昭然若揭。后来，2月26

日，广东巡抚怡良向道光帝的奏报中说得明白不过了：“该夷前求香港与之寄居，意不重在香港，……名则借求香港，实则欲占全岛。”

义律单方面宣布双方议而未定、更未签字的割让香港的“初步协定”

1月20日，义律照会琦善，表示马上归还沙角、大角，但“所有兵船军师，撤退九龙所近之香港岛地驻扎。”同时，义律以向旅华英侨发布“公告”的形式，迫不及待地单方面宣布他与琦善议而未定、更未经双方签字的四条“初步协定”。“公告”声称：“女王陛下的全权公使兹宣告他和英国钦差大臣已经签订了初步协定，其中包括以下各款：

(1)香港本岛及其港口割让与英王。……”

这纯属虚构！义律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给英国资本主义侵略者武力吞并香港岛制造“条约根据”。果然，上述“公告”颁布后第五天，即1841年1月25日，英军便在香港岛强行登陆。26日，英军正式举行了占领香港岛的典礼。

1月27日，清廷下诏对英宣战。同日，义律把“初步协定”作为“章程草底”，与琦善在狮子洋莲花山下的莲花城，举行第一次秘密签约谈判。义律一开头就出示他拟定的条款，头条就是“香港之岛及港让给英国。”琦善不允，谈判破裂。英方的记载说：“……义律大佐和琦善在莲花山塔下会见。……但是他们毫未达成具体协议”。事后，琦善在向道光帝的奏折中也说：义律出示“章程草底”，“奴才当加指驳，该夷即求为酌改，兹已另行更定，容俟拟就，录呈御览”。

2月10日，琦善以自拟的《章程底稿》4条，与义律在穿鼻洋蛇头湾，举行第二次秘密签约谈判。因琦善仍只准英人在“新安县属之香港地方一处寄居”，义律不同意，而要“坚求全岛”，谈判又无结果。

2月13日，义律向琦善发出照会提出《善定事宜》七条，坚持要割香港全岛，让琦善加盖关防。

2月15日，琦善派心腹鲍鹏向英人声明不能签字，“请再予十天进行考虑”。

2月16日，义律再次以武力相威胁，照会义律说：“本月之内，倘终未能以善定事宜条款，盖印了结，请审全妥，必使再开衅端，不免仍复相战。”

这时，琦善已因奏请香港给英人寄居被革职，因此，他就“告以患病，藉延时日”，于2月18日照会义律，借口病重，请求义律暂缓办理。直到26日他被锁拿解京，始

终没有在义律的《善定事宜》上签字或加盖关防。自然事后也就不存在经过中、英两国政府批准的事情。

1841年1月20日义律单方面发布的,他和琦善议而未定,更未经双方签字的“初步协定”,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却是从英国报纸所载看到的,而没有收看到,也不可能收看到义律呈送英国政府审查批准的义律与琦善正式签订的协定和条约文本。因此,巴麦尊在1841年5月14日,致函义律,明确地指出:“在你和琦善之间,对于割让香港一节,并不是像签订了任何正式条约。”

1841年2月26日琦善被锁拿解京后,两广总督祁埭和广东巡抚怡良奉旨调查他的问题。他们在向道光帝的奏报中说:“现据署大鹏协副将赖恩爵禀称:该夷前求香港与之寄居,意不重在香港,而重在裙带路与红香炉,名则借求香港,实则欲占全岛。……至前署督臣琦善是否给与全岛抑止给一隅,并无明文。……又查琦善任内所出示文,有该夷既准贸易,复求寄居,既准寄居,复求全岛之语。……窃意琦善原只许以一隅,俾得寄居,而夷情无厌,遂借此要借求全岛,似系实在情形。”

由上可见,1841年1月20日义律诡称他与琦善已就割让香港达成了“初步协定”是没有历史事实根据的。只能说这件事是英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对华实行军事进攻与外交讹诈两手政策的例证,真实地反映了近代英国对华关系的性质和特征。

关于义律诡称“初步协定”这一点,一些西方国家学者的论述,还是比较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如1958年英国学者G·B·安德葛特在《香港史》(英文)一书中首次论述说:“在广州的谈判,琦善拒绝义律提出的大部分要求,之后一个时期曲折的谈判,在1841年1月初破裂了。义律向广州行动,占据了大角炮台。三天后休战,恢复了达成一个协定的谈判,……义律和琦善两人安排在1841年1月20日于川鼻会谈,签订这个协定,但琦善提出了异议。安排在2月12日的最后一次会谈,也没有举行。事实上,条约从未签订。”又如,日本著名学者佐佐木正哉的《论所谓〈穿鼻条约草案〉》,在全面考察了义律与琦善在广州附近谈判的全过程后得出结论说,琦善“他并没有同意割让香港,而且也不曾签署这个条约”。

所谓《穿鼻条约》的讹传

与史学家的质疑和澄清

1841年1月20日义律“公告”是说他与琦善达成了“初步协定”。所谓“初步协定”,本无具体名称。所谓《穿鼻条约》或《穿鼻草约》之名,是后人所加的。最早见到的是1895年欧德理所著《欧西于中土:从开始到1882年的香港历史》(英文),称之为《穿鼻条约》。1928年马士和

宓亨利所著的《远东国际关系史》(英文),最早称之为《穿鼻草约》。“条约”与“初步协议”,不是同义语,欧德理将它称作《穿鼻条约》显然不合逻辑。马士和宓亨利将它称作《穿鼻草约》无疑掩盖了义律的破绽。从这以后,英美西方国家一些有影响的权威著作,多袭用此说。如1978年出版的英国《剑桥中国史》一书说:“从一八四一年一月二十日,琦善无能为力地同意了《穿鼻条约》”;美国1980年出版的《大百科全书》也说:“1841年1月20日,中国战败之后,被迫签订了《穿鼻条约》。”

在中国,最早以中文传播《穿鼻草约》这一说法的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萧一山和蒋廷黻。萧一山在1928年出版的《清代通史》一书卷中之中,根据马士和宓亨利所著的《远东国际关系史》,说义律与琦善于1841年1月20日“议定草约”。蒋廷黻在1931年发表的《琦善与鸦片战争》一文中,也称琦善“与义律定了《穿鼻草约》”,这也很可能是受了马士等一书的影响。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对蒋廷黻所说的《穿鼻草约》,没有见到有人提出质疑。这就是所谓《穿鼻草约》一说的由来。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新版的历史教科书和一些近代史著作中,依然保留着沿用多年的《穿鼻草约》的旧说。1983年2月2日《光明日报》发表了胡思庸、郑永福先生所撰一文《〈穿鼻草约〉考略》。以有根有据的中外史料,首次系统论述了琦善与义律在广东的谈判,最后得出结论说:“琦善始终没有向义律答应割让香港,只许寄居;而且始终也未答应英方占香港全岛”。所谓《穿鼻草约》是义律“单方面制定的条文,而琦善始终未在该约上签字或加盖关防”。“英国殖民主义者先是在没有任何条约根据的情况下,武力强行霸占了我国领土香港,以后又经过一年多的持续侵略战争,用武力胁迫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将抢夺来的侵略权益用条文的形式固定下来,充分暴露了殖民主义者的强盗本性。”接着,1983年第3期《近代史资料》杂志发表了吕良海先生的《琦善与义律谈判纪略》,文章根据各种中外史料作了进一步的论证,充分肯定了上述考证的正确性。1986年第3期《历史档案》杂志发表了庄建平先生的《琦善从未签订〈穿鼻草约〉》,文章根据琦善与义律在交涉期间的逐日往来照会,认为琦善根本没有签订《穿鼻草约》,所谓《穿鼻草约》是义律炮制的假协定。

近年来,一些潜心研究香港百余年来历史的学者,撰写了《19世纪的香港》、《20世纪的香港》等学术专著。他们也摒弃了沿袭多年的琦善擅订《穿鼻草约》或曰《穿鼻条约》的旧说,提出了新的见解。

对于这些新的研究成果和提出的新见解,我们的报刊应多加宣传和普及,以及时澄清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旧说影响。

(责任编辑 洛松)

张大千重金求名画

● 李永翘



1945年8月，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终于取得了胜利。这时在张大千的艺术生活中发生了一件大事，他通过重金求购，收集到了一些他梦寐以求的属于国宝级的中国古代名家字画。这其中最有名的，便是五代顾闳中画的《韩熙载夜宴图》，五代董源画的《江堤晚景图》、《潇湘图》。这几幅画的收藏经过，颇为曲折。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投降，我国东北的伪“满洲国”也随之土崩瓦解，“儿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仓皇外逃，于是长春伪宫中的文物书画，大量流出，在长春、沈阳、大连的地摊上，到处都是。中国的历代法书、名画等国宝，又遭到了一次大流失。

当时，古董商人们统称这批书画文物叫“东北货”。北平琉璃厂的古玩商人们，由单干逐渐走向“联营”，甚至组织了“八公司”，前往东北坐地收购，使大量的“东北货”流入了琉璃厂及津、沪等地。“一入龙门，则身价百倍”，文物商人们由转手倒卖“东北货”而发财暴富者，不知多少。有些书画还被倒出了国外。

张大千在战前，就曾担任过北平故宫古物研究所的导师。战后，故宫博物院专门成立了一个古物鉴定委员会，张大千又被聘任为鉴定委员，同时或先后担任鉴定委员的还有张伯驹、徐悲鸿、于省吾、邓述存、启功等人。张大千与其老友、著名的大收藏家张伯驹见大量“东北货”流落民间，担忧国宝被外国人所得，十分着急，曾多次向故宫院长马衡建议，赶快请政府拨出专款，以故宫名义将此批国宝收归国有，以免外流。但是，南京政府对

此不予重视,故宫无钱购买,有人多次送国宝上门给故宫,而故宫几经开会商量,还是无钱购进,只得忍痛将国宝退回,马衡对此也只能长吁短叹,无可奈何。

在这种情形之下,张大千、张伯驹决定,以自己个人的力量来进行收购,以免珍贵的国家文物外流。尽管个人的力量十分有限,但他们觉得,反正尽自己的最大努力,能保住多少就算多少。因此,当市面上传出有人要售出我国现存最早的绢画之一、著名的隋代展子虔作的《游春图卷》时,张大千专门乘飞机来观。他虽然对此画是心仪已久,爱不释手,但他听说张伯驹正在努力收购此画时,立即就退出了“竞争”,以免奸商乘机抬价。后来,张伯驹变卖了房产,其夫人潘素甚至还卖掉了大量首饰,终于以重金购得此画。张大千知道后高兴地说:“好,好!收了就好。伯驹和我是十多年的好朋友,我们收藏的目的相同。只要不落入外国人的手中,他收我收是一样的!”

中国的收藏家们,尤其是收藏古代法书名画的收藏家们,素来都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缺一不可。第一是要有钱,无钱则免谈,钱不够也不行。第二是要眼光精到,善于鉴别真伪。否则不光收不到好货,还会惹人笑谈,传为笑柄。第三则是要有机会,并且要当机立断,紧紧抓住才行。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旦错过,千载难逢。张大千虽不是很富有,但他却舍得花钱,尤其是他的精到眼光,更是帮了他的大忙。

张大千对自己的鉴赏力,比对他的绘画艺术更为自负。他曾说过,他长期以来“闻见既博,品藻斯严,宝墨偶遭,私意必获,性命托倚,魂梦萦缠,虽负巨遁,不易夙嗜”。这种性格和爱好,使他“事斯艺垂五十年来,人间名迹,所见逾十九,而敦煌遗迹,时时萦心目间,所见之博,差足傲古人”!故而 he 具有非凡的鉴定本领:“法书宝绘,看纷纶之满前;秦镜温犀,乃照烛之无隐。一触纸墨,便别宋元;间抚签牌,即区真贋;意之所向,因以目随;神之所驱,宁以迹论。斯盖料简之极诣,非诞夸之伪言!”他还曾相当自豪地说:“世尝推吾画为五百年所无,抑知吾之精鉴,足使墨林推诚,清标却步,仪周敛手,虚斋降心,五百年间,又岂有第二人哉!”^①

正因为张大千在书画鉴赏上有着如此过硬的眼光和功力,他不仅享誉于书画界、文物界,在当时古玩商中,亦享有盛名。

因而,早在战前张大千居留于北平时,他就成了琉璃厂等书画商的高级“顾问”与“咨询”。每日一早天还未亮,各古玩铺的掌柜、伙计就齐刷刷地来到了张家。张大千洗漱完毕,即坐在大厅上画桌前,将各古画商前日收来的书画逐一细看。他看画的速度很快,差不多是边打开边看,又随看随卷,是真、是贋、是好、是坏,则在这展看的过程中脱口而出,而其判断都几乎是一口一个准。

就在张八爷这儿细细观画的时候,旁边立着的古玩商们,则战战兢兢、心惊肉跳地等着八爷开口,仿佛是等待着听候判决的囚犯!若张大千说是真,那买到此画的古玩商则是眉开眼笑;若张大千说是假,则收到此画的古玩店老板就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只能怪自己眼力低,不争气,去收购此画的伙计则就很可能要被“炒鱿鱼”。当时,每日清晨,在张大千的厅堂之上,都要演出若干遍这种几人笑几人哭的“悲喜剧”。

张大千当时为这些书画商们所作的这种鉴定,是一概免费。有时兴起,他还会提起笔来,为某些书画写点跋语,或者为破烂者补一补漏,这当然会增添原物的分量及价值,古玩商们更为之欢天喜地。张大千愿为众人做这种“免费的义务高参”,也是怀有他的目的:一是可以大量浏览书画,从中学习,提高自己。二是他看到自己中意的有价值的书画,就卷起放在一旁,自己收购了,而该画的主人——古玩商们则多会嘻嘻笑着说:“八爷,价钱您老就瞧着给吧,反正您是内行,也瞒不过您,只要给小的赚一点跑路费就行!”由此,张大千用不多的钱,却收到了不少的好书画。第三,是他借此机会,认识并深交了许多古玩商朋友,他们一有什么书画消息就来报告,使张大千的信息特别灵通,有机会看到和买到了罕见的珍宝。张大千曾讲:“试问,有谁能有这么好的机会,每天都有这么多的人送这么多的书画来供你看,供你观赏,供你鉴定,供你参考,供你学习,供你收购?我如果再收费,这还能算是人么?!这其中若说是有什么利益,那也是双向的。他们说是要感谢我,其实应当是我感谢他们才对!”

张大千的这种豪爽作风,慷慨对人,以及他在书画艺术和书画鉴定上的深厚造诣,使得琉璃厂的书画商们只要一提起“张八爷”,个个都伸大拇指,皆曰:“那是没说的!”

也正因为张大千和古玩商们具有这种良好密切的“人际关系”,这才使他得以见着并收藏到《韩熙载夜宴图》等一批中国的稀世之宝!

那还是1945年冬天,张大千刚到北平不久。一天傍晚,有一熟识的书画商来到张宅,请张大千去鉴定一批古书画,说是“很有价值”。张大千怦然心动,遂随之出门,早有一辆黑色的小汽车停在门外。张大千上了车后,车子在城里七弯八绕,然后才出了城门,径直朝颐和园旁的西山方向开去。车子在荒野中又行驶了许久,这才在一个孤零零的背面靠山、前面空旷的茅屋前停下。整个过程颇像是“黑社会巨头赴会谈判”,搞得神秘兮兮的十分紧张,把个张大千弄得也摸不着头脑。

张大千下得车来,已是掌灯时分。他进了茅屋,只见

^① 张大千:《大风堂名迹序言》

有一个便衣黑大汉早站在屋内，腰杆笔直，颇有一种军人的姿态与风度。这黑大汉用压低的洪亮嗓门，开门见山地对张大千说道：“八爷，听说您老也是江湖上一条好汉，更是会画画儿和识货的这个！”他举起大拇指摇了摇，“俺是粗人，不懂得客套，先把丑话说在前头。我这儿有一批宝贝，今儿特地请您老来给看看。您老若有意要，我可以把这批货都倒给您。若是您老瞧不上这货，或者是出手不够意思，俺也绝不勉强，但是有一件事我要先叮咛八爷一声，今儿个这事，就当是全没发生过，请严守秘密，咱们仍是桥归桥路归路，还是朋友。否则，俺的眼睛认识八爷，俺这兄弟可不认识八爷，那时候请八爷莫怪俺事先没说！”黑大汉一边说着，一边从腰间取出一把匕首，说完，将那匕首一下插在了桌子上。桌面颤颤动着，锋利的匕首在煤油灯光下，发出一道寒光。

陪同一道来的书画商见状，赶紧上前来打圆场：“好啦好啦，大家都是自己人嘛，何必这样呢！还是先看货吧！”

张大千早年也被迫入过“黑道”，这些年来随着年龄增大，东奔西跑地更增长了不少见识，因而他看着这种场面，并不发慌。他仍是嘻嘻笑着说：“对喽，你们还是先把‘货’给拿出来，让我看了之后再说吧！”

在黯淡的煤油灯下，一块皱巴巴的、补丁摺补丁的蓝土布包袱皮给解开了，里面是长长短短的几个纸卷和绢卷，好像都是书画。张大千打开这些东西一看，只觉得眼前一亮，原来这些尽是他朝思暮想的古代法书、名绘，非常宝贵，从这些图上所钤的清廷“御览”等印记看，皆是属于从长春伪宫中流出的“东北货”。它们是：清宫旧藏的宋代《溪山无尽图》、《群马图》，北宋张即之的大字书法《杜律二首》，元代钱舜举的《明妃上马图》、姚廷美的《有余闲图》、周砥的《铜官秋色图》，以及明代沈石田的《临铜官秋色图》、姚云东的《杂画六段》等等。

接着，黑大汉又从包袱皮底下拿出最后一卷画，在灯光下徐徐打开，张大千只觉得浑身一震，身体竟情不自禁地微微发起抖来。原来，这幅古色古香的古代设色绢本画，正是他只在史籍上见过记载、而从未敢梦想亲眼得见的实物——著名的五代《韩熙载夜宴图》！

韩熙载（902—970），潍州北海（今山东潍坊）人，字叔言，后唐同光年进士，因其父被后唐主李嗣源所杀，遂亡归南唐，得到重用，累官至中书侍郎、光政殿学士承旨等职，到南唐李后主时，韩已是三朝元老。由于李后主对北方人多有猜疑，韩遂故意纵情杯酒，沉于声色，专好夜宴，以求保全。此图即李后主派画院侍诏顾闳中，去窥探韩熙载的“夜生活”后，如实记载并创作出来的画幅。

张大千还清楚地记得，据宋徽宗时的《宣和画谱》载：“中书舍人韩熙载，以贵游世胄，多好声伎，专为夜饮，虽宾客糅杂，欢呼狂逸，不复拘制。李氏惜其才，置而不同，声传中外，颇闻其荒诞，然欲见樽俎灯烛间，觥筹交错之态，度不可得，乃命（顾）闳中夜至其第，窃窥之，目识心记，图以上之。”此段历史记载，正标明了此图的真实来历。

张大千的心儿怦怦跳着，细观此图。只见在这幅长3米多的古代绢画上，共分听乐、观舞、休息、调笑、散宴等五段，各段以屏风相隔，前后连续又相对独立，是中国画中典型的分段连接的长卷形式。全卷中各个人物，刻画得惟妙惟肖，传神传真；服饰用具，则形象写实，一丝不苟。全图精细工整，设色清雅绚丽，线条流畅舒润，风格雅正清秀，是一幅技巧很高、功力很深的作品，更是中国古代人物画的杰出代表作之一。

张大千见了这种宝贝，欣喜欲狂，爱不释手，他当然要买。可是一问价钱，此图连同刚才的那几卷作品，黑大汉叫价一共要金条二百根，亦即黄金二千两！“乖乖！”张大千暗暗咋了咋舌。若是依这个价钱，要买他买不起，可



《韩熙载夜宴图》局部

不买又舍不得,于是商量再三,几经讨价还价,最后双方以黄金七百两成交。五百两购《夜宴图》,二百两则是购其他几卷的。

当时,张大千正好刚办过画展,手头有一笔钱,但这却是他准备用来买住房的。他来北平后,又按老习惯住在了颐和园万寿山养云轩内,但他觉得长此下去不是办法,遂准备在北平买座宅院,以作为在这儿的长期居留之所。经朋友帮忙打听到,有一所前清的旧王府正要出售,院落三重三进,面积广宏,房舍宽大,另还有六个独立的花园,包括水池、假山、回廊等等,房价亦刚好是五百两黄金。张大千看了此屋及周围环境,对这座旧王府十分满意,决定将之买下,并已向房主交了定金,不日即准备正式交割。

可是,这突然“杀”出的韩熙载,却使得张大千进退维谷。钞票只有这么多,要买了房子就不能买画,要买了画就不能买房。鲍鱼、熊掌二者不能同时兼得,这又应当怎么办?

张大千几经考虑、斟酌,最后还是决定下来:先买画!后来,张大千曾把此事告诉给台湾故宫博物院院长庄严说:“因为那所大王府,还不一定马上就有买主,而《韩熙载夜宴图》却可能一纵即逝,永不再返,所以我把买房子的金条,完全移用来买画。”

张大千用了七百两黄金,购得《韩熙载夜宴图》及宋人《溪山无尽图》等一批国宝后,其喜悦之情难以笔述。他曾专门刻了一方印章:“东西南北只有相随无别离”,钐盖在《夜宴图》上,真是视如生命,珍同拱璧。南京政府的外交部长王世杰听说此事后,趁某次张大千在南京时,亲自前来拜会,示意要看看此图,但张大千却推说将图留在成都了,没有给王看,弄得王悻悻而去。但张大千对于同行、朋友乃至爱好书画的青年们,却没有任何“保密”。

张大千得到《夜宴图》后,那份狂喜,那种兴奋,真是使他魂魄难安。他曾作《秋芙蓉》画一幅,并题诗一首,以庆贺得此稀世瑰宝。诗曰:“江上秋风花及时,浥霜浥露见清姿;东墙桃李无言语,却悔先荣不逮迟!”

不久后,有一古玩商在东北的地摊上,发现了原来包裹《夜宴图》的锦缎外皮。它约二尺见方,系夹层,一面是大红软缎,另一面是鹅黄缎子,上面写着《夜宴图》的整个画名,并盖了一颗通红的“御印”,大有三寸,十分醒目。该商人特地将之买下,拿来转卖给了张大千,价格是五两金子。这一下珠、椽俱全,张大千为之欢喜不尽,对这件现已内、外完整的国宝,从此是更加心满意足和愈发珍爱了!

几乎就在购得《夜宴图》的同时,张大千又发现了另一件国宝,后为证明是五代南唐大画家董源画的《江堤晚景图》。说起收购此画的过程,其传奇色彩还要浓。

此画不属“东北货”,张大千早在抗战爆发前就曾见到过。战前他住在北平时,常常约上几个朋友一起去逛琉璃厂,看看古画,赏赏古玩,然后便一道下馆子,生活得真是优哉游哉。

一日下午,张大千和几位朋友一道,又来到了琉璃厂,进了一间叫“国华堂”的古玩店。此店老板姓萧,主要经营古旧字画。在朋友们的怂恿下,萧老板拿出了他最心爱的一幅古画,是一幅没有题款的巨型工笔青绿山水。该画高有2米,宽约1.2米,上有青山叠嶂,下有松柏翠木,中有骑马行人,小桥茅舍,流水潺潺,亭台楼阁,江波粼粼。不仅画得十分细腻,而且气韵高贵华古,神势开阔磅礴。张大千一见之下,大为倾倒,心仪无比,爱之不能释手,立即要求萧老板“割爱”。但不论张大千如何恳求乃至哀求,萧老板就像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了,说什么也不肯转让此画。他说,此画是他们萧家的祖传之宝,他对这是爱之不尽,并准备在死后带进棺材内陪



《韩熙载夜宴图》局部

葬的，如何能够卖给别人？

张大千一听，此等奇珍竟要被拿来“陪葬”，不禁大惊失色。但他好话说尽，许诺出再高的价钱皆可，但萧老板仍是一口拒绝，坚决不允。张大千知道，从古时开始，中国的上上下下都有一个“传统风俗”，人死后要拿自己生前最喜爱的东西来殉葬，以便在“阴间”时仍能享用和日日厮守，此习俗已经流传了几千年，非是一时能予改变。张大千无法，只得摇头叹息着，怅怅而去。

不久，抗战爆发。紧接着便是张大千避乱还蜀，然后远赴敦煌等等。但不论他走到何地，一想起此画，就立刻魂魂难安。

这次胜利后一回到北平，张大千就马上打听萧老板的下落。然而8年过去，人事皆非，听说萧老板已经亡故，但那幅画却不知怎的没有用来陪葬，现在已落入了一个韩军长的手里。

这位韩军长，已退职，甚喜收藏字画。好在他带兵多年，财大气粗，已收藏了不少的宝贝，据说他还打算盖一个博物馆，来专门展览自己的毕生收藏，以作晚年之娱。看来，要从韩军长处“虎口夺食”，真是谈何容易！可是，张大千画迷心窍，执迷不悟，他仍是知难而进，硬着头皮，去找到了这位“儒将”。

韩军长听张大千脸红筋胀、结结巴巴地说明了来意。他也深知收藏家们的“通病”：只要一见了自己喜欢的收藏物，就会立即两眼冒火，喉咙伸手，恨不得马上据为己有，那怕为之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因而，他倒还能理解张大千的苦心，没有责怪，更没有一口回绝。他本着“儒将”的风度和武夫的直爽，微微一笑说，只要答应他的两项条件，此画即可归张大千。其一是：五百两黄金；其二是：20幅明画。二者缺一不可，“否则免谈！”

韩军长提出的这高于当时市场行情很多的价码，也许是为了让张大千觉得“划不来”，而自动放弃；也许是用如此巨大的金额，来迫使张大千自己知难而退，也许是乘机从中“敲一笔”。但不管是出于哪种原因吧，出乎韩军长的意料之外，张大千竟毫不犹豫地满口答应了。

钱，倒不成问题。尽管张大千因为才买了《夜宴图》等古画，手头已所剩无几，但是他采用了老法——借。他给自己在苏州的一个富有的学生曹大铁打电报，叫速汇一千万法币（约合黄金一百一十两）到颐和园来。这样子四下一凑，五百两黄金倒是给凑齐了。

令张大千搔头的，却是20幅明画不好找。哪里能一下子搜齐这么多呢？张大千又赶快告诉成都家人，把自己收藏的明画寄来，加上从兄长处搜罗来的，数量还是不够。于是，张大千干脆带着大把金条，拉着韩军长去琉璃厂“搜”，凡是韩看中的画幅就买下来。这样子七拼八凑，画幅总算凑足。

当张大千好不容易才从韩军长手里接过那幅他想

念了八九年之久才得到的《江堤晚景图》时，他的激动，他的感慨，可想而知。张大千双手捧接着这画，全身都在微微颤抖。之后，他真是如逢故人，与此画每日相对。但他看着看着，对于此画的真正作者是谁，却发生了疑虑。

原来，中国古画，在唐、宋以前都皆不作兴落款，更罕留创作年月，这给后人准确判断画幅的作者及创作时间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有时甚至是难以逾越的难关。故而使得中国古书画的鉴定，成了一门极专业、极深奥的学问。一般说来，后人只能通过有关的史籍记载，作品的纸张、色泽、笔墨、设色与构图的风格、特色，再结合各个时代、各个作者的艺术特征和习惯、特点等等，来辨别一幅作品的真伪，推断其制作年代及真正的作者可能是谁，从而进一步判定其艺术价值、历史价值、文物价值乃至市场（经济）价值。由于主要是靠由经验的积累和知识的丰富锻炼而成“目鉴”来定，就要求鉴定人见得多了、识得广、知得深，并且要“心正、度宏、气平”（张大千语），这样才能炼就如金睛火眼一般，一看一个准，或者是八九不离十。自然，要达到这种高段位的“精鉴”水平，很不容易；而要做到精确无误，那就更难。因而直至目前，还没有一个鉴定家敢于夸下这样的海口：他所鉴定的作品，保证是绝对的正确，从来没有过一次闪失！被中国书画鉴定界公认的近现代“最高鉴定权威”，并自称是“五百年来精鉴第一人”的张大千，在这幅《江堤晚景图》上，就发生了失误。

据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江兆申说，张大千曾向他细述了将此画作者最后定为五代南唐大画家董源曲折经过。

此画在开初见到及刚刚买入的时候，张大千一直以为其作者是元代书画家赵雍（赵孟頫之子）。赵师法董源，且这是一幅大青绿山水，而赵雍最擅长于此，故而这样定之。

但此画经高手洗涤、重裱过后，画中一树干上，露出了五代南唐画家、比董源略晚的赵干的名款。可是字迹恶劣，似为后人所加。然赵干也长于画山水林木，多作江南景色，表现出一派“烟波浩渺，风光明媚”的山光水貌，与此图也甚是相符。仅据此，此画的创作时间，一下子就“提早”了300多年！

不过，张大千对此还是有疑惑。因赵干在后主李煜朝时还只是画院的学生，而此画的气魄之大，金碧辉煌，景物富丽，皆属一个画院的学生所难为。那么，此图会不会是他的“老师”，即在中主李景朝时就已任北苑副使的董源所作的呢？但是，此结论还缺乏佐证。

正在这时，张大千的学生兼女婿萧建初，兴奋地跑来告诉他，说是在故宫看到了赵孟頫写给其好友鲜于枢的一封信，信中有这样的一段文字，萧特地将之抄录了下来：“都下绝不见古器物，书画却时得见之，多绝

品,至有不可名状者。近见双幅董源,著色大青大绿,真神品也!若以人拟之,是一个无拘管放浪底李思训也!上际山,下际幅,皆细描浪纹;文作小江船,何可当也!”

张大千一见,元代赵孟頫在信中描绘的,与这张《江堤晚景图》的实际内容完全相同。至此,张大千才放心地肯定下来,自己所得到的这张巨画的真正作者正是董源。他花了五百两黄金和20幅明画换来的,却是又一个国宝!

这个出乎意料的发现,使张大千兴奋激动得不可名状。他当即在此幅图上题字曰:“八年前,予客故都时,曾见此董源双幅画。自南北沦陷,予间关还蜀,数年来,每与人道此,咨嗟叹赏,不能自己!去秋东虜瓦解,我受降于南京,其冬予得重履故都,亟亟谋睹此图,经二阅月,始获藏予大风堂中,劳神结想,慰此遐年,谢太傅折屐,良喻其怀!米元章尝论,董源画天真烂漫,平淡多奇,唐无此品,在毕宏上。今世俗论南宗,荆、关不可复见,遑论辋川,惟此董源,为稀世宝!予尚有淡设色湖山欲雨图,亦双幅,与此可谓延津之合,并大风堂琼璧也……”

在这幅稀世珍宝的周围,张大千也盖满了他最为珍爱的收藏章,如“东西南北只有相随无别离”,“球图宝,骨肉情”,“大千之宝”,“至宝至宝”等等。张大千的得意之情,溢于言表。果然,从此之后,这幅图就一直伴随着他,从未分离。一直到张大千逝世之后,其家人才按照他的遗嘱,将这幅国宝无偿捐赠给了台北故宫博物院。

就在张大千收藏了这幅名作不久,1946年冬,他在上海花了数百两黄金,又收购了董源的另一幅传世之作《潇湘图》。张大千曾在他的一幅仿董源图(1947年)上题曰:“书画舫云:董玄宰太史酷好北苑画迹,前后收得四本,内惟潇湘图卷为最,至以‘四源’名其堂云。按米氏

画史曰:董源平淡天成,唐无此法,在毕宏之上,近世神品,格高无与比也!(此图)峰峦出没,云雾显晦,不妆巧趣,皆得天真,岚色郁苍,枝干劲挺,咸有生意,溪桥渔浦,洲渚掩映,一片江南也!去年冬重游海上,二三知己,不时以书画相鉴赏,遂收得北苑潇湘图卷,因乞永嘉方介堪为治‘潇湘画楼’印,以庆斯图之来归!予先收得江堤晚景、风雨出蛰二图,并此为三源也。它日珍品更有所获,当不令董老专美于前矣!”

张大千对于他的这些宝贵收藏,虽然“视如性命”,但对友人和学生们,并不吝惜展示。大风堂的不乏门人,都曾临摹过《江堤晚景图》等。他还曾将这些真迹,借给朋友拿回家中悬挂欣赏。如1946年冬,上海画家吴湖帆就曾跋云:“大千八兄自蜀来,携北苑《风雨起蛰图》及此《江堤晚景图》二巨幅见示,悬梅景书屋(吴湖帆之画室名)中若干日,坐卧其下,欣快万状!知北苑之气象浩瀚,会松雪之风神绝世,自有渊源也。兄之压箱之富,真令人艳羡不置……”

由此可以看出,张大千不惜一切,花巨价收购古代名作,正所谓“见名画必得之为后快,囊中金不足,则贷诸友朋,往往手挥巨金,而甑无米,榻无毡,家人交怨不之顾也”,其目的并不是像某些“收藏死,死收藏”的收藏家那样,藏品一入其门,就秘不示人,并从此再永无见天之日。张大千却是为了保护名作,研究名作,学习名作,并尽可能充分发挥出名作应有的作用,为尽量多的人所运用,以达到“宝剑授予烈士,红粉赠与佳人”之意。张大千曾说:“文章书画,自当寿同金石,不宜秘诸笥箱。自寿寿人,公诸天下,即此可见仁人治世之用心也!”张大千的这种收藏态度,无疑是正确的。可谓是“玩物”而不丧志,不负古人的一片拳拳苦心矣!

○ 广 告 ○

治疗外阴白斑

解除难言之隐

外阴白斑系外阴营养障碍症,主要症状为外阴搔痒,粘膜、皮肤变白,萎缩或角化增生,久之阴道萎缩造成生育困难并影响正常性生活,外阴癌50%来源于外阴白斑,已往多采用冷冻、激光或手术切除等措施,但这是以破坏女阴肌肉组织为代价的权宜之计,痛苦大且复发率高。

外阴白斑专科主任高堂创建以中药为主的无损伤疗法治疗男女外阴白斑及各种外阴搔痒症,无痛苦,无损伤,方法简便,可带回家自治,此疗法1994年通过郑州市级科研成果鉴定,1995年又获科学技术进步奖。

地址:郑州市伏牛南路60号郑州市中医院汝河分院

电话:(0371)8982686—3216

乘车路线:从火车站乘102、103路电车到汝路站向西20米即到。(豫中医广证字[95]第198号)

北京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大三条5号
乘105、107、111路电车,22路汽车新街口站下车即到

电话:(010)62252417

邮编:100035

回忆在 中南海的 采访生活

● 徐 熊

难忘的中南海

从1954年初至1957年10月，我作为新华社政治时事记者，负责中南海的采访。1957年10月间，我被调去学英文，准备派去国外采访，袁木（后被调至国务院任政策研究室主任）就接替了我在中南海采访的任务。

在50年代，到中南海采访是很严格的。事先要由新华社向有关部门写申请报告，经过政审，得到批准后才能进行。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年代，尽管时光已逝去近40年，我的满头黑发已染上浓霜，但我对当年采访时的一情一景，对毛泽东主席的音容笑貌和伟岸的身影，至今回忆起来，一股深刻的怀念之情，还会在我心中荡漾起涟涟波漪。

中南海，是金代的离宫，明代的皇宫，明清两代的行宫和御苑。中海开辟于金代，南海开凿于明初，合称中南海。明、清时期它与北海统称为“三海”，又名“太液”。因它位于故宫西侧，故又称“西苑”。面积约1500亩，其中水面达700亩。

解放以后，中南海是党中央和国务院所在地。那时中南海分为甲、乙、丙三区。甲区是毛泽东居住和工作区，包括丰泽园和后来拆掉的勤政殿；乙区是怀仁堂所在地，刘少奇、朱德都住在这一区；丙区是西花厅、紫光阁一带，是国务院会议室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所在地（当时还未建人民大会堂），周恩来的住所也在这里。

古朴而幽静的丰泽园，坐落在南海西北方向，这里是清王朝行耕礼之处。建国后，是毛主席住处的总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常在这里会见党内外知名人士和重要外

宾。园内主体建筑是颐年堂，颐年堂东边有一个小门，可通毛主席住所菊香书屋。颐年堂的西厢房有毛主席的乒乓球室和书库，书库里收藏的图书是毛主席收藏的20余万册图书中的精华，也是他最喜爱和平时常用的书。

在甲区的南海中还有一座美丽的小岛——瀛台。它建于明代，称为南台，清朝多次重修，又改名为瀛台。“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曾将光绪皇帝软禁在这里。勤政殿在瀛台汉白玉桥的北侧，坐北朝南，濒临中海，原是中南海里的正殿。1949年初，中国共产党同南京国民党政府派来的以张治中为首的和谈代表团，就是在勤政殿举行谈判的。

乙区怀仁堂，是建在被八国联军烧掉的仪鸾殿废址上的一座名为佛照楼的建筑，民国后改名为怀仁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务院会议，都是在这里召开的。怀仁堂西侧的南北夹道一侧，坐落着A、B、C、D四个院落，分别住着李富春、谭震林、邓小平、陈毅和他们的家属。在东西巷甬道的另一边，则是刘少奇一家住的庭院。朱德的住宅是西式的，也坐落在乙区。

在南海西门附近的西楼会议厅和丰泽园北面的居仁堂，都位于乙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成立后，中央书记处的办公地点就设在居仁堂。居仁堂是一座小巧玲珑的宫殿，坐落在中海和南海的交界处。

丙区的紫光阁，是中海西岸最重要的建筑。它是上下两层的楼阁，都是木结构，但周围窗下的坎墙均用磨砖对缝，屋顶是宫殿建筑中等级最高的庑殿顶，全部用的是绿琉璃黄筒边瓦，整座建筑矗立在400多平方米的平台之上，室内间以金壁辉煌的彩画，显得十分富丽堂皇。

在紫光阁以西不远处，有一座建筑叫西花厅，周恩来总理的办公室和住所，就在这里。

丙区是三区中国务活动最频繁的地区。我们采访最多的毛泽东主席和中央领导人接见外宾的活动,大部分都在这里。当时负责“海内”警卫的是公安部九局,局长是汪东兴。负责毛主席在“海外”(特指中南海之外的北京市区)活动警卫任务的是公安部六局,局长是岳欣。我们同这两个局的有关人员都非常熟悉,他们对我们的采访活动都给予了极大的帮助。中南海九局办理与我们采访有关的联系都极为认真负责,他们不管毛主席的外事活动要不要报道,一般都会通知我们。有时毛主席的一些活动也在“海外”举行,如参加在北京饭店举行的“国宴”等等,那就要由主管单位通知我们了。但是,毛主席在其他地方(如剧院、电影院等)活动时,六局仍然主动通知我们。

采访毛主席的国事活动,我们都是要在现场写好稿件,找有关领导审好稿后,用电话向编辑部传稿。为了不暴露毛主席的行踪,稿件中通常都不带主语,而是与发稿人达成默契,由他们发稿时填上。活动重要而内容比较复杂一些的稿件写成后,都是让司机送回。不过,在报道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国家领导人的活动时,就不必如此保密了。

两次讲话语出惊人

1956年12月25日,我忽然接到中南海打来的电话,要我尽快赶去。我心中明白,必有重要的事情。我在不足十分钟的时间内就乘车赶到了中南海。

到后我才得知即将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主席要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会议开始了,毛主席站在台上,手执一纸,无疑是讲话提纲,侃侃而谈。毛主席讲话声音洪亮,谈笑风生,会场上时时发出笑声,但是气氛

是严肃的,人们被讲话内容深深地吸引住了,大家都在屏息谛听。

毛主席讲的题目叫《论十大关系》。他以苏联的经验为戒鉴,总结了我国的经验,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基本思想,就是在这次讲话中提出的。在这次会上,毛主席强调了农轻重的关系;重申在机关、学校、部队里清查反革命,要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提出对斯大林错误的分析“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还谈到在外国人面前,不要像《法门寺》里的贾桂那样一副奴才相。

他的讲话语出惊人,说到了与会者的心中,赢得了与会者长时间的热烈的鼓掌。

又有一次我得到通知,让我们立即去中南海怀仁堂采访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这是1957年2月7日,是我终生难忘的

一次“时代扛鼎”的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这个讲话不仅极大地鼓舞了与会者,而且震动了世界。因为这个讲话首先明确地提出“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而且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他的讲话极为生动,极为风趣,浮想联翩,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毛主席对许多问题的观察和透视,可谓近鉴毫端,远察天际。他振聋发聩地既批判了斯大林搞“个人崇拜”的错误,又批评了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错误,讽刺了匈牙利事件中拉科西的一些愚蠢做法。他还谈到了节制生育的必要性,谈到了要发展和巩固农业合作化,谈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讲话既有高度的哲理,又有丰富的实际。

跟上次他讲《论十大关系》时肃



中南海瀛台

静倾听气氛不同,会场的人们时而哄堂大笑,气氛非常轻松、活跃。散会后人们议论纷纷,有的说,这是一次伟大的马列主义理论论述;有的说,这是国际共运中一大创建;有的说,讲话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范;还有人说,毛主席的思想总是要开拓新的道路,哪怕前面没有脚印。

我当时只顾用铅笔以自己才看得懂的“速记法”疾书快记,并未考虑是准备将来报道用,还是自己留作学习用。因为,他的一些“名句”都是随口讲出来的,如果要写报道,追记就来不及了。

果然,会后不久,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和朱穆之就通知我把所作记录整理出来,提供给中共中央办公厅统一整理,以备发表。由于我当时记录得非常详细,连毛主席讲话时那种感染力极强、感人至深的激情和气氛,我都记忆极深刻,因此不费力就完成了任务。

然而,后来发表的毛泽东讲话,虽然据说也吸收了我们送去的整理稿的部分内容,但内容又压缩和增补了不少,这是为适应而后开展起来的政治运动而改动的。

住中南海的国宾

第一位住到中南海里的外国国家元首,是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他于1956年9月30日至10月14日访华。本来,我国已为他安排好下榻舒适的国宾馆,但是他对周恩来总理提出他要住到中南海。周总理提醒他,中南海环境虽然优美,但是设备和其他条件却并不好,远赶不上国宾馆。苏加诺却说,他并不需要生活上享受,只想跟毛泽东主席住在一起。

多少年来,中南海以绚丽的自

然景色、悠久的历史胜迹,尤其是它成为新中国最高决策人物的居住地和国务活动的重要场所,而为世人瞩目。可是,对大多数来访的外宾来说,中南海是神秘的,令人仰慕、神往的。所以苏加诺坦率地提出来想住进中南海,可见他的殷切的希望。

周总理同毛主席商量后,欣然接受了他的要求,苏加诺自是喜出望外,觉得他同毛泽东住在一起是很荣幸的。

一次,他同毛主席交谈时,我在一旁听到了他们的对话。毛主席说:“阁下来这里可要受苦了,这里谈不上有什么现代化设施,生活起来很不方便。”苏加诺笑着回答:“您能忍受的,我也能忍受,我愿跟您同甘苦。”

当时,苏加诺下榻勤政殿。不过,他既然开了外国元首住进中南海的先例,便有了后继者。那就是伏罗希洛夫。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于1957年4月15日至5月6日和5月24日至26日两次访华。他也住进了中南海,毛泽东在宴请伏罗希洛夫时曾亲昵地称他“伏老”。机警的伏罗希洛夫当即问他:“在中国话中,‘伏老’是什么意思?”“这是一种尊称。中国人习惯在尊称年事已高的长者时,在对方姓氏后面,加上‘老’字。”毛泽东笑着回答他:“这样,阁下的大名伏罗希洛夫的第一个字‘伏’也就成了姓了。”

伏罗希洛夫高兴地说:“我很荣幸能听到您叫我‘伏老’,尽管我并不认为自己已经老了呢。”

毛泽东不禁哈哈大笑,“啊!伏老不服老!”后来郭沫若在赋诗记述此事时,就把毛主席这句话写到了诗里。

伏老是一位很诙谐的人。有一次他在瀛台漫步,听别人说过去光绪曾被软禁于此,他叹息说:“可惜

我那时未来此,要不然就解放了他。”还有一次,他在杭州访问时欲同一个小女孩握手,那小女孩未伸出手来,羞答答地说:“我手脏。”他笑了:“手脏没关系,你的心干净呀!”

第三位住到中南海的是越南主席胡志明,他住的时间还比较长。毛主席接见外国贵宾,通常是在颐年堂或勤政殿进行。但是,这次他竟在他的书房——菊香书舍会见胡志明主席。他们亲如家人,不拘礼节,毛泽东穿着拖鞋,胡志明穿着汗衫,就这样亲密地谈着话。

从勤政殿的一个小旁门进去,便是菊香书舍。这是一个不大的四合院。院子的北房明三暗五,四梁八柱,毛主席的卧室和书房便在这个房子东间。他还有处大书房在东厢房。在胡主席来之前,毛主席对我和摄影记者说:“今天的活动不报道。”这样,我就有机会浏览了毛主席的卧室。主席的卧室陈设素雅简朴,除几个沙发和桌椅外,全是装着各种书籍的书柜,就连他睡觉的木板床旁边的桌子上也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有古籍的也有新出版的。在他的卧室内铺着一色的红地毯。据说,毛主席生来喜爱红颜色,认为红颜色光波长,显得鲜艳、夺目、温暖,而且象征坚强、刚毅、胜利和希望。

这一天,毛主席同胡志明促膝谈心,谈了两三个钟头。

当时,中南海的人们都把这些国宾称为“毛主席的客人”,接待得挺隆重、热情。中南海那时有个接待单位,设在景色清幽的静谷。静谷是一个独立完整的院落,素有“园中之园”的美誉。静谷虽然与丰泽园只有一墙之隔,毛泽东却极少涉足,而住过中南海的几位贵宾倒时而来散步。

(作者是新华社高级记者)

(责任编辑 方 徨)

著名舞蹈家

赵青广东寻根记

● 李健民

那还是1984年的3月，赵青随团在广州演出时，曾写信给上海她的生母叶露茜，露茜回信告诉她，外祖母的老家在广东中山县翠微乡，外祖母的父亲是个乡间医生，一生热心为穷人看病，深受尊敬。露茜希望赵青能去寻一寻，看一看，也许还有亲人在。

“望尽无涯路”

正在广州开会的中山市委的同志，得知赵青要到中山寻亲的消息，立即将此事通知市里，市政府立即派侨委和文化局的领导同志去深圳，接正在那里演出的赵青等。3月21日，赵青和全团伙伴兴致勃勃地来到中山市。大家都为在赵青家乡演出而高兴。他们参观了翠亨村的孙中山故居、中山纪念堂、中山温泉等风景名胜之地。赵青感到十分亲切、温暖。她和舞剧团一起为中山市人民表演了两场精彩的节目。市里主管文化的一个同志在一次欢迎会上风趣地说：“虽然周总理说你不要骄傲，但我们中山的人民还是要自豪地说，你是我们中山人民的骄傲！”原来，1963年，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的礼堂，看过赵青表演的《长绸舞》后，曾对她语重心长地说：“赵青，你表演得很成功，可是你千万不要骄傲呀！”从此，赵青时刻铭记总理的教诲，总是兢兢业业，不断探索和进取。

“柳暗花明又一村”

赵青在中山市陶醉在欢乐之中，邻近的珠海特区文化局的同志，也派车来接她，见面就说：“赵青啊，赵青！你是珠海的女儿，我们代表家乡父老来接你来了！赵青一阵惊诧，似有不解。来人向她解释：原来赵青外祖母的家乡翠微乡，以前属于中山县（现以改市）。1961年成立珠海县，翠微乡划属珠海县，1979年，珠海撤县改市，当然就属于珠海市了。赵青听了豁然冰释，顿时高兴得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赵青与舞伴姬麒麟两人一到珠海市，

消息便不胫而走：“赵青寻根来了！”“赵青探亲来了！”早在50年代，人们便熟悉了以演中国神话舞剧《宝莲灯》而出名的赵青。可是，人们今天才知道，翠微乡竟是这位著名舞蹈家的最可爱的故乡！27日、28日两个晚上，她在珠海市剧院专门义务为家乡人表演了《海之诗》、《节目》和精纯的《长绸舞》。如潮的观众津津有味地观赏了她的演出。她在自己1981年根据世界名曲《海之诗》选段编导的舞蹈《海之诗》中，扮演的是一个海边少女的角色。她在大海边轻盈欢快地逐浪进退，是那样的活泼，是那样的纯洁和天真，使人们自然的联想到剧场外远处那明净的海滩，那波涌的浪花，似乎连潮汐的呼吸声都听到了。赵青把那少女对大海的痴迷、惊异和喜悦的神态，表演得丝丝入扣，维妙维肖。这不正表现了一个从未回过自己故乡的女儿对故乡的一片赤子之情吗？赵青在献辞中充满激情地说：“我的家乡是特区了，特区的建设和生活是美好的。特区青年的胸怀象海洋一样宽阔，我就将这《海之诗》献给故乡的青年！”演出—结束，两位专程来自翠微乡的美丽的少女立即跑上台区将两束含露的鲜花献给她和姬麒麟。那鲜花上晶莹的露珠与赵青眼中满含的泪花在强烈的灯光下，在热烈的掌声中交相辉映。在赵青艺术生涯中，她接受过无数的鲜花。在北京，在香港，在国外的诸多名城，她不知接受过多少鲜花。然而，这是她平生第一次接受乡亲们敬献给她的鲜花。乡情啊！就象鲜花一样艳丽、芳香、圣洁。故乡啊！对游子，你永远象鲜花一样诱人心醉！

“帝子乘风下翠微”

3月27日，赵青起得特别早，她的心无法平静。今天，她就要到翠微乡了！赵青多年来和妈妈黄宗英、生母叶露茜都相处得很好。但自从挚爱她的父亲赵丹去世后，她一直有一种悲切的和莫名其妙的孤独感。它多么想从故乡获得一份温暖和慰藉呀！她就要如愿以偿了。她记得一位著名的诗人说过：“如果我没有回过自己的

故乡,即使我走遍了全世界,也是终生的遗憾!”故乡的甜情蜜意在吸引着她。晴朗的天气,春风拂煦,正是“青春作伴好还乡”啊!汽车离开香洲向翠微方向飞驰,一路上丛丛青竹,片片绿树,畦畦秧苗都像争相要扑过来和她拥抱似的……他们先来到前山区政府,区里、乡里的干部和赵青的表外族姨母韦兆英、表外族舅公韦成都前来迎接她。赵青对68岁的韦兆英、63岁的韦成仔仔细地端详,她要从他们的面庞上找出与外族母相像之处。“是像!是像!”赵青高兴得跳起来!遂亲切地称呼他们,亲切地和他俩握手、拥抱!两位老人也高兴得含泪微笑。人们纷纷拿出家里的花生、瓜子、柑子招待赵青,边饮茶边叙旧。

原来,赵青1936年底出生后才11个月,爸爸赵丹和妈妈叶露茜就告别了上海前往重庆。后来,赵丹等人去新疆。又后来,赵丹与王为一、徐涛、朱公明等一起被军阀盛世才逮捕关押达5年之久,重庆盛传赵丹已死,母亲叶露茜痛不欲生,伤心欲绝,整日在悲戚中度日。好友们为使她的心情尽快平复,就作合她嫁给了著名作家杜宣。赵青就一直由上海的外祖母韦慧钿抚育。外祖父去世得早(1933年),露茜是长女,又不在家。赵青就与仅比她大五岁的舅舅叶小珠(1984年尚在广州话剧团任导演)一起生活在外祖母的怀抱里。

赵青早慧,四五岁就拍电影了。她曾为当时明星李伯华、陈燕燕、王熙春扮演过女儿。一直的她13岁去北京上戏剧学院才离开上海和外祖母。在上海,外祖母教她说广州话,做广州菜,讲家乡的故事给她听。外祖父名叫叶舒藩,是广东南雄县人。外祖母和外祖父年轻时就离开家乡来到上海……这一切都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1974年,慈祥的外祖父不幸去世,悲悼之余,赵青曾一度有过寻亲的念头,但因为忙于演出,不得机会,未能成行。

翠微乡的乡长卢超远、书记黄三赐陪同赵青到翠微乡的村前村后走了一遭。赵青看到一座座新盖的房舍明亮宽敞,有的高达三四层,墙面还贴了瓷片,分外欣赏。乡长说,翠微乡以前政治运动一次又一次,工作队来了一批又一批,但一直是穷,社员盖不起一座楼房。三中全会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这里靠近澳门,很快富起来。乡里外贸收入占全区第一。主要是向澳门卖蔬菜。过去不是不卖,但量很小,受歧视,要“割资本主义尾巴”。现在不同从前了,生活好多了。赵青听得興味盎然,频频点头。乡长见有的乡亲来看望赵青,而还有许多人不知道她已经到来了,便提议通知大家都来见见她。赵青婉言谢绝了。她是从内心里舍不得打扰乡亲们,舍不得给他们添麻烦啊!赵青感激地说:“下次来,我一定为大家表演舞蹈。”“现在家家都有电视了,你就是在外边跳舞表演,乡亲们也可以看到呢!”乡长快乐地说。赵青心里说

不出有多高兴。中午,乡亲们请她吃家乡饭,大家围着木炭火锅,吃起家乡的生鱼片、鲜虾片、海蟹,配有生菜、西洋菜。乡亲们叫她多吃点,说那鱼是咸水与淡水交界处生长的,味道特别鲜美。赵青也一再称赞翠微的西洋菜味道醇,说她从没有吃过这样好的菜,又滑嫩又清爽,吃起来没渣儿。赵青又参观了翠微乡与外商合办的毛纺厂、毛织厂、羽毛工艺厂等。临别,乡亲们又将一束五彩缤纷缤纷的羽毛送给她,又取一片彩羽帮她一道别在胸前。赵青高兴得心花怒放,在珠海数日都舍不得取下。

“青山着意化为桥”

离开翠微,30日赵青、姬麒麟还游览了石景山旅游中心及珠海宾馆。说来也真是巧合,石景山旅游中心有个不大的湖,叫《思凡湖》,湖中山石上雕塑了七个洁白的仙女。她们动作不同,神情各异。有浣纱、有梳妆、有沉思、有凝望……优美动人,栩栩如生。蓝天、白云、青山、翠竹、碧水、倒影,面对这令人遐思的神话世界,赵青这个素以表演中国神话剧出名的演员,真是陶醉了!她情不自禁地模仿起七仙女的动作舞蹈起来,我们也沉醉在其中,连连拍了一张张照片。我们漫步新建的珠海宾馆长廊,那儿正好有广州美术家们创作的大写意壁画《宝莲灯》,这画更是引动了赵青的无限情思,她的成名作恰好就是《宝莲灯》!真可谓天作地设,凑巧极了!难道画家早知道赵青要来这儿,又特意欢迎她的到来而创作的吗?赵青、姬麒麟在巨幅壁画前流连忘返。

“吹尽狂沙始到金”

应当感谢有远见的吴伟。是他在担任翠微大队治保主任时,从“文革”的浩劫中保存下来了全村唯一的一套《中山翠微韦氏族谱》,使赵青此次寻根得以披阅到有关外祖母家世的记述,当我3月29日去翠微乡访问时,现任乡治保主任的李财取来珍藏的十几本的族谱。七八个人分头为我查找,终于在卷之九第517页至518页中查到赵青外祖母祖上的记录:“猷告,名兆栋,号樵菴,勋臣公四子,优廪生……废科举后,专研医术行世。生清同治己巳年三月初四日。娶前山刘氏世吉公七女……”刘氏生四子五女。“长适(嫁)番禺黄天侣翁十二子绍声,次适南雄浙江即用知府叶树榕翁长子国屏……”这里的“次”即赵青的外祖母韦慧钿。“国屏”,即赵青的外祖母叶舒藩的字。“猷告”即赵青外祖母的父亲;“勋臣”,自然是外祖母的爷爷了。

当赵青看到族谱上的记述时,惊喜得说不出话来!是激动,是感动,抑或兼而有之?但总而言之,赵青不虚此行,赵青终于寻到了根。

访炎帝扮演者 孙玉书

● 苏咏鸿

当飞驰的列车穿越广西的崇山峻岭时，往事像远山的雾霭在孙玉书眼前缭绕漂浮。47年前，不到20岁的孙玉书随军一路追杀白崇禧残部，在云桂大地上写下了“宜将胜勇追穷寇”的雄壮诗篇……47年后的今天，他没想到因为拍电视剧《炎黄二帝》又回到这片战斗过的土地上。

几年前，孙玉书正埋头于几部都市题材电视剧、电影角色的酝酿创作，突然接到《炎黄二帝》制片主任李永贵的电话，说河南电视台导演司玉生想拜见他。见面才知道司玉生要请他在20集电视剧《炎黄二帝》里饰演炎帝。孙玉书陷入了两难境地，因为一部正在投拍的电影电邀三次，让他出演重要角色，他都婉言谢绝了。然而，一场开诚布公的会谈之后，他却被炎帝这个角色迷住了。司玉生独特的导演风格，剧本透出的厚重大气，以及重塑祖先形象的历史重任，激起了他极大的创作热情，他宽厚的手与司玉生紧紧握在一起……

多少年来，孙玉书日夜沉浸在角色的孕育之中。四十多年前，一个才十几岁的小兵，扛着几十斤重的行李翻越千山万水。一路上，扭秧歌、演活报剧、写标语，鼓舞战友们的杀敌士气。今天，一个年逾花甲的老兵，他似乎又接到了一个艰巨的“政治任务”，他深感“炎帝”角色的分量。的确，如果把华夏历史比作一条浩浩荡荡的长河，而炎黄就是这条长河的源头；如果中华民族是一棵茂盛的大树，那么炎黄就是大树的根。

炎黄以什么样的形象出现在荧屏上，直接牵动着海内外千千万万华夏子孙的心弦。

经过反复阅读剧本，耐心咀嚼剧情之后，作为艺术形象的炎帝在孙玉书脑子里渐渐清晰起来。炎帝作为我们先人“开天辟地”的伟大代表，他撩拨混沌苍天，励精图治，教人向善，鼓励创造发明；他倡导农耕，研究草药，救人于水火，使羸弱的人类逐步摆脱自然的束缚，艰难地步出茹毛饮血的蛮荒困境，为中华民族的日渐昌盛创下了千古基业。

要真实地刻画出炎帝的曲折复杂的人生轨迹，谈何容易？深圳的大女儿在电话里以关心的口吻劝诫父亲：“大热天，跑那么远演那么重的戏，你能行吗？”老伴蔡洪也流露出“要他慎重考虑”的眼神。然而孙玉书毫不动摇地说：“我不但要扮演炎帝，而且我还得捧着一颗赤心去塑造老祖宗。”

是的，在近五十年表演生涯里，那一个戏他老孙不是手捧丹心去演的？在《战线南移》、《槐树庄》、《霓虹灯下的哨兵》、《英雄万岁》、《不准出生的人》、《白求恩》等数十部话剧、电影、电视剧里，他所塑造的许多人物形象里，哪一个没有倾注他全部的情感？在话剧《不准出生的人》里，为了成功地塑造西藏农奴扎西的悲剧形象，大夏天，他头戴发套，身裹厚袍，脚蹬靴子，始终保持弯腰弓背的造型，每场戏都是汗泪交加。正因为如此，他才把扎西这个受苦受难的农奴演活了，使许多观众为之潜



然泪下。

为了成功地塑造炎帝的形象，得到海内外炎黄子孙认可，孙玉书真正是捧着一颗心在演戏。柳州的盛夏，天气变化无常，时而太阳火辣辣地蒸热，时而阴雨连绵透着袭人的湿气，再加上大森林里杂木丛生，蚊虫成群，给拍戏带来了不少的困难。然而65岁高龄的玉书，却与众多演员一样，身裹麻布片，头戴厚发套在近40℃高温下把每个造型表现得尽善尽美。在祭祀仪礼等众多大场面的拍摄中，因群众演员经验不足，致使反复拍摄，炎热的太阳把他烤得汗流浹背，他却昂首挺胸地站在祭台上，以饱满的精神鼓励群众排演。每次重排，他都那样执著、认真，声音高亢、浑厚、有力。因水土不服，他患上了疾病，为不影响拍摄进程，仍支撑着以最佳状态完成每一个镜头。炎帝的戏比较重、台词多，加之连续拍摄，导演体谅他年高，特意叮嘱场记给他提示台词，他却不愿给别人增加麻烦，一有空便抱着剧本一字一句地背。

“演别人的同时，你也在演着自己。”孙玉书如是说。是的，演戏与做人从来不得半点虚假，而孙玉书的人品、艺品，人们相信能把炎帝扮演好。

（责任编辑 洛松）

黄炎培的亲情诗

● 俞润生



黄炎培先生

难忘父母情

黄炎培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又是一位勤奋的诗人。他1878年10月1日出生在江苏省川沙县城关镇（今属上海市）。17岁时，他父亲病故，终年39岁，黄炎培曾写诗纪念。

比较而言，黄炎培怀念母亲的诗更多。他认为，“世界上有美人，最美的是母亲；世界上有坏人，最好的是母亲。”

他记得，大约他十岁左右，一天午饭，有一碟菜，他想吃。母亲说，留一下，某人要来吃饭。儿啊！待人好些，自己省俭些。黄炎培一直没有忘记这件事。1929年他52岁时，专门写了一篇题为《母训一则——待人好些，自己省俭些》的短文，教育自己的儿女。

还有一次，黄炎培的母亲生病了。病中，她训斥黄炎培：“奎（黄炎培的乳名），你看，谁在那里闲荡过日子？公公怎样？婆婆怎样？爹在外边怎样？农民一个个忙得怎样？只有你既不读书，又不做事，怎么对人得起？”黄炎培说：“这一场病中大训斥，使我直到老年，永远忘不掉。”

黄炎培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多次回忆母亲的教训。他写道：

儿懒惰，
母生气，
儿劳动，
母欢喜。

他还回忆母亲为他讲《珍珠塔》的故事，印象极深。讲述的是宰相之孙方卿，家道没落，向姑母借贷，受到奚落。表姐陈翠娥暗赠珍珠塔，又在归途中被强盗抢去，他冻卧雪地，走投无路。后来方卿发愤攻读，考中状元，乔装成道士，唱道情讽刺姑母；最后以“夫贵妻荣”的大团圆为结局。这个故事在江南一带流传很

普遍。1957年黄炎培在北京观看锡剧《珍珠塔》，联想到童年时代母亲的教诲，特地写了一首诗，诗的序文说：“母亲为讲官词《珍珠塔》，勉其戒于方卿之苦，努力上进，印象深刻，至老不忘。……”诗是这样的：

徐兴逢场听管弦，
珍珠塔影隐华筵。
人情冷暖儿时识，
母训回头七十年。

黄炎培不能忘记，他母亲临终前还给他一点点钱，1943年10月他回忆此事，饱含热泪写下了《六六生日祭母四首》，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母丧何萧条，
得金遣篋里。
哭罢皆错愕，
遗言在几耳：
“他日儿娶妇，
聘钱将以此。”
母自儿幼年，
远谋乃如是。

……

母亲临终之时，还记挂着儿子将来要讨媳妇。那时，黄炎培才14岁。

他母亲去世以后，他在外祖父家继续读书，一直到外祖父辞世，他才独立生活。

黄炎培永远不会忘记母亲的抚

育之情,1951年他74岁时还写下了催人泪下的长诗《梦里的母亲》。

缅怀先室王纠思

黄炎培14岁丧母,17岁丧父,家境贫寒,择偶的困难是可以想见的。他回忆说:“问题来了,我老辈只剩一位我父亲的母亲,她千方百计希望我成家,为我求婚:第一家回答是‘占卜不吉’;第二家干脆地答‘不允’;第三家确比我富,答‘我家的女儿不愿配穷小子’;第四家和我同样穷,答‘我家已够穷了,女儿还配穷小子么’;第五家干脆地说不同意。我尽管谅解他们,我是穷小子。只是我成家的希望看来很少的了。”

可是,事有凑巧,人逢机缘。1897年黄炎培20岁时,王筱云先生愿意将自己的女儿王纠思许配给他。这完全是一个偶然的会,王筱云在黄炎培的姑父沈肖韵家看到黄炎培的诗文,大加赞赏,说:“这一青年前途有希望!”沈肖韵乘此机会介绍了黄炎培情况。王筱云听罢,欣然作出嫁女的决定。

王纠思(1882—1940)比黄炎培小4岁,从小随父学习诗文,知书达理,善良贤淑,是一位标准式的东方少女。她当然听命于父亲对她的生活安排和婚姻选择。

1899年22岁的黄炎培与18岁的王纠思结婚,共同开始了新的生活,历经42个春秋。据黄炎培《先室王纠思夫人行略》说,王纠思到黄家以后,祖母在堂,有妹二,从兄弟多同居,“夫人周旋其间,无违忤,顾亦未见重于戚鄰(音dàng,乡党)间也。”她后来习师范,育蚕,课余则自哺儿乳,料理家事,极其俭省勤劳。她生子女各六,殇其三,存九。

黄炎培回忆说:“余生好游,中年后,夫人往往与偕。翻检《黄炎培诗集》中果然有许多他们夫妇共同旅游的诗篇:

1926年9月6日《偕内子纠思自包头绥远还京师,将重赴太原,纠思送我登车而自还南》:

千里阴山秋未雪,
九渠河水月如银。
驱车易尽天涯路,
握手难亲梦里身。
东去伯劳西燕子,
君还江海我风尘。
牵衣儿女怜无恙,
笑语声中少一人。

这首诗情绪欢快缠绵,足以表现他们夫妇间的琴瑟共鸣的幽雅情怀。

1928年8月23日《纠思同游渤海纵谈身世论次为诗》,很值得认真一读,这对于了解他们伉俪间的笃实情感很有好处。黄炎培回忆刚刚结婚时的情景,“忆君初入门,言讷不出口。二亲痛先背,羹汤献大母。夜夜话家常,朝朝执箕帚。育子已恩情,见客犹忸怩。……”他在诗中还谈到孩子、谈到生活,谈到“好游每携手,足迹遍林藪。浮海穷烟波,升岳小培楼。楼攀黄鹤巖,沙踏阴山右。即今渡辽来,所遇都非偶。”他们坚信“固知生有涯,何用名不朽。清白遗子孙,此福君知否?”

1932年9月15日《中秋携家人泛西湖》。

1934年7月5日《携家人玄武泛月》。

1938年7月4日《自己亥结婚于今四十年矣,为长句写之箴,寄赠纠思上海》。这是一首具有中国传统的结婚40周年纪念诗。“赴音国破家亡里,情绪先忧后乐中。一自死声沈战鼓,剩将生趣托邮筒。我行却曲神犹王,君病全廖体转充。待尽天年捐一切,濒危国族矢孤忠。但看斋榜非非有,早悟尘缘在在空。聊发长吟聆远道,倘因便面接芳容。”诗中所言“非非有斋”,是黄炎培上海寓所书房斋名。黄炎培人在汉口,一直惦记滞留在上海的王纠思的身体。此中情意,浸透于字里行间。

1938年9月19日《内子久病获愈,相见香港,题合影》,这是王纠思生前和黄炎培最后一次合影,弥足珍贵;此诗表达了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的亲人异地重逢的复杂感情,值得细细品味:

一病经年才勿药,
万方何日遍其苏。
死生骨肉都何有,
家国悲欢抵得无。
忽地市腥掀海气,
极天兵火烂秋芜。
共慙赵母肝肠热,
头白燕郊振臂呼。

诗中的赵母是一个历史典故,见《后汉书·赵苞传》。赵苞(?—177),东汉甘陵东武城(今山东武城西北)人。初任孝廉,后任辽西太守。其母、妻赴辽西时,途中为鲜卑贵族劫持为人质。赵苞仍坚持抗击,其母亦遥勉以忠义,母妻被害。鲜卑破后,他葬母事毕,呕血而亡。1938年9月,黄炎培夫妇在香港共同重温赵苞之母的故事,实际是说为了国家和民族,忠义第一,随时都作牺牲的准备。这一首亲情诗实在是夫妇共患难的决心书!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王纠思不但积极支持黄炎培的工作,她自己也力所能及地参加了一些社会公益活动。黄炎培在《先室王纠思夫人行略》中说:“夫人善排解人纷难,尝百计以成人之美,而其人不必相知也。偕友创家庭日新会,每周相聚切磋,以正风习,为公益为国难募金,自领队,不后人。……”

王纠思回到上海以后,大约就未见到过黄炎培了。1940年12月12日因脑溢血复发,上海发急电到重庆,15日下午王纠思病故,终年59岁。就在黄炎培得到噩耗的时候,黄炎培的朋友王良仲从上海回到重庆,他说,13日他去看黄师母王纠思,躺在病榻上的王纠思再三嘱咐,千万不要把生病的事告诉黄先生,并且“亲检取豆一器,手帕

三寄赠”。黄炎培睹物思亲，泪流不止，痛苦欲绝。他写下了《天长七首》，写下了《先室王纠思夫人行略》。后来又写了《亡妻百日祭》诗：

梦破惊疑尚此身，
双江凄雨送萧晨。
那容逐汝抛群众，
直欲呼天鉴苦辛。
花落咒归清静士，
门开愁见去来人。
剖心残热倾何处？
肠断淞南草不春。

这一首诗和1941年12月15日《生死十三绝》以及1943年4月5日《清明渝都江干望祭先夫人七首》，可以说是40年代悼亡诗之最，可以和宋朝苏轼《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相媲美。哀婉缠绵，催人泪下。

教子一片情

黄炎培虽然忙于教育实践，忙于兴办职业教育，又忙于其他社会活动，但他对教育子女还是十分重视的，一片深情，无限期望。

1909年他就写过《理想的家庭》一文，发表在《教育杂志》第一年第二期上。他主张改良家庭，建立新家庭关系。

1926年11月20日黄炎培写过一篇题为《家箴》的文章，发表在《生活》周刊第八期上。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说青年结婚组成家庭以后应该注意一些什么问题。箴言，就是劝戒的话。这实在是黄炎培的家庭理想模式。他指出“夫妻相爱，还须相勉，善则劝，过则规”。“又须相谅。夫妻知识不必相等，才能不必相若，于其所能勉之，于其所不能者谅之，此为永保爱情之道。”“勤于职务，则事业蒸蒸日上；俭于用度，则出入绰绰有余。若纵一时爱情而旷职，或且博一时之爱情而浪费，则快乐无多，而痛苦已随其后。”

1937年他还写过一篇《怎样教我中学时期的儿女》，强调教育子女怎样做人，怎样养成勤俭好学的美德。

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在《黄炎培诗集》中我们可以看到：

1927年7月27日《儿方刚与美女结婚，诗以勸之》；

1936年4月4日《儿方刚生日，同上峨眉金顶作》；

1938年8月12日《戊寅八月宿成都诸儿女茅舍七日留题》。

黄炎培的思子诗有三类，一类为上所述是叙事诗类，纪游、纪行，兼以教育；第二类是悼亡，哭子；第三类是教子、训海。

现在说第二种类型。当年他的长子方刚（1901—1944）在武汉大学任教授。1943年底生病，三个月后，即1944年1月17日病故，终年44岁。黄炎培这时已经67岁了。老年丧偶以后又丧子，他的心情是非常悲痛的。1944年2月11日他写了《长儿方刚先我物化，自渝之蓉，将转乐山，亲临之途次三首》，“伤心丽景不成诗”，“惭愧吾身强自支”。

同年3月22日他写下了不忍卒读的《哭方刚墓》：

生不求人强自支，
死留清婉伴峨眉。
三江窈窕堪遗世，
百卷残稿欲付谁？
最后解人空尔索，
诸生庐此复奚辞。
王师大定中原日，
翻待衰翁祭告儿。

据黄先生所写《黄方刚墓志》，黄方刚“穷研哲学，历任广西、东北、北京、四川、武汉各国立大学及华西大学教授，东北大学文理学院院长，凡十六年”。第三句，三江，指方刚的三个儿子，长子十九，1932年生于上海，为纪念十九路军在淞沪英勇抗日而取了这个名字；次子海川；三子岷江。第五句，黄炎培自注：“方刚治哲学，以解答最后问题自任。”第

六句，黄炎培自注：“墓地其弟子李生树芳所赠，李宅在焉。”第七、八句是改用宋朝诗人陆游（1125—1210）《示儿》“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示儿改为祭儿，其心境是多么凄凉啊！

黄炎培哀悼儿辈的诗，还有1942年4月3日写的《黄自不死》白话诗。黄自（1904—1938），字今吾，小字四由，音乐教育家、作曲家，黄炎培的侄儿。黄炎培应邀听黄自弟子奏黄自所作曲，“哀其志，叹其年不永”，黄炎培写道：“唤一声，浪回头。四由。/唤两声，天低头。四由。/唤三声，大中华万岁千秋。四由。”真是悲天号地！

黄炎培次子竞武（1903—1949）1949年5月12日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5月18日惨遭杀害。其时，黄炎培正在北京从事新政协筹备工作，6月4日他接到陈毅等同志从刚解放的上海发来的电报，噩耗传来，黄炎培这时已经72岁了，眼泪夺眶而出，但他很清醒，也很坚定。次日，他即电复陈毅等同志：“竞武仅为一技术人员，竟因争取民主惨遭杀害，可云求仁得仁。炎培虽老未衰，犹愿随诸先生后，对人民革命更加努力”。不久，黄炎培在《纪念竞武》文章中说：“竞武：你死了，倘若你预知死后八天，上海六百万市民便得解放，全中国四万万七千万人民将先后都得到解放，竞武，你虽然死得惨，也可以安心了！”

黄竞武是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硕士。1929年留学归国，长期在盐政机关任稽核工作。抗战后，任重庆中央银行稽核专员。1941年在重庆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5年又参加中国民主建国会，积极从事抗日民主运动。他被捕前正在奋不顾身地揭发国民党把中央银行库存的黄金、白银，偷运往台湾，并发动职工怠工拒运。黄炎培真是一位坚强的老人啊！

研究黄炎培的父子亲情诗，还



1942年8月,黄炎培与姚维钧结婚

有第三种类教子、训海诗。

黄炎培四子大能回忆说:

吾父教育我们要做一个正直的人,勤恳的人。他给我的座右铭,今天看来似仍有适当价值。兹抄录如下:

理必求真,
事必求是。
言必守信,
行必踏实。
事闲勿荒,
事繁勿慌。
有言必信,
无欲则刚。
和若春风,
肃若秋霜。
取象于钱,
外圆内方。

1942年8月,黄炎培在重庆娶继室姚维钧,次年生女,名当时。黄炎培诗中说:“父女年相差,六十四有半。”为什么取名“当时”?黄炎培有诗曰:

名儿曰当时,
兹义汝寻玩。
双江何深深,

一绿阴如伞。

呱呱蕉林下,
主人善翼卵。
吾识汪伦情,
生生德何限!
匠药兼匠诗,
句好珠成串。
苦战六七春,
物置事求简。
相期饮黄龙,
未拟分红蛋。

他对孩子充满了胜利的期望。
姚维钧共生二女二子:女当时、丁年,子方毅、罔。

爱情新篇章

黄炎培先室王纠思1940年12月15日因患脑溢血病逝于上海。63岁的黄炎培哀痛欲绝,孤苦凄零。不久,大夏大学文学院师范专修科一女学生闯进了他的生活圈。这个女学生叫姚维钧(1909—1968),上海南汇人。她从上海只身来到贵阳读书,家里还有一位老母亲。1942

年4月黄炎培赴贵阳,在大夏大学讲演,为正在大夏大学读书的姚维钧所倾倒。姚维钧才思敏捷,谈吐不凡。两人遂通信,以诗词唱和。黄炎培为她题诗一首,即《题维钧扇》:

林能荫鸣扇能凉,
一样人前服务忙。
料得年年人念汝,
秋风珍重自收藏。

从此以后,他们之间诗词唱和逐渐增多。姚维钧有词《有感,调寄沁园春》:

孤鹤高飞,
越海冲天,
别尽旧人。
且拓开新境,
聊酬壮志,
快翻怒翼,
早拂轻尘。
林麓何依,
塞云何托,
谁识长鸣自有真。
流年改,
念来时任重,
茹苦含辛。

交亲散落如云,
又何用朝朝暮暮情。
任花开也好,
月圆也好,
等闲聚散,
更不伤神。
遍历艰危,
饱历贫病,
夕照山林寄此身。
无言久,
有一腔热血,
相映红轮。

黄炎培读罢这首词,立即写了《维钧修毕大学业寄赠》:

万里求师自有真,
苍凉一阙沁园春。
学成已报家山破,
谁识平生意苦辛。

大约就在他们结识不久,就有人撮合他们成亲了。这有黄炎培所

写《灵瑞词》为证,《灵瑞词》其四云:

城阙兮芙蓉,讲幄兮春风。忽李
姝其入室兮,惊先夫人之遗容。谓惟
彼友姚姝兮,神情小异而大同。倘两
美其必合兮,不辞蹇修以相从。俾三
者其一体兮,信人间天上之情通。
.....

是的,爱情是神通的。64岁的
黄炎培和32岁的姚维钧结婚了。婚
礼是1942年8月16日在重庆张家
花园巴蜀中学礼堂举行的。证婚人
为张一麟和穆藕初,介绍人为杨卫
玉。

黄炎培和姚维钧结婚,一时传
为美谈。黄炎培1942年9月14日
写了一首《婚后自渝柬沪张伯初并
诸友好,半年前沪报讹传余婚事辑
入珍闻》诗:

语出传说枉自珍,
事当征实却无闻。

不期柳栗天偕老,
更纵巴窗夜论文。
家国绸缪成龟勉,
江关词赋伴艰辛。
剧谈差喜无余忌,
一爱弥纶澈旧新。

柳(jié)栗,木名,可作杖。宋朝范
成大《丙午新正书怀》:“病怜柳栗
随身惯,老觉屠苏到手迟。”绸缪,
《诗·唐风》篇名,喻新婚夫妇喜悦。
龟(min)勉,勤勉,努力。黄炎培和
姚维钧结婚以后,确“一爱弥纶澈旧
新”,他们夫唱妇随,伉俪情深。这里
不妨列举1942年11月6日《国民
参政会即事》诗:

姚维钧的原作:

观音岩上久徘徊,
贩者纷纷饱囊回。
过尽千车人不见,
一灯远送履声来。

黄炎培的和诗:

观音岩上市声稀,
夜夜夫人匿我归。
过尽千车人不见,
一天风露湿君衣。

姚维钧婚后帮助黄炎培整理诗
稿,编就抗日战争以后的第二部诗
集《天长集》,并写了序。后来参加了
中国民主建国会,被推选为第一、第
二届中央常委。

研究和赏析黄炎培的亲情诗,
可以深入了解这位教育家、社会活
动家、诗人的感情世界的丰富性和
复杂性,这实在是知人论事的研究
工作所不可少的。

(责任编辑 元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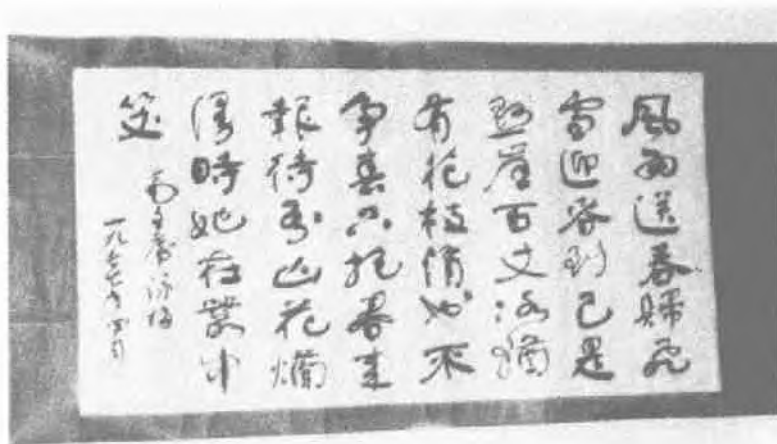
黄炎培 1933 年给儿子黄万里的信(黄万里今年 85 岁,清华大学教授)

一幅没有题名的舒同墨宝

● 田 方

舒同，我国党政军历任重要领导职务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当代中国杰出的书法家；又是我的良师益友、患难之交。60年代前半期，他担任中共陕西省委主管宣传文教的书记，我是《陕西日报》的副总编辑，他直接领导我们，经常向他请示汇报，他从来不摆官架子，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和当时陕西有些首长一对照，存在着明显的反差，印象相当深刻。“文革”期间，我们同遭劫难，他在台上挨斗，我在台下陪斗，同受皮肉之苦。我们都患有各种疾病，粉碎“四人帮”前后，我们同住西安第四军医大学附属医院就医，朝夕相处半年多。出院后，彼此生活上相互关照，往来频繁。我对他原来不幸的家庭生活颇表同情，他对我也无话不谈，彼此相知日深。70年代后期，他担任中国军事科学院副院长期间也时有往来。因老病复发，又同住三〇一医院，交往又多。

舒同，翰墨一生，70多年来，黄河上下，大江南北，向他求字者何止千百，他平生书作不下两万幅。我自幼从师学过何绍基书体，一度达到痴迷程度，至今记忆犹新。因家贫辍学，及后虽已荒废，但对那“雄逸而不轻飘”之气的何体仍极欣赏，如今耄耋之年，偶尔兴至，仍要挥毫练练。后来，读到既含何体而又有其独特风格的舒体，更见其端庄凝重，疏散飘逸，有凛然正气，无邀宠媚态，更是爱不释手。因此，我家也珍藏着舒老的书作多幅。1980年他为我题



1977年4月舒同书毛泽东词《咏梅》赠田方

赠的中堂：杜甫《旅夜书怀》诗，其中下四句为：“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充分反映了舒老的自豪自解：既胸怀经世大志，所以说名岂文章而著，官实因论事而罢，偏用老病自解。浩然正气，跃然纸上，激励人志，勿作欺世盗名之辈。还有一幅给我题赠的对联是：“风鸣两岸叶，月照一孤舟”，也是激励人淡泊明志之意。他还为我主编的《中国生产力合理布局》、《中国人口迁移》、《中国移民史略》、《国外人口迁移》等书封面题写书名。而更为稀有的则是1977年4月他为我题赠的毛主席《咏梅》横幅，现在想起这幅无题名的舒同墨宝往事，犹感慨良多，特记述如下。

1971年“9·13”事件中林彪叛逃国外自毁于蒙古温都尔汗沙丘

后，我作为参与炮制《刘志丹》反党小说的“反党分子”、习仲勋“黑爪牙”，经过在报社内部劳动一段时间以后，还要下乡蹲点劳动，被分配到商洛杨峪河公社上赵源大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蹲点劳动期间，我害了一种剧烈的腹痛症，在商洛地区医院住院检查没有结果，先是被到西安住进陕西省医院检查，以后又到医疗条件较好的第四军医大学附属医院求诊。恰好，舒老同志，这时也在这个医院住院治疗。在此期间，我们相互倾谈的很多。我见到舒老十分孤独，所以经常到他病房和他闲聊解闷，并把我老伴送来的鱼虾等南方菜肴与他共享，我们之间交往愈多，相知益深。直到1976年10月党中央公布粉碎“四人帮”消息后，人们兴高采烈，奔走相告，相

互庆祝。舒老这时精神焕发,兴致浓厚,健康状况日见良好。我们几位病友,以及为舒同治病、护理的大夫、护士们,纷纷要求舒老题赠墨宝,舒老欣然同意,司机从他家搬来了文房四宝,就在病区餐厅拼凑的几张方桌上,连续写了三个上午,才充分满足了大家的要求。

当时,“四人帮”虽被粉碎,但百废待兴,问题堆积如山,特别是许多人被整后政治帽子扣了不少,都还没有作出平反结论,背上的政治包袱尚未卸下,人人心有余悸,是可想而知的。因此,舒老给各人的赠题都是毛主席诗词。舒同就是用毛主席诗词来鼓舞人们的斗志与信心。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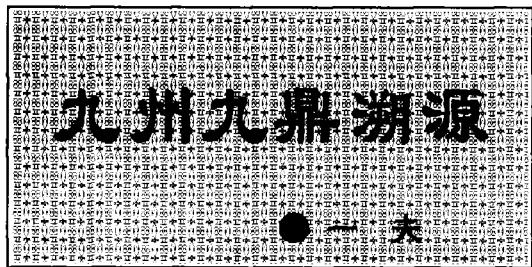
为舒同早在1932年春漳州战役后,就和毛主席一起交谈诗词。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有人请毛主席题字,他总是推荐舒同。因此,“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的校名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都是舒同题写的;“延安新市场”是舒同题的牌名,而毛主席又题写了一副对子:“坚持团结坚持抗战坚持进步边区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反对投降反对分裂反对倒退人民有充分的救国自由权”。这是两位书法家难得的合作。

那次题字后不久,“五一”劳动节,我大女儿结婚,我穷,无力送她嫁妆,就把舒老书写的毛泽东词《咏梅》送给她了。参加婚礼的亲朋友好

发现他们新房这条横幅时,都表示十分惊讶,大家都认识这是大书法家舒同的字,可是对这种既无上款,又无下款的条幅感到十分新奇。“文革”的恶梦刚过,那时,“四人帮”被粉碎不久,前景虽然光明灿烂,但人们心中还心有余悸。这时虽则“风雨送春归”,但“已是悬崖百丈冰”,只有“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此时此情此景,《咏梅》这条横幅真是最适合不过的了。

现在,时过境迁,有人劝我找舒同补题上下款,岂不更加增色。我却没有从命。因为这就是历史的本色,这就是时代的记录。

(责任编辑 方实)



九州是中国的代称,是众所周知的。但是能够将九州以及九鼎的来历说个端详的人却为数不多。

据《春秋左传》记载,夏朝初年,夏王大禹划分天下为九州,令九州州牧贡献青铜,铸造九鼎,将全国九州的名山大川、奇异之物镌刻于九鼎之身,以一鼎象征一州,并将九鼎集中于夏王朝都城。这样,九州就成为中国的代名词。九鼎成了王权至高无上、国家统一昌盛的象征。

九州指冀州(河北、山西、辽宁)、兖州(河北、河南、山东交界处)、青州(山东、辽宁一部分)、徐州(山东南部、江苏北部)、扬州(淮河以南,东南至大海)、荆州(湖北南部、贵州、广西)、豫州(河南、湖北北部)、梁州(陕西南部、四川、云南、贵州北部)、雍州(陕西、甘肃、新疆、青海、西藏)。

九鼎,是我国青铜器时代的代表作。它的铸造工艺,标志着中国历史已结束了荒蛮时代,进入了文明时代。历史上虽有众多有关九鼎的记载,但是,早在两千多年前,它就不知隐身何处了。

《墨子·耕注》说:“九鼎既成,迁于三国”。三国指夏、商、周三朝。意即九鼎铸成之后,曾经流传了夏、商、周三个朝代。据此,我们可以推断:九鼎在历史上确有其物。

公元前606年,春秋五霸之一楚庄王势力日益强大,他野心勃勃,意欲取代周王而定天下。一日,周定王派人为他举行欢迎之礼,典礼之中,楚王公然蔑视周王,“问鼎大小轻重”,当即将欢迎他的周王使节吓出一身冷汗。楚王灭周的野心暴露无遗。从此,人们把争夺政权称之为“问鼎”。

几经沧桑,九鼎下落不明。在司马迁的《史记》曾有记载:秦昭王五十二年,(公元前255年),周赧王死后,秦穆公把九鼎从周王朝都城雒邑掠到秦国都城。

但东汉史学家班固却反对司马迁的说法。班固在所著《汉书》中说,周显王四十二年(公元前327年),九鼎沉没于彭城(今江苏徐州)泗水之中,后来秦始皇一统天下后,迟迟找不到九鼎,总觉得心存遗憾,在南巡时,曾派数千人在泗水中打捞,但一无所获。

到了清代,历史学家王先谦对九鼎的去向作了长期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观点。王先谦在《汉书补注·郊祀志》中提出:由于周朝末年王室衰微,诸侯争霸,逐鹿中原,九鼎成为群雄争夺的焦点,为了息事宁人,周王不得不毁鼎铸钱,对外则诡称不知去向,免得各路诸侯兵刃相向,兴师问罪。

毫无疑问,九鼎作为镇国之宝,确实存在过,并曾经流传两千余年。但是,九鼎是否仍然存在、存于何处,至今仍是埋藏于众多中国人心里面的一个谜。

陕西农民的苹果梦

● 辛 平

1995年6月12日,《陕西日报》报道了一条振奋人心的消息:

在近期结束的“首批百家中国特产之乡”评比命名活动中,陕西白水縣被命名为“中国苹果之乡”。

白水县继苹果夺冠之后,县委、县政府趁热打铁,加紧部署,又发动了强劲的苹果销售攻势。7月上、中旬,白水县政府特请中国果品协会牵头,邀请16省市上百名苹果经销商到白水共商苹果销售大计,抢先占领苹果销售的主要市场。各地客商到田间地头目睹了“中国苹果之乡”的基地规模、规范管理、果农熟练的“无公害”操作技术,证实了“中国苹果之乡”果然名不虚传,纷纷表示出大批量订货的意向。

仅仅一个月,白水就连续打了两个漂亮仗,如果说,有什么样的付出就应该得到什么样的回报,那么,白水人得到的回报是非常公正的,因为他们的付出得到了社会的承认。

昔日穷山恶水 如今名闻天下

过去的白水,是一个连吃饭问题都没有解决的贫困县。1980年,白水人均收入74元,财政收入371.4万元,自给率仅占35%。

怎样甩掉贫困县的帽子,带领群众走上富裕之路?县领导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根据白水县有发展优质苹果的自然条件,确立了“白水要致富,苹果要大上”的战略目标,全县上下一齐行动。1985年白水被列为优质苹果基地县后,发展劲头更大。到1993年春,全县苹果面积已发展到30万亩,农民人均1.5亩,成为全国人均苹果面积最大的县,总产量达1.5亿公斤,实现产值2亿多元,仅此一项,就使农民的人均收入超千元,收入过万元的户达八千多,其中5万元以上的三千余户,最高的户收入高达23万元。

苹果生产不仅给农民带来了实惠,同时也使入不敷

出的县财政走出了困境。1993年,全县农林特产税收入1230万元,占财政总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一。1994年,白水县苹果挂果面积扩大到14万亩,产量达到2亿多公斤,收入2.5亿元以上,为县财政提供收入1800万元,占全县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六十。1995年,白水县虽然遇上几十年未遇的大旱,但因县财力较强,注重对水利基础设施的投入,漫山果园,枝繁叶茂。

早在50年代,陕西就开始摸索种植苹果,到1973年,延安、洛川、铜川、淳化等县市被农业部、外贸部、商业部认定为苹果生产基地,奠定了陕西苹果在国内的地位。与上述县市同步发展起来的礼泉县,从1976年起,就在总结建设万亩果带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把发展苹果作为农村脱贫致富的突破口。1980年,国家在辽宁、山东、陕西试种红富士,一些地方因技术不过关,试种失败,陕西的试种点礼泉县,三年后硕果累累,取得试种成功的经验。可是礼泉人没有抓住种红富士这个机遇,仍以种植秦冠为主。虽然经过1984年和1989年两次较大地调整产业结构,使全县的粮果占地比达到6:4,果品栽植面积达34万亩,但苹果的品种百分之七十为秦冠,而未能在调整产业结构的过程中推广自己试种成功的红富士。

我说礼泉人失去了一个机遇,只是就苹果的品种而言,这是涉及长期发展的问题;如果就种植苹果而言,礼泉人确实抓住了千载难逢的机遇,特别是1984年全国果品价格放开之后,礼泉人利用自己起步早的优势,大胆调整粮果比,使礼泉无论在苹果的种植面积上,还是苹果产量上,都居于全省乃至全国的领先地位。1994年,礼泉苹果的挂果面积达到20万亩,总产量超过3亿公斤,产值达到3.5亿元,年销售收入6亿元,这三个指标都远远领先于白水。多少年来,礼泉在苹果种植上一直处在排头兵的位置,礼泉县也因此而名冠三秦。遗憾的是,礼泉却因为苹果品种不行,最后名落孙山,反让后起之秀白水县以种红富士优良品种抱了头彩。

礼泉县和白水县的变化,为陕西省的贫困县创造了一个模式,为陕西省脱贫致富点燃了一把火炬。陕西省

政府及时总结了礼泉和白水的经验,于1986年决定,在渭河以北22个县市建立百万亩苹果生产基地,要求1988年建成。谁想到,这把火一下子烧遍了整个陕西。在省政府的提倡下,有礼泉和白水做榜样,各级领导似乎找到了领导人民脱贫致富的钥匙,陕西栽种果树之风骤起,“要想富,栽果树”,“想花钱,建果园”之类的标语,写得满墙都是。在此情况下,礼泉和白水人更是一马当先,开足马力。苹果为一些山区的农民敲开了快富的大门,在同一地区竟然出现了山区农民脱贫致富的速度大大快于灌区农民的现象。

苹果种植的快速发展,曾使一些人士表示担忧:会不会因此而影响粮食生产?这样的担心很快就被调查结果否定了。农民有了钱,才有能力向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投入,粮食才能增产。白水县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每年群众民办水利投资达几千万元,其中很多人是因为种果树赚了钱才具有了投资能力的,由于农民舍得向农田基本建设投资,因而保证了粮食能够连年稳产高产。

有这样成功的先例,大大刺激了栽果树的热情。近两年,苹果种植以每年百万亩的速度向前发展,其栽种的位置也由山岭沟坡逐渐扩展到灌区粮田。1993年8月,渭南地区行署发出《关于加快我区百万亩优质苹果基地建设意见的通知》,此时全区的苹果面积已经突破了100万亩,到1994年渭南的水果种植面积发展到160万亩,其中苹果面积超过140万亩,而南部灌区就占50多万亩。已经被历史经验证明过不适栽种苹果的秦岭北麓各县,亦在“苹果热”中重整旗鼓,卷土重来,果树大多种在川道及台原的稳产粮田里。礼泉的果园最北建在北部山区,而后以迅猛的势头向南部粮区蔓延……大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

面对果农腰包日趋鼓胀的巨大诱惑,一些在区县工作的机关干部犹如热锅上的蚂蚁,坐卧不安,纷纷利用各种关系,下乡开辟“第二职业”。国家级贫困县淳化的许多机关干部到农村投亲靠友,租地兴建果园或承包果园。连几代居住在县城已经没有乡下亲戚的干部,也各显神通到黄土地寻找致富梦。仅1992年秋季,全县机关干部新建果园1.1万亩。县人武部干事白晓民、白保民弟兄5人,集资6万元,在泾河岸边荒地滩上承包60亩地,栽种苹果40亩,梨20亩,1994年就收入20多万元。在机关干部的影响下,淳化县的农民也闹起了兴建果园的热潮,从1993年到1994年秋,仅一年时间,全县就新建苹果园12万亩,超过前20年建果园面积的总和。

到1994年底,陕西省种植苹果面积已达653万亩,1995年又大大增加。这是否是最后的极限呢?从目前的趋势看,其惯性可能还要向前延伸一段时间。陕西省有关领导也承认,近几年苹果生产有些盲目发展,有的地方已经失控。据陕西省土地局的统计资料表明:1994年

全省共减少耕地91.8万亩,其中果、桑、茶等种植业结构调整就占地56万亩,占百分之六十一,全省人均耕地由1993年的1.54亩下降到1.47亩。

苹果独占鳌头 三分天下有其一

不论农民有没有文化,简单的账还是会算的。到底是种粮食合算还是种苹果合算?农民兄弟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陕西日报》的记者曾请渭南地区农牧局局长邓清晰算过一笔账:以玉米和小麦综合指标计算,每亩种子17元,农药15元,化肥125元,水费45元,机械作业费35元,每亩收获粮食按370公斤计算,单价按每市斤0.51元,每亩收入380元,减去生产投入资金,纯收入仅140元,这还不算生产过程中所投的工。至于种棉花,投入更多,收入更少。而一亩苹果,尽管前几年没有收入,需投入1400元,但挂果后,年平均纯收入可达3000元。两相比较,差距就这么大。其实,上面对粮食收入的计算方法是打了折扣的。首先,公购粮的价格从1994年已调整到每市斤0.54元,财政收入较好的地区还可以给以适当补贴,每市斤可达0.56元;其次,公购粮数量有限,大多数粮食仍在手中,等到秋季,粮食收购价格约在0.80元左右;再次,来年春季青黄不接之时,粮商收购粮食价在1元左右,如果上年粮食歉收,粮价更高。因此,每亩粮食的纯收入应在300—400元之间,即便如此,还是比苹果收入低得多。

陕西的林果技术人员也算过一笔账:一亩地通常可以栽果树80至90株,3年挂果,第五年进入盛果期,一株上好的红富士可结一百公斤左右的果,一般的可产六十公斤左右,按中等水平计算,每亩地可产五千公斤左右,一公斤卖两元钱,就是一万元,除去农林特牧和生产投入,一亩地净收入可达八千元左右,比一个县长的年收入还高。当然这笔账是专业人员计算的结果,真正能达到中等水平的果园并不很多,大多数果农还是采用粗放型经营管理,加之天灾等因素,果农的实际收入还要大打折扣。如再减去各种不能达产的因素,一亩苹果的纯收入也应在4000元左右。有如此巨大的利益,当然能吸引许多禁不住诱惑的农民,特别是部分山区的农民因种苹果而致富后,使曾经有过极强优越感的灌区农民在心理上失去了平衡,于是大片的良田变成了苹果园,昔日麦浪滚滚的灌区,今日被一片片苹果园所代替。

苹果仅仅是众多水果中的一种,据1995年2月27日《经济日报》报道:“目前全国果树栽种面积已达1亿亩,年产果品三千多万吨,成为世界水果生产大国。”而苹果又因其色泽鲜艳,易于保存,在众多水果中备受青

睐,种植面积占全国水果种植面积的三分之一。据农业部的一位高级农艺师介绍,到1994年底,我国共有苹果种植面积三千多万亩,已挂果的面积约为种植总面积的百分之四十五,年产苹果一千多万吨,全国人均占有苹果约十公斤。这个数字表明,中国人目前苹果消费量已经接近西方发达国家消费苹果的水平。

日趋饱和的苹果市场 是否潜藏着危机

1995年3月30日,《陕西日报》公布了几个数字,1994年,陕西苹果的“挂果面积208万亩,年产量178万吨。从总量上看,仅次于山东省而位居全国第二,而为农民增加的收入人均七十多元,居全国第一。”从上面的几个数字,我们不难看出陕西苹果在中国的地位,以及苹果为陕西的脱贫致富做出了如何卓越的贡献。然而,潜在的“苹果危机”也在悄悄地向人们走来。

有人为渭南地区的苹果算过一笔账:从现在起,渭南地区不再增加一棵苹果树,到2000年所有的苹果树全部挂果,就可以为全国每人提供25公斤苹果。据某报报道:西方发达国家每年人均消费苹果才二十多斤。难道我国到2000年苹果的消费水平能超过发达国家一倍吗?陕西省苹果种植面积若再继续发展,到2000年全部可以挂果,按渭南提供的苹果量计算,全国每年每人将从陕西得到苹果132公斤。陕西省的苹果种植面积在全国居第二位,全国的苹果大省还有山东、辽宁、河南、山西等省,若将这些省所产的苹果全部加起来,至2000年全国人均占有苹果是多少呢?中国人是否要将苹果当饭吃?

面对此情是喜是忧,抑或忧喜参半?

可喜者: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城市居民的饮食结构有了较大的改变,水果的消费量逐年增加;我们甚至可以推断,食用低脂肪和富含各种维生素的食物,还将对我国人民的健康水平产生深远的影响,水果生产的不断增长,还将继续推进这一变化;根据目前水果市场上的供求看,供求关系正处于蜜月之中。

担忧者,则似乎比前者看得更远些。首先,我国目前苹果生产尚处在初级阶段,平均亩产只有一千公斤左右,属于低产。低产的直接后果是造成土地的大量浪费;其次,有相当一部分苹果种植在非适生区,其外观、糖度、口感均缺乏竞争力;再次,还有相当数量的苹果品种属于应该被淘汰或将要被淘汰的品种,也就是说这一部分将很快被挤出苹果市场。之所以目前苹果的供求还能够保持相对平衡,主要原因在于我国苹果的低产。再过两三年大多数果树要进入盛果期,加之要求果农逐渐提

高管理水平,在种植苹果的过程中,科技含量增加,会大大提高苹果的产量。如果这样分析不错的话,两三年后,中国的苹果市场将会出现供大于求的局面,果多自然贱,“谷贱伤农”,果贱也会伤农。果树种植起步较晚的县区绝不会像白水和礼泉那样幸运,有的县区可能面临着即将来临的打击,部分果农面对市场的选择可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不少农民发现,在苹果种植超过饱和点之后,再种苹果并不明智。

1995年5月5日《陕西日报》刊登了一则消息:“3月26日记者在大荔县城北关树苗市场上看到,成堆的树苗堆成小山,有汽车拉的,架子车装的,自行车推的,每株苹果苗仅卖一角多钱。为了促销,一些人买十送五。”而同样的苹果苗,1994年却能卖到2至3元,市场就这样捉弄人,但愿苹果的命运比苹果苗好。

苹果也是商品,也要 遵守市场经济法则

随着苹果市场供求关系的不断变化,如何使自己的苹果“墙内开花墙外香”,成为人们越来越关注的问题。

礼泉县因为种植苹果起步早,该地出产的“秦冠”苹果名声在外,曾一度处于卖方市场,各地经销商纷纷登门求购。近几年,由于苹果种植面积大幅度增长,礼泉苹果不能再“坐地待购”,于是一支由两万余名农民组成的销售大军迅速崛起。他们北上南下,东出西进,全面出击,把全县百分之六十以上的苹果,销往省内外。但是,礼泉苹果如果不能尽快更新换代,改变“秦冠坐桩”的局面,礼泉将从苹果市场的宠儿变成弃儿。

出人意料的是,正当礼泉人四面出击,推销“秦冠”之时,甘肃省秦安县的农民却以自己的优质“红富士”假冒“礼泉苹果”向外销售。秦安县山区是苹果生长的最佳区之一,其不仅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而且水质土质好,无任何污染,所产苹果个大型正、外观艳丽、口感甜美,只是因为起步晚,一时很难创出知名度,所以出此下策,在苹果包装箱上打上“礼泉苹果”字样。与秦安农民不敢自创名牌的保守行为相反,山东海阳县北部山区的农民为了创出名牌,一方面不断提高自己的果品质量,一方面不断树立自己的品牌形象。他们注册了“皇家牌”红富士商标,成立了皇家红富士开发总公司,利用各种新闻媒介大张旗鼓地宣传,把皇家牌红富士新闻发布会从山东一直开到北京、深圳、新疆等地,使人们在较短的时间内便接受了这个品牌。皇家牌红富士很快就畅销全国18个省区,远销欧亚8个国家和地区。

利用新闻发布会和展销会的形式,将自己的优质苹

果推销给广大消费者,已经成为苹果市场竞争的重要手段。白水从1992年开始在北京、西安举办“白水优质苹果新闻发布会”,又先后在长沙、广州、深圳等十大中城市举办“白水苹果品尝订货会”。1993年率先创办了“白水国际苹果节”,把来自美国、日本等十余个国家和地区的四十多名果商与国内三千多名果商吸引到白水,现场参观、品尝、订货,使白水苹果的名气远播海内外,为白水县夺取“中国苹果之乡”的称号奠定了基础。延安地区也是陕西的苹果种植大户,共有苹果120万亩,年产苹果25万吨以上。1994年,延安在上海举办“延安苹果展销会”,因其果型、色、味俱佳,被一些人称为“中国蛇果”,一时间在上海掀起了一股延安红富士旋风。

面对生产的不断扩大、挂果面积不断增加,销售苹果的压力越来越大。如何提高苹果生产、管理销售水平,已经成为越来越严峻的现实。只有不断增加苹果生产的科技投入,采用现代化的管理手段,准确把握市场需求与行情,才能提高市场竞争的后劲。这时,不太出名的旬邑县如一颗新星在陕西升起。1994年10月,旬邑首创苹果产供销微机管理,建成辐射全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计算机信息网络,为14个果区乡镇安装了16台微机终端,并建立了256个村级信息站。接着,旬邑信息中心又与西安计算机中心联合开发出苹果产供销信息系统,苹果产销各方通过该系统在县乡两级信息机构均可随时了解:县、乡、村、园每一品种栽种面积、预估产量和果库容量,每一品种、规格、色泽的当日存货量、产地最高价、最低价、平均价及地域销售情况、已经和即将与本县发生购销关系的果商的姓名、地址、职务及购销量等。

然而,尽管陕西的许多县市在苹果销售上不断加大投入,形势还是不太乐观,其中有自然因素,但更多的则是人为因素。有份调查很能说明问题:1995年春节前,陕西不少果农手中还存有不少红富士苹果,其中百分之八十在产地要价每公斤5.4元至6元,再加上包装、运输等费用,运到南方一般销售价高达一公斤9—10元。如果再加上其他损耗,售价更高。南方果品市场因价格较高,销售不畅。不少贩运者无利可图,甚至有的亏了本。北方各产果大省均把目光瞄准南方市场,陕西苹果要价过高,势必要被其他各省挤出南方市场。更为严重的是,在销售中一些人只顾眼前利益,短斤少两、弄虚作假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有的贩运者在苹果包装箱底搞夹层,使每箱苹果少装3—4公斤;有的把次果装在包装箱下层,把好果摆在上层,以提高苹果等级。结果既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也损害了陕西苹果的声誉。有的南方果商在经济上蒙受损失后,舍陕西而就他省。与此同时,陕西部分县市的治安部门、公路交通部门也乘机大发苹果

财,对长途贩运车辆乱扣、乱挡、乱罚,严重挫伤了苹果贩运者的积极性。

陕西处在山西、河南、甘肃等苹果大省的三面包围之中,从陕西苹果销售的总趋势看,丢掉了南方市场,就等于丢掉了苹果生产的生命线。优胜劣汰,这是市场经济的铁的法则。

脱贫致富的多种途径

其实,脱贫致富并非苹果一途,甚至就连陕西的黄土高原上,也未必都要种上苹果,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植物还有很多,如沙棘、杜仲等等。适合陕西种植的、能够创造较高经济效益的植物不下数十种乃至上百种。就是种植用材林也可以获得很可观的效益,有远见的人把种植用材林称为办银行,也有人把用材林称作养老保险。而植树造林所带来的综合效益则更是难以估量。

陕西是一个农业大省,农副产品的加工潜力很大。民以食为天,人人离不开吃,如果能够紧紧抓住这一点,就能使陕西省获得相当高的经济效益。陕西省三原县食品集团公司,仅仅因为以五香猪蹄、三原熏鸡为拳头产品创出了优质名牌的宴友思系列食品,便很快占领了市场,获取了巨额利润,1995年上半年,销售收入超亿元,创税利五百余万元。食品工业不仅市场前景好、效益高,而且还可以带动农民的种植业和养殖业,增加农民的收入,加快农民脱贫致富的速度。

企业家比农民更适应市场,他们或许已经感到苹果生产将会过剩,或许他们仅仅是为劣质苹果设计出路,不论出于何种考虑,他们已经着手研制苹果加工机械,1994年,陕西三原县美乐公司所属食品机械厂和全国30多家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实行科技联网和协作攻关,开发研制出1000吨苹果浓缩生产线。还有一些企业引进了制作干脆苹果片的设备。这些加工设备和企业的诞生多少为果农缓解了后顾之忧。但仍不能乐观,据了解干脆果片投放市场后销售并不理想,而鲜果汁生产的问题就更多。据1996年4月国家技术监督局市场抽查结果表明,果汁饮品合格率只有55.7%。也就是说,如果加工业本身不能确保质量,就会在市场竞争中败下阵来。果农的剩余果品又去卖给谁呢?城市消费者可以在生产过剩中获得一点利益,但不可能无节制地消费。苹果市场的大起大落也许在所难免,只要是搞市场经济,你就必须按照它的规律办事,任何人的意志都无法左右它。

(责任编辑 洛松)

● 林玉华

1995年初春,我从京都回到位于大运河畔的故城探亲,看望了在县城工作的姜树勤、田玉梅兄嫂。他们从箱柜里精心取出一打从海峡彼岸寄来的信札和照片,向我讲述了发生在他们身边的一段感人肺腑的故事:

1947年前,在社会激烈动荡之秋,一位在天津经营生意的27岁的青年,仓促丢下妻儿老小,远走他乡——他就是田玉梅的生父田少仪。几十年云汉迢迢,时空相隔,亲人天各一方,杳无音讯。

80年代初,横亘海峡的坚冰开始解冻了。玉梅从一位由台湾回乡定居的老人那里打听到了父亲在台北的消息,兴奋得不知所措。1983年1月24日,她提笔给父亲写了第一封信,投石问路。这封家书途经泰国、沙特阿拉伯,辗转万里,于11个月后才送达父亲手中。农历腊月廿八,玉梅突然接到一封标有英文字母的海外来信,当时她心里咚咚直跳,打开一看,果然是离别36年的亲生父亲的来信,她展信阅读,泪如雨下,泣不成声:

“玉梅吾儿:……见女儿亲笔,我悲喜交集,百感交集。数十年沧桑世变,梦魂萦绕,真不知与儿辈从何说起。……儿见信即希祭告于爷爷坟前,我未报慈恩于万一,永存风木之悲。告爷爷我必返奉安,赎我不孝之罪。……我妻、汝母贤淑而命苦,与我结发情深,如今竟先我而去,我负妻多矣!希儿于汝母坟前代我一奠,泉下瞑目。……亲人时时在我思

念之中,聚首之日必然到来。……愿儿辈毋怠毋忽,是我至盼也。……”

一字字,一句句,情切切,思绵绵。玉梅看到父亲的手迹,激动万分。正月初二,她和丈夫树勤及孩子来到爷爷、母亲的墓前,敬酒,鸣放鞭炮,把父亲的平安家书祭告老人家在天之灵。这是多年来他们过得最好的一个春节。玉梅和丈夫盘算着等爹回来腾出那间房屋,还要再做两床新棉被。正月初九,玉梅给父亲写了回信,并寄去了娘生前的照片和坟头上的一棵草。时过两月,正当她日思夜想等待父亲的回音时,她接到在台湾的同父异母的妹妹田莹的来信,不啻一个晴天霹雳……

莹妹在信中写道:

“姊呀,未及提笔早已泪流满面。……您的信来迟了一步,爹他老人家已于正月十一日病逝。……自从我有记性起,每逢大年除夕,爹总是一个人在房里流泪。小时候不懂得为什么,长大后,才知道爹是想老家、想爷爷,思念老家的汝母和姊姊。有一年爹亲手写了一对春联:‘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结伴好还乡’。那时,爹告诉我和弟弟们,他要带着我们回老家。……去年年底收到姊的来信,爹是又高兴又难过,整天守着这‘万金书’一读再读,总致老泪纵横。妈说爹常夜里哭到天明,哭湿了枕巾,哭湿了手绢。……自从给姊去了封信开始,爹整天算着日子盼回信。眼看着爹的精神一天比一天差,到医院一检查,结果是肝病又犯了。每天我给爹到医院送饭时,

爹总要问有没有姊的来信。爹临终时,妈带着我们守着爹,他老人家一直撑着不肯咽气。妈凑着爹耳边说:‘少仪,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带着孩子们送你回老家!’爹才安详地合上了眼睛。爹过‘二七’时,收到了姊姊的回信,妈带着我们跪在爹的灵前痛哭失声。妈说:‘少仪,你走得太早,梅儿来信了,你却等不及看。孩子不怪你,你安心吧!’姊寄来的娘的照片和坟头草都放在爹的灵前,并随爹的棺木下葬……”

多少载骨肉分离,度日如年,好不容易盼到父亲的音讯,紧接着又闻噩耗,人天两隔,刚刚愈合的伤口又增添了新的创伤。玉梅不堪承受这令人心碎的打击,她跑到娘的坟上嚎啕大哭了一场。……

然而,亲情是时空无法隔离冲淡的。田莹妹来信说:“爹遗言交代我和弟弟们一定要跟大陆的兄姊保持联络,大家总有团聚的一天。爹给弟弟们取名园、圃,就是要我们不要忘了祖籍的家园。我们姊妹虽未谋面,然而那份亲骨肉的手足之情时时牵系着我们!”在台湾的田园弟也来信说:“亲人终究是亲人,海天万里隔不断、散不去同血同缘、同根同本的这份人伦。”1986年春,在台的姜福月先生回乡来探亲,玉梅和丈夫托老人家给台北的继母和妹、弟捎去了录音带和家乡的大红枣。不久,莹妹回信说:“捎来的录音带已收到,妈和我们都视为珍宝,反复聆听,高兴得了不得。在台中的一位老乡、爸爸生前的好友听到消息后,不

顾年近赶来台北听录音，是一听再听，思乡愈切。我们口中含着家乡的红枣，真是五味俱全，感慨万千。我坚信只要大家多保重，团圆的日子总会到来。”

海峡鸿雁，往来不断，传递着殷殷期盼，眷眷情愫。玉梅和丈夫搜集了一些反映祖国锦绣山河的彩照寄往台湾，以聊慰亲人的思乡之情。1986年底，田莹到美国西部游历，身处异国，一纸素笺跨越太平洋万顷波涛，飞到故乡亲人的手中：

“……当我搭乘的飞机翱翔在美国大陆上空时，临空而望，眼中的这片大地如此辽阔，山川如此壮观，那种朗丽的感觉至今是第一次。然而这种感觉刹那间便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股心酸，一种期盼，以及作为中国人的骄傲。我不羡慕美国，我相信中国的平原更肥沃更辽阔，山岳河川更巍峨更秀丽！姊，我心中的家乡是那么遥远而又亲近。当我在机舱里眺望窗外时，看着看着眼睛湿润了，我居然有股错觉——如果眼中的这片土地是老家……相信姊姊是理解我的感受的。在美国迪斯尼乐园看了一部家乡拍摄的立体电影《中国之奇观》，胸中澎湃，同行的朋友和我一样边看边流泪。虽然我们未曾亲临过斯土，然而那股浓浓的民族感情却是化于血中、与生俱来的呀！电影放映时，美国朋友惊奇赞叹，令我们作为中国人倍感自豪。我对他们说：‘这是我的故乡！’当天下午观看另一部电影《美国开拓史》，我有一种感触，看过中国的黄山竟不觉美国的洛矶山是山了。我跟身旁的美国朋友开玩笑：‘贵国的山川很壮观，不过与中国的山川相比，似乎欠缺了那股灵秀之美及泱泱气魄。你们还是小孩子！’起初那位美国朋友很不服气，最后他不得不诚恳地说：‘中国的确太伟大了！’……”

1990年三四月间，草绿春深，大雁南归。28岁的田莹作为台湾黛

莉亚国际公司总裁，应大陆民间文化艺术交流团体的邀请，从海峡彼岸转道香港飞来北京。田莹在大学学的是“资讯科学”，她从事的是选拔模特儿的职业。在京期间，她重点接触、了解和考察了北京的模特儿队。作为资讯专家，她通过艺术眼光的感悟和评审，抑或也有对故里的倾慕和偏爱，她对北京的模特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她说：“大陆地大物博，大江南北各个民族的美女举不胜数，而且各具特色。因此，中国最美的模特儿是在大陆！”她称赞大陆的模特儿多具有东方面孔，西方身材，资质优良，训练有方，领悟力强，管理严格，深受巴黎服装设计师的欢迎，赞扬她们是“东方的梦露”。

田莹首次来大陆，回故乡省亲是计划中必不可少的日程。姐姐玉梅和姐夫树勤专程来北京迎接她。亲人一朝相见，多少年的思念和期盼都化作了欣喜的泪花和滔滔的话语。田莹回到故城，参观了县城的街容和工厂。4月5日那天，正是清明节。田莹在亲人陪伴下，来到清凉江

畔的祖墓地，她在从没见过面的爷爷和娘的坟前，摆上供果，烧香点纸，扑通跪倒在地上：“爷爷！娘！我爸爸梦断天涯，他生前想爷爷、想娘，抱恨终天。如今，我带着爹的遗愿和家人的嘱托，来看望您老人家来了！”……

一天，我在北京突然接到树勤兄的电话，他约我赶往首都机场。在候机大厅里，我见到了田莹，由于连日的奔波，她脸上略带倦容，但明眸皓齿，举止文雅，身材颀长，穿着朴素，一看上去就是老家人的血统。闲聊中，她说：“在台湾的大陆籍同胞都盼望亲人团圆，国家统一。对大陆家乡的建设成就，我们一样地感到高兴！”说着，她莞尔一笑，挥了挥手：“后会有期！”

她飞走了，带着无限的眷恋飞向了蓝天。然而她的一颗赤炽亮丽的心却留在了故乡的土地上……

（责任编辑 舒 蓝）



1990年4月，田莹（中）从台湾回大陆
与姐姐田玉梅、姐夫姜树勤在北京留影

忠勇直谏、节俭奉公的晏婴

● 张伯芸

被后人奉为“至圣先师”的孔子，在他留下的据说读了一半就可以治国平天下的《论语》一书中，对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春秋时代——的有名人物多有评论。其中有一个人最为他所称道，甚至表示愿意做这个人的学生和小弟弟。这个人就是齐国的大臣晏婴。

其实，晏婴身高仅有1.4米多，其貌不扬，而且在历史上也没有什么叱咤风云的经历。让孔子所称道的，是他平凡中所显现的伟大人格。

晏婴在27岁时，当上了齐国的卿大夫。此后，经历了56年的宦海生涯，历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三朝。

齐庄公刚即位时候，对晏婴这位前朝老臣很是尊重，不但赏赐爵位给他，而且增加他的封地。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后，由于庄公崇尚武力，不讲德行，晏婴经常对他提出批评，庄公对他就不怎么礼遇了。

一次，庄公见晏婴来参朝，就命令乐队奏乐唱歌。歌词是：“算了吧！算了吧！我不喜欢你，你还来干什么？”

晏婴听后，知道庄公已经不信任自己了，就把爵位统统辞掉，把封地也全部退回，自己回老家耕田隐居去了。

在晏婴隐居期间，齐庄公被大臣崔杼杀害了。当他在外地得知这一消息后，他还是星夜兼程，赶回了都城。

车子停在了朝门外，同晏婴一起来的随从拦住了他：

“您打算为国君而死呢，还是多

一事不如少一事，远远地躲开？”

“我为什么要躲开呢？一个当君主的，对待他的臣民，不应该欺压，他所作的一切，都应该都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臣子对待国君，也决不是专门为了谋求自己的衣食利禄，他的责任是保护国家。所以，国君如果是为国家而死，那么当臣的也应该与国君同死；国君要是为国家而逃亡，当臣的也应该同国君一同逃亡。可是，如果国君是因为自己作坏事而送命，或者被迫逃亡，那么，除了他私人的亲信外，谁能跟他同死，跟他去逃亡呢？”

晏婴的一席话，惊动了在里面的崔杼。他推门出来，对晏婴恶狠狠地说道：“你为什么还不死！你为什么还不死！”

晏婴并未被他的气势所吓倒，依旧不慌不忙地说：

“事变开始的时候我不在，事变发生后我又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死呢？而且，我认为，一个大臣，如果把逃亡看作是正当的行为，那他就不能担负起保护国家的责任；把为国君殉葬看成是正当的事，他就不能对国家做出有益的贡献。我又不是国君的奴婢，难道他自己吊死了，我也跟着他去上吊！”

说完，他推开崔杼，摘下帽子，解开上衣，露出肩膀，伏在庄公尸体上嚎啕大哭。哭罢，站起身来，按照当时齐国礼节跳跃了三次，这才走了出去。

晏婴走出来以后，有人劝崔杼杀掉他，崔杼望着晏婴走远的身影，叹了一口气：“唉！这个家伙在百姓

中间很有威望，我若杀掉他，会失掉民心的。”

庄公死后，崔杼立庄公的弟弟杵臼为君，是为齐景公。

景公立崔杼为右相，立庆封为左相。为了平息朝中对庄公被杀的怨愤，崔杼不但大肆屠杀异己，培植党羽，而且还强迫所有的文武大臣和大小官员到太庙盟誓，效忠自己。

那一天，肃穆庄严的太庙简直成了一座大兵营。太庙大殿前，特意搭起了一个两丈多高的台子，台子下面挖了一个坑，一千多名坚甲利兵的武士环绕在太庙四周，遍布太庙大殿，前来盟誓的人进庙后必须解下佩剑。

按当时的习俗，剑是一个人身份的标志，是一个人尊严的体现，大夫和将军，一般不能随意解除自己的佩剑。但是，慑于崔杼的淫威，人们只好如此。但是，只有晏婴不肯从命。崔杼虽然对此很恼火，但还是勉强同意了。

参加盟誓的人，对天的誓词也是崔杼早准备好了的：我如果不帮助崔杼和庆封，而去帮助齐国王室，就一定要遭到灾祸！

但是，白色恐怖并不能使所有的人屈服，崔杼便一气杀掉了七个不予合作的人。但是，对于第八个不肯合作的人晏婴，崔杼也无可奈何了。

轮到晏婴后，他端起一杯血，仰天叹息：

“唉！崔杼横行霸道，杀掉了国君，我如果不帮助齐国王室，而去帮助崔杼和庆封这一帮坏人，那就一

定要遭到灾祸!”

鉴于晏婴在国际国内的威望,崔杼还不敢立时发作,只得强作笑脸相劝。

“如果你改变你刚才说的那句话,我就与你分享齐国;否则,戟就在你的脖子上,剑已抵在你的胸膛,望你能识些事务,三思三思……”

不待崔杼说完,晏婴怒目而视,打断了他的话。

“你用武器来胁迫,我若丧失了气节,改变了主张,那是一个懦夫;你用利禄来引诱我,我若背弃了新君,那就是违反了正义。崔杼,你难道没有读过《诗经》的那首诗吗?——‘那茂密的葛藤按着自己的天性,盘绕在大树的枝干上;光明正大的君子,决不能为了谋求个人的幸福而走上邪路。’难道我晏婴可以利用邪恶的办法来求取自己的利禄吗!无论你是用戟割掉我的脑袋,还是用剑刺进我的胸膛,我也决不会改变我的初衷!”

晏婴的话,句句像利剑。崔杼忍无可忍,拔剑就要向晏婴刺去。旁边的人眼疾手快,赶紧说情解救。

“你因为庄公无道,才杀了他;晏婴是个有道之士,你若杀了他,就失去民心了。”

听到这话,崔杼才悻悻地收起了剑,把晏婴放了。

不料,晏婴并不领情,他警告崔杼道:

“你干了天理难容的坏事,现在又假仁假义地把我放了,你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刚烈的晏婴走远了,他的气节,令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敬佩不已。

这份气节,后来也同样“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像孔子一样,司马迁对晏婴也仰慕敬佩,如果晏婴与他同时代,他竟心甘情愿地作他的一个车夫!

现今留下的反映晏婴事迹的《晏子春秋》一书,突出地反映了晏

婴大胆直谏,关心人民的行事特点。

齐景公可以说是齐国历史上最奢侈的国君。他在位期间,常常喝得酩酊大醉,对国家政事不管不问。在一个严冬的季节,纷纷扬扬的大雪一连下了三天,天气寒冷异常。景公披着白狐皮的斗篷会见大臣。他问晏婴:“真奇怪,大雪下了三天,可是我一点儿也感觉不到天冷!”

“天气真的不冷吗?”晏婴反问道。

景公听后,笑了笑,没有做声。

晏婴叹了口气说道:“我听说,古代贤明的国君,自己吃饱的时候,仍然想着有人在挨饿;自己穿暖的时候,仍然想着有人在受冻;自己安逸的时候,仍然想着有人的辛劳。您也是国君,可您却没有想到这些。”

景公听到这话,才恍然大悟:“您说得对,我明白您的意思了。”

随后,开仓分发一些衣物和粮食,救济饥寒交迫的灾民。

有一次,景公和晏婴等一班大臣,到野外踏青赏景。野外景色虽然很美,但是,有的地方却露布着几具尸体,这都是穷苦的百姓死后,家中无钱掩埋留下的。景公对这种惨状漠不关心,依然谈笑风生,兴致勃勃。晏婴看不下去了,对景公说:“我们先前的国君桓公当政(时在公元前685—公元前643年)的时候,每逢出去游玩,看到饥饿的人,就发放粮食;看见生病的人,就留下钱物。因为他爱惜民力,注意减轻人民的负担。所以,每当人民听到桓公要出游的消息,都希望他能到自己的地方去。可是,现在您出游时,却把周围一带百姓的财物拿走,供您享用;把劳力征调过来,供您驱使。百姓挨饿受冻,田野里到处是尸体,可您根本不过问,您和一个无道的国君差不多了。您大肆搜刮百姓的财产,供自己享用,百姓自然就不会拥护您了。长此下去,百姓就要和您离心离德,就会拥戴别人作我们国家的君主了。一想到这儿,我就替您担心

啊!”

景公听后,满面羞色地说道:“您说得是对的。我只知道贪图安逸,却忘了百姓的痛苦,真是罪过!”

于是,他命令手下的人把尸体掩埋起来,给百姓发放了一些粮食,并且减免了这一带的徭役。

还有一次,一匹让景公非常喜爱的马不知什么原因,突然死了!景公大发雷霆,把养马人抓了起来,并且扬言说,要把养马人剁成肉酱,而且谁要是敢上朝直谏,就同养马人一起死。

晏婴听到后,默默不语地走上前去,右手拿着刀子,左手按住养马人的头,仿佛要替景公杀掉养马人。但是,他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养马人后,却故作不解地问景公:“请问,古代贤明的君主在杀人的时候,先从哪里下手呢?”

景公给晏婴这么一问,立时觉得理亏,张口结舌,期期艾艾地说不出话来。但是,他既然已经说出决不放养马人的话,如果就这样把养马人给放了,觉得面子上过不去。于是,他又要把养马人关进监狱,并观察晏婴对此事的反映。

晏婴故意表示同意,但又说道:“您给他这样的处罚,他可能还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现在,让我来历数他的罪状,使他心服口服地进监狱。”

“当然可以。”景公很高兴地回答。

晏婴做出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大声对养马人说道:“你的罪过有三条:第一,国君让你养马,可你却把马给养死了,这是犯了死罪;第二,死的这匹马,又是国君最喜欢的马,你是罪上加罪;第三,因为你没有把马养好,使得国君为一匹马而去杀人,这件事如果让百姓知道了,一定要抱怨国君;如果让诸侯列国知道了,一定要轻视我们的国君。你简直可以说是死有余辜了。所以,国君要把你关进监狱。”

景公听了这一番话,知道晏婴在责备自己,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他假意咳嗽了几声,对晏婴说道:“算了吧,您把他放了吧!不要让我太难堪了。”

在当时的诸侯列国中,齐国的盐铁业很发达,国家也很富裕,社会上的奢华之风很盛行,再加上国君景公又是骄奢淫逸的人,上行下效,当时形成了以俭为耻,以奢为荣的不良风气。晏婴对这种社会风气很担心,因而他也多次劝谏景公,希望他能去奢就俭,给人民起一个表率作用。

有一次,景公要把当时商业很繁华的两个城市——平阴和棠邑赐给晏婴做封地。晏婴却谢绝了。他解释说:“因为您修筑豪华的宫殿,使百姓财穷力尽;因为您贪图享乐,使百姓痛苦不堪;因为您穷兵黩武,使百姓命丧疆场。所以,百姓十分怨恨。因此,我不敢接受您的赏赐。”

景公也承认晏婴说得对,但他认为这是两回事,他不解地问:“难道您自己就不想富贵吗?”

“我认为当大臣的,应该先为君主,后为自己;先为国家,再为自己的家。如果单纯为自己考虑,那怎么行呢?”晏婴回答道。

景公又问:“那您喜欢我赏赐给您什么呢?”

晏婴回答说:“您下令减免渔盐商人捐税,对农民只征收十分之一的赋税;减轻刑罚,将死罪的人减为徒刑,对应该判徒刑的人,改为轻微的惩罚,而应该受到惩罚的,则无罪释放。您把这几件事做了,就是我的最好的赏赐,而且对您也很有利。”

景公答应了,并立刻下令执行。之后,又派人到列国去征求意见,大国的国君说:“齐国这回可以保平安了。”而小国的国君则说:“以后齐国不会再对我们发动战争了。”

在《晏子春秋》一书中,像这样的例子我们还可举出许多。从以上

这4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为国家 and 百姓的利益考虑,是晏婴大胆规劝国君的出发点,而且,他在进谏过程中,既讲原则,又讲策略,使国君在不十分尴尬的情况下接受自己的意见。因此,尽管景公是个沉迷于酒色的昏君,但他对晏婴还是很礼遇的。

公元前500年,晏婴去世的时候,景公正在外游玩。当他听到消息后,立刻驱车赶回来,伏在他的尸体上失声痛哭,一边哭一边说道:“大夫您以前日夜规劝我,督促我,没有半点保留,您曾一天之内三次进行谏净。现在,您走了,谁还能这样做呢?上天啊!您若要惩罚齐国,就惩罚我吧!为什么要惩罚晏大夫,让他过早地离开人世?齐国危险了,齐国的百姓也失去了最可依赖的人了!”

说到晏婴的节俭奉公,还是先从小故事说起。

有一次,晏婴正在吃饭,景公派一个人到他家里来了,晏婴就把自己的饭分一半给客人吃,并不因为是景公派的人就再准备。结果,一个人的饭两个人吃,自然谁都没有吃饱。这个人回去后,把这件事告诉了景公。景公感叹地说:“唉!我不知道晏婴家里居然这样穷,这是我的过错。”

于是,他派人给晏婴送来一笔钱,说是供他招待客人用。晏婴却坚决拒绝了,把来人打发回去。景公却又派人送了回来,晏婴还是不肯收下。第三次再送来时,晏婴亲自去见景公,说:“因为您曾给我的赏赐,不但连我的亲友都得到了您的好处,而且我用您给我的赏赐去救济灾民,百姓也从中得到了实惠。所以,我的家其实并不穷。我认为,一个大臣,如果把从君主那里得到的赏赐分送给百姓,那就是僭越君主来治理百姓了;那不是个忠臣应该做的;而如果他把这些赏赐藏起来不分送百姓,那他也不是个廉洁之臣。

所以说,一个人在为官的时候,如果从君主那里得到的赏赐很多,而他自己又是个吝啬鬼,那么在他活着的时候,会受到人们的怨恨;等到他死了,这些赏赐也就换了主人。这种为别人看管财产的行为是很愚蠢的,聪明人是不会干的。说到我,我只要有衣服穿,有饭吃,不至于挨饿受冻就满足了,根本不需要您过多的赏赐。”

晏婴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从政几十年来,始终是粗布衣裳,冬天出外所穿的一件裘袍,算是一件高档的衣服,他一直穿了三十多年。他平日吃的,也是粗茶淡饭,每顿最多不过两个菜。他的住处就更寒酸了,房子又旧又小不说,还离嘈杂的市场很近。他的马也是一匹老马,车子也破烂不堪。他曾向别人说过他这样做的理由:“富而不骄者,未尝闻之;贫而不恨者,婴是也。所以贫而不恨者,以若为师也。”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富有而不骄傲的,我没有听说过;而贫穷不感到遗憾的人却有,我晏婴就是一个。我为什么感到遗憾呢?因为我高尚的品德当成我的老师。这就是说,晏婴是把一个人能否保持廉洁奉公的作风,看成是评价这个人是否有高尚情操的标准。

晏婴把这种高尚的品德保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而且在临死以前,还希望家人继续保持下去。他对妻子的临终遗言是:“我怕死后,咱家勤俭的习惯改变了,您要好好地照管着!”

历史上,人们常以“立功”、“立言”、“立德”为三不朽,来衡量一个人物的功德,而将这三者集于一身者,晏婴可谓是当之无愧。正因为如此,“至圣先师”孔子甘愿做他的弟弟和学生,司马迁愿意成为他的马车夫。

(责任编辑 萧 徐)

“帐中坐叱 山川走” 的 奢香夫人

● 彭云鹤

奢香(?—1396)是我国西南边陲贵州著名的彝族女土司。明朝初年,她承袭丈夫霭翠之职,任贵州宣慰使后,为维护民族团结,巩固西南边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被明廷敕封为“顺德夫人”,故世称为“奢香夫人”。

一、遐荒水西,心向中央

彝族是我国古老的民族之一。奢香所属的水西水东一支,更有着悠久的历史。据史料记载,其远祖源于古代氐、羌的一支,后辗转来到贵州西北部。三国时,其先人济火(一称济济火,或称火济)便因协助蜀汉丞相诸葛亮擒孟获有功,被封为罗甸国王。其后裔如唐朝之阿佩、宋朝之普贵、元朝之阿画,也都是在各代开国之初纳土归附而承袭爵位的,并同该王朝中央政府保持了密切的联

系。元世祖至元十六年(1279),阿画等归降后,元朝廷始设八番、罗甸等处军民宣慰使司及都元帅府于贵州。“贵州”之名即得于此时。

阿画的后代霭翠,曾任元朝四川行省左丞兼贵州顺元宣慰使,并世代承袭水西宣慰司。明朝建立后,霭翠与其副手宋蒙古歹一起在洪武四年(1371)前来投附。明太祖朱元璋因深知贵州“西接滇、蜀,东连荆、粤”,位置极为重要,若“霭翠辈不尽服之,虽有云南不能守”。因而予以隆重接待,并任命霭翠为贵州宣慰使,“统四十八部”。宋蒙古歹仍为其副手,任宣慰同知,并赐汉名“宋钦”。另外,明廷在贵州还设有思州和思南宣慰司,与水西并称“三宣慰”。但因“霭翠兵独强盛,分四十八部,每部以大头目领之。地方四千里之广”,所以倍受重视,位居各宣慰之上。

明太祖在分设宣慰司的同时,又置都督府,其长官称都督,属领宣慰司。并任用马皇后之侄马烨(一称马煜)镇守其地,同水西宣慰司分别开府于宣慰城中,以便强化对该地区的监督管理。

马烨生性残暴,又恃仗着皇亲威势,到任后,为所欲为,甚至经常以杀戮震慑彝民。当地群众对他恨之入骨,称他为“马阎王”。故后人说:马烨的事迹,“史不概见,贵州人独能谈之”。

尽管马烨如此暴虐,但由于霭翠、宋钦等人精明强干,总是实心实意拥戴朝廷,又有奢香、刘淑贞两位贤内助的有力辅佐,每年都按时足额地向中央供奉宝马和方物,表现得异常恭顺,致使“马阎王”一时无隙可乘。

二、依靠高皇帝,智除“马阎王”

洪武十四年(1381),贵州宣慰同知宋钦病死。夫人刘淑贞奉命携子宋诚入朝,明太祖予以抚慰,并因宋诚年幼而决定由刘淑贞暂袭宋钦之宣慰同知职衔,仍掌水东事务。不久,宣慰使霭翠也病逝,太祖又命其夫人奢香承袭其职。从此,奢、刘这两位中年女子便各承丈夫遗志,携手并肩共同支撑贵州宣慰使司的全面工作,并对朝廷保持着忠诚恭顺的态度。

但是,她们万万没有想到,都督马烨正乘其“孤儿寡母”之机,设计陷害。

洪武十七年(1384)的一天,马烨借奢香一个小小的失误“当勘”,便出动人马闯入宣慰司衙门,不分青红皂白地将其逮捕,枷铐起来押解到都督府大堂,严刑审讯。奢香义正词严地进行抗议,马烨根本不听辩解,竟令人将奢香衣服扒掉,进行裸挞,直至遍体鳞伤,方才放回。

马烨为何要这样苦苦迫害奢香呢?原来,他是想借此手段激怒彝民造反,再以“平叛”为名,出兵镇压。从而

彻底废除当地的土司土官，而改由中央直接任命并可随时调换的“流官”进行治理。这正是后世所谓“改土归流”制度的肇端。马烨此举，从朱元璋的长远计划来看，并没有什么错误，但因时机尚不成熟，且手段残暴，理由不足，致使“诸罗果（指彝族大众）愤怒欲反”。奢香对此事件，一直保持着冷静的态度，“多智术”的刘淑贞也识破了马烨的诡计。二人商定后，刘淑贞便挺身而出，劝止众人。她对众人说：“大家先不要乱，我今天豁出性命赶往京城，上告天子。如其执意不肯为咱作主，再反不迟！”等众人情绪稳定后，她便携带少数随从，飞马直奔京城（今南京市）。

刘淑贞等入朝后，明太祖迅即召见了她。刘氏向太祖如实地反映了事件发生的经过，并愤怒地哭诉了马烨的暴行。最后她说：“我们彝族大众，一直忠于朝廷，供马已有数年之久，从未有过越轨行动。而马都督却无故骚扰，恐一旦彝民忍无可忍，惹起事端，那时陛下反会怪罪臣等管束不力。因此，臣今日冒死进京奏报，万望陛下为我等做主！”太祖听后异常震惊。他一面予以抚慰，让其入宫拜见马皇后；一面又令刘淑贞亲笔写信速召奢香来京面谈。

奢香见信后，立即将儿子安的唤至床前，再三叮嘱他要严格约束部众，切勿轻举妄动。然后不顾浑身的伤痛，在儿媳奢助等数人陪同下，扬鞭催马，飞驰进京。面见太祖皇帝，详细陈述了霭翠与自身的家世，列举了历代守土之功，控诉了都督马烨残害彝民的罪恶事实。太祖听后说：“你等确是苦于马都督的暴虐，朕可为你们除掉他。但是你将如何报答朕呢？”奢香马上叩谢说：“若蒙圣恩除害，臣等当令子孙世代严格约束部众，使其不敢为乱！”太祖微微一笑说：“这本来就是你们分内事，怎么谈得上报答呢？”奢香沉思片刻，说：“贵州东北有间道（即偏僻的山间小路）可入蜀，梗塞久矣。臣等愿为陛下开山辟路，开驿传，以供驿使和官员往来。不知圣上意下如何？”

奢香自接任贵州宣慰使以后，深知民族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打开闭塞状态。她早已勘察清楚这条可修的路线，待条件成熟即可动工修筑。故当太祖问其如何报答之时，便将此事提出，以借朝廷之力成此伟业。

太祖听后大悦，连连点头嘉许。他认为，一些少数民族首领之所以态度强硬，是由于倚仗“山川之险阻，财力之富饶”。如果开通驿路，则其险自失，其志自驯，易于统治。因此，他赐给奢香如意冠和大量金银珠宝以示嘉奖。第二天即遣使持诏书赴贵州，擒马烨回京治罪。

使臣至贵州，只说皇上令马烨回朝议事，以防其变。待车驾走出马烨辖境，使臣方宣读诏书，并将其押入囚车，解往京城。

马烨被押解回京后，明太祖历数其罪状，将其处死，并将其首级传示奢香等人。接着，太祖又降旨，封奢香为“顺德夫人”，封刘淑贞为“明德夫人”，各赐金银珠宝不等。

次日，太祖令马皇后赐宴谨身殿，为奢香等饯行。同时诏令沿途所过府县，皆设仪仗迎送奢香一行。至此，一场行将爆发的民族冲突，获得圆满解决。

三、“帐中坐叱山川走， 谁道奢香一妇人”

奢香等返回故里后，一方面当众宣告太祖已将马烨处死，为彝民除害，并宣扬朝廷的威德，以抚慰民心。另一方面，则忠实地履行诺言，动员民众，不畏艰险，凿山刊木，积极修筑道路。奢香更移帐工地，亲自指挥，很快便开辟出一条东起偏桥（今贵州施秉），经草塘（今贵州草塘镇）、容山、水东，直达乌撒（今贵州西部威宁）和乌蒙（今云南昭通市）等地的交通要道。这条驿路横穿贵州全境，连通四川、云南。同时，她又下令在贵州至毕节之间，沿途设置威清（今贵州清镇县）、龙场、陆广、谷里、水西城（今黔西县）、奢香、金鸡、阁雅和归化等九大驿站，各驿站备有房舍、快马等，专供驿使和往来官员歇宿、换乘之用。

驿路的开通，打破了贵州的闭塞局面，加强了贵州同中央政府及毗邻地区的联系，有力地促进了贵州，尤其是黔西北偏远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同时也增强了各民族间的凝聚力和对中央的向心力，促进了国家的统一，巩固了西南边防。因此后人写诗称颂说：“我闻水西奢香氏，奉昭曾谒高皇宫。承恩一诺九驿通，凿山刊木穿蒙茸。”“帐中坐叱山川走，谁道奢香一妇人。”

此路开通后，明太祖对奢香等倍加赞赏，认为她们“最为诚恪”。洪武二十年（1387年），“奢香进马二十三匹，每岁定输贡三万石”。奢香并以年老，奏准以其子安的承袭宣慰使之职。二十五年，安的奉召入朝，“赐三品服并袭衣金带，白金三百两，钞五十锭”。奢香复遣其儿媳奢助等入朝贡宝马六十六匹。诏赐奢香银四百两，锦绮钞币有差。“自是，每岁贡献不绝，报施之隆，亦非他土司敢望也”。二十九年（1396年），奢香因病逝世，朝廷遣使致祭。其遗体按照彝族传统，火葬后安葬于大方县城边的雾笼坡上。不仅其后人年年按时祭扫，而且水西实行“改土归流”后，凡在大定、黔西任职的所有流官，也都按照汉族的风俗，于每年清明前后，登上雾笼坡为其扫墓。

（责任编辑 萧 徐）

从屈原、欧阳修想到“贬官文化”

● 杨尚聘

在三峡历史文化长河中,有两个光耀神州的人物,这两个人物把三峡历史推向两次颠峰。

一个是战国时期“与日月争光”的屈原,一个是北宋“一代文宗”欧阳修。屈原创造了“惊采绝艳”的楚辞,欧阳修在夷陵留下了风流千古的瑰丽诗文。

屈原、欧阳修所处的时代相隔一千多年,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遭遇:贬官;有一个共同的幸事:逆境中进入创作高峰;有一个共同的功绩:把三峡文化推向更高的美学境界。

余秋雨先生称苏东坡贬谪黄州,是“经历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脱胎换骨,也使他的艺术才情获得了一次蒸馏和升华,他,真正地成熟了一——与古往今来许多大家一样,成熟于一场灾难之后,成熟于灭寂后的再生,成熟于穷乡僻壤,成熟于几乎没有人在他身边的时刻”。屈原、欧阳修正是这样的“大家”,僻远的三峡哺育、锤炼着屈原、欧阳修等封建时代的“贬官”,而这些“再生”后的文人又给三峡文化注入新的血液。三峡山水将文人推进新的人生阶段,文人又将三峡引入超越时空的文化高度。

在封建时代,诸多风云一时的文武官员,或因政见不同,或因嫉妒诽谤,或因内讧失意,都可能遭贬,而贬之处定是僻壤之地。文官和武官遭贬后的情景大不一样:武官遭贬,虽留下一身豪气,终为一抔黄土,

几处冤魂。文官遭贬,却使他们走出宫廷、走出皇城的同时,也走出了迂腐的花下唱和,走出了自鸣得意、自我陶醉的心理误区。他们开始与山水融合了,与百姓融合了,与苦难融合了,与真实融合了,与内在人格力量和超人的才华融合了,他们自然而然地创造文化,推进文化。活,活得文采飞扬;死,死得万世留芳。他们终于把自己的名字融进秀丽山水,冶炼出炎黄文化的精华。

当代伟人毛泽东提出文学家、艺术家要深入生活,面向大众,实在是指出了一个推进文化发展、繁荣文艺创作的真理。但对封建社会的文人来说,贬官具有接触现实的条件,他们在官场不得意中却不经意地走向创作沃土。这大概就是今人与古人所处的时代的差异了。

屈原是三峡的骄傲。2000多年以前,他从秭归乐平里的大山中走出来,辅佐楚怀王,官居左徒,三闾大夫。他的雄才大略抵挡不住靳尚之流的谗言,他的渊博学识不如王宫内的粉脂细腰吃香。他从腐败的小人群中愤怒地走出来,他被昏愤的楚顷襄王流放了,有德的圣贤倒了霉,方正的君子居下位。屈原忧愁苦闷,沉郁深思,写成了《离骚》。“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诗人流浪在沅湘,用他的血和泪《问天》,用他的情和志颂橘,用他的悲和愤咏《九章》。诗人憔悴了,文化升华了。贬官屈原给生他养他的峡江的是爱国主义的精神,是举世闻名

世代传颂、字字珠玑的文化宝藏。他,为封建时代的贬官们树立了一个光辉的典范。

和屈原比,欧阳修是一个外来的贬官。这里我不想陈述欧阳公遭贬的荒唐,也不去陈述他贬官路上的艰辛,和许许多多的文人一样,欧阳公遭贬,正是他一生成就的开始。“庐陵事业起夷陵”、“功名偏至谪官时”,历代文人墨客对欧阳修贬夷陵在他一生中的重大作用,已作了高度评价和鉴定。

宋仁宗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十月二十六日,三峡门户夷陵(今宜昌市)这个小州中的下县,迎来了贬官欧阳修。欧阳修踏上这片“僻远之地”,看到的是“州居无郭郭,通衢不能容车马;市无百货之列,而鲍鱼之肆不可入”,“县楼朝见虎,官舍夜闻猿”的景象,对于“曾是洛阳花下客”的欧阳修,定有遭贬后的失落感。可他毕竟是文人,对旧的宫廷生活的留恋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消沉和伤感。相反,他从“僻远之地”看到了“江山秀美”,他从“既陋且穷”中看到了“绿丛红桔”,他从“民俗简陋”中看到了古朴民风,他的才华被三峡的美景陶醉了,“西陵山水天下佳”,一篇篇千古绝唱从诗人的心中宣泄出来,像西陵峡之水,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永恒的歌。一年零三个月,欧阳修在夷陵写下了近50首诗歌,近30篇文章,离开夷陵后又有不少诗文写到夷陵,在欧阳修全集766篇诗文中,直接涉及

夷陵者达 140 篇之多,占全集篇目将近五分之一。

“一生风流半在兹”,清代彭松毓对欧阳修在夷陵文学成就的评价,实在不为过分。我们可以如此假设:如果欧阳修在京城春风得意,不到夷陵,哪会有“雪压残枝犹有桔、冻雷惊笋欲抽芽”的奇妙诗句,哪会有“荆楚先贤多胜迹,不辞携酒问邻翁”的生活感悟,哪会有“须信春风无远近,维舟处处有花开”的豁达风骨,哪会有“节既晚而愈茂,岁已寒而不易”的刚强品格。我们也可以作这样的假设:如果欧阳修不来夷陵,就没有《夷陵九咏》,就没有描写北宋夷陵瑰丽诗文。正如诗人林有席所说:“后之宦夷陵者,采摭故实,皆得本六一诗文以咨考据。”一部《东湖县志》,欧阳修的诗文就有 30 多篇。正如一位学者所说,欧阳修在宜

昌留下的文化积存,比其他历史人物都要丰富。欧阳修因宜昌成熟,夷陵因欧阳修成名。

在三峡的历史上,屈原、欧阳修是两个贬官历史人物的突出代表,但也不是巧合和孤立的代表。唐代诗人李涉,唐宪宗时被贬为峡州司户参军。他在峡州(今宜昌)居住长达十年,写下了咏赞三峡风光的诗文。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元和十四年被谪为忠州(今四川忠县)刺史,在三峡地域生活了近两年时间,写下了 120 多首诗,对三峡社会风土人情、心理状态、道德面貌作了深刻描绘。李白曾三过三峡,第二次是流放经过,行至白帝城时遇赦,束胸顿开,于是,“朝辞白帝彩云间”这样千古绝唱在三峡诞生了。他的诗像三峡一样永恒。杜甫流落夔州,写下 400 多篇三峡诗文,“无边落木萧萧

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一篇篇“旷代之作”留给了三峡,留给了炎黄子孙。杨炯被贬入川,作《西陵峡》;张九龄遭害,写三峡诗;黄庭坚贬涪州,写竹枝词……还有一些著名人物,如王十朋、陆游、范成大、赵孟頫、杨慎等等,他们虽不是贬官,但多因仕途艰难,与三峡结下不解之缘,为三峡文化增添了一种异彩。

三峡贬官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贬官群体云集三峡,共同构筑三峡历史文化,终于在三峡奇山秀水中建造起无比瑰丽的文化殿堂。当今三峡不再僻远,贬官不复存在,三峡文化以其崭新的形式延续。探讨三峡历史文化中的贬官现象,就像翻一页古老的书,对我们认识三峡的过去也许有一点帮助。

(宜昌市炎黄文化研究会供稿)

(责任编辑 洛松)

中山舰何日出水?

● 荣国

中山舰,一代名舰。目前仍躺在长江武汉上游金口镇龙床矶江底。

中山舰,原称“永丰”舰。它是 1910 年,晚清的两名海军大臣参观日本的造船厂和海军后,向日本三菱造船厂订购了两艘炮舰之一。“永丰”舰与孙中山发生联系,始自 1915 年孙中山发布《讨袁檄文》。在孙中山的号召下,北洋政府的海军司令李鼎新、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懌等将领奋起倒袁,率领“永丰”等舰在上海通电起义,毅然加入孙中山的护国军行列。1922 年 6 月 16 日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叛乱后,中山先生曾坐镇“永丰”舰 56 天,指挥平叛,挫败了陈炯明的阴谋。1925 年孙中山先生逝世,次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将“永丰”舰易名为“中山”舰。“七七”事变爆发时,任中山舰舰长的是爱国将领萨师俊,他恰好是当年筹划订购“永丰”舰的清朝海军将领萨镇冰的后裔。

武汉会战期间,中山舰与兄弟舰一起执行封江任务。10 月 24 日遭日机轮番轰炸而沉没。悠悠岁月抹不掉中华儿女对中山舰的梦魂萦绕。60 年代以来,国内曾有过数次探摸中山舰的尝试。

由此,各方达成共识,打捞中山舰的前提是探摸中山舰,摸清中山舰的准确位置,摸清中山舰的舰体现状。

1994 年 1 月 26 日,湖北省文化厅与海军航保部商讨打捞中山舰一事,并于 3 月 24 日签订了《“探摸”中山舰协议书》。为慎重起见,“探摸”工作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他们先后潜水 45 人次,水下作业 48 个多小时,终于用手探摸到了舰尾铜制的“中山”二字,从而准确认定了沉船位于长江武汉上游 26 公里金口镇水域的龙床矶。

1995 年 11 月 23 日国家文物局正式批准湖北省打捞中山舰。

今年是中山先生诞辰 130 周年,也是中山舰命名 70 周年。湖北省人民政府组织的中山舰整体打捞前期工程正式进行。经过五十多名潜水员历时 14 天对船体前、中、后三部分仔细探摸,发现船体破损严重的地方有 5 处,较轻的损伤有 10 处。但中部的重伤未造成舰体断裂,可望能够“整体打捞”。据有关人士介绍,如无特殊情况,海内外炎黄子孙盼望“中山舰”出水的那一“时刻”,将出现在今年 11 月中旬的某一天。

《炎黄春秋》

隆重纪念创刊五周年

杨尚昆、萧克、程思远、张爱萍、杨成武、王平、
李德生等题词

萧克、傅崇碧、陈沂、张岱年、王光美、郭超人、
金冲及、张锲、梁衡等出席纪念会

创刊于1991年7月的《炎黄春秋》，在期刊市场的激烈竞争中，迎来了她五岁的生日。7月12日，党政军老领导和著名专家、学者、各界知名人士近200人在首都聚会，隆重纪念《炎黄春秋》创刊五周年。

《炎黄春秋》是以周谷城为会长、萧克为执行会长的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的纪实性综合月刊。经过五年的不懈努力，《炎黄春秋》在读者中树立了自己的形象，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在迎接五周年的日子里，一些老将军、老专家、老学者以及社会知名人士为之题词和惠赠书画。其中有：杨尚昆、萧克、程思远、张爱萍、杨成武、王平、李德生、耿飚、孙毅、傅崇碧、张西帆、陈沂、凌云、强晓初、董寿平、胡絮青、王光美、穆青、于光远、李锐、冯其庸、李普、苗地等。

7月12日举行创刊五周年纪念会时，尽管时当盛暑，萧克、傅崇碧、陈沂、张

西帆、张岱年、王光美、秦川、李庄、凌云、强晓初、杨泽江、黑伯理、冯征、于光远、温济泽、廖盖隆、李锐、吴象、李普、童大林、周而复、谢筱迺、庄炎林、马仲扬、姚锡华、张黎群、李之琰、舒芜、丁一岚、王强华、力平、张伯海、胡守文、王景山、张西洛、李华鹏和新华通讯社社长郭超人、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金冲及、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常务书记张锲、新闻出版署副署长梁衡、《求是》杂志社副总编辑苏双碧、《瞭望》周刊总编辑陈大斌、人民出版社社长薛德震、《中国老年报》总编辑姚远方、中国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李希凡、《北京日报》副总编辑林浩基、天津《老年时报》副总编辑萧连沛等近200人到会祝贺。

纪念会由《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方实主持，社长杜导正讲话。他说，《炎黄春秋》创刊之始，就确定了四项办刊的原则：一是坚持纪实，重记述，少评论；二是坚持实事求是，对人对事对历史，说真话，

说实话;三是坚持爱国大团结,只要是爱国的、不搞分裂、坚持祖国统一的炎黄子孙,都可以宣传报道;四是坚持自力更生,自筹资金,自负盈亏。五年来,尽管遇到了不少困难和坎坷,始终坚持了这四项办刊原则。到今年7月,已经出版了52期,计750多万字,数达千篇的文章反映的是历史和当今的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对一些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力求依据史料,做实事求是的报道,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对于在历史的不同阶段有过不同表现的复杂的历史人物,也努力给予如实记述,功则功,过则过,力求反映他们本来的面目。《炎黄春秋》以她鲜明的特色,在期刊之林中得到了日益众多的读者信赖

和好评,已拥有一个相对稳定且日见扩大的读者群。抽样调查表明,百分之九十以上为个人订户,他们当中多数是有长期革命经历的老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中、青年读者也在逐年增加。不少学者评价《炎黄春秋》有史胆,有史识,以丰富的材料,从多方面较为真实地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历史。北京大学张岱年老教授在创刊五周年纪念会上说:“《炎黄春秋》内容充实,其中包含着许多有关中国现代史的真实资料,有许多资料闻所未闻,弥足珍贵,读之深受启发。我每月都收到很多种杂志,不能全读,唯《炎黄春秋》我每期必读。”

(本刊编辑部)

一位读者的 祝 贺

社长、编辑同志们:

贵刊创刊以来,高举爱国大团结的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办刊方针,越办越好,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和赞誉。值此创刊五周年之际,我谨表示衷心的祝贺和敬意。

《炎黄春秋》是我的良师益友,她教我很多知识,更教我怎样唯物地、辩证地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使我受益颇深。许多生动感人的事,使我在阅读时,有时赞叹不已,有时感慨万千,有时高兴,有时落泪;有时启发我联想、探索,引发我再翻阅一些有关的文件资料,从

而又使我获得新的知识。每期我都能买到,把她放在床头、案边,随时阅读。外出,有时也要带上。我有几次在医院候诊室里,一读就是一两个小时。

我既是一个忠实的读者,又是一个“宣传员”。首先宣传、推荐在家里,使老伴和子女都爱读。邻居一位老同志也是热心的读者。我到医院探视病人,常买一两本《炎黄春秋》相送。去年以来,已送给过五人、六本,倍受喜爱。我乘车外出时,总是带上几本杂志,贵刊是首选,让司机在等候时阅读,有的还拿回班里传阅。老年人和年轻人读后都说贵刊办得好,有特色,严肃、真实。

贵刊不足之处,我同意今年第六期《编读窗》栏目刊载的王景山同志的意见,不再赘述。去年第一期“关于纪实文章必须真实的讨论”,对那件事的处

理也很妥帖。希望继续办好这个栏目,做好“沟通与合作”。

在内容上,我希望增加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的介绍,对一些鲜为人知的重要情节更望侧重介绍。对统一战线工作和地下党组织的工作在革命斗争中的重大作用,人们知之甚少,尽可能多宣传些。对现代人物的宣传,也应予重视。各条战线、各个方面,有突出贡献的人很多,很需要把他们的崇高品质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发扬光大。

以上是我向良师益友的汇报,不当之处,请指正。

此致

敬礼

杨 克

1996年6月30日

(杨克系北京军区机关军职离休干部)

祝賀《炎黃春秋》創刊五周年

弘揚炎黃文化
情系四海同胞

在炎黃
春秋五周年紀念日

不要忘記過去
記過去就不能把握
現在和未來

賀炎黃春秋創刊五周年

于光遠

一九九〇年四月

祝賀《炎黃春秋》 創刊五周年

史實
於心
於心
忠

祝《炎黃春秋》越办越好

王義 一九九〇年四月

祝賀炎黃春秋創刊五周年

芳聲遠播
史滿五州

九十二歲胡絮青

炎黄春秋



宋庆龄与中国民校总务同感部分商界合影 右起：黎沛华、史沫特莱、宋庆龄、费迅、林卓如



艾青与许多诗人在一起

回忆在中南海的采访生活

宋庆龄与鲁迅的友谊

艾青的风雨人生路

张大千重金求名画

美国著名建筑大师

贝聿铭的中国心

台北飞鸿 情系故里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邮发代号：82-507

定价：1.00元